

毛泽东与谈家桢

张光武／著



1948年，蜚声世界的谈家桢缘何归国？
此后半世纪，中国遗传学怎样走出迷雾？

Mao Zedong Yu Tan Jiazhen



华文出版社

毛泽东与谈家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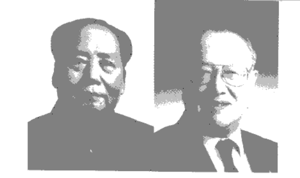
◆ 统战人物传记系列 ◆

Biographies of United Front Figures

瞿秋白与鲁迅
王震与陶峙岳
周恩来与陈诚
周恩来与张治中
朱德与卫立煌
毛泽东与李宗仁
贺龙与程砚秋
杨成武与常其武
周恩来与邵力子
陈云与马寅初
邓颖超与何香凝
邓小平与包玉刚


ISBN 978-7-5075-3715-4
9 787507 537154 >

定价：29.80元





毛泽东与谈家桢

张光武/著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与谈家桢 / 张光武著. -- 2版. --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6
（统战人物传记系列）
ISBN 978-7-5075-3715-4

Ⅰ. ①毛… Ⅱ. ①张… Ⅲ. ①毛泽东（1893～1976）－生平事迹②谈家桢（1909～2008）－生平事迹 Ⅳ. ①A752②K8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0637号

毛泽东与谈家桢

著　　者：张光武
责任编辑：魏　燎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投稿信箱：sinoculturepress@126.com
电　　话：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77 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19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5.25
字　　数：180千
版　　次：2012年7月第2版
印　　次：2012年7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3715-4
定　　价：29.80元

回顾与展望
——《毛泽东与谈家桢》代序

谈家桢

《毛泽东与谈家桢》一书，把我带回到三四十年前的过往岁月中。尽管往事如烟，人故物非，但不少事情，至今忆来，仍历历在目，譬如我和毛泽东主席的那段交往。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 1956 年 3 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毛泽东主席本人对青岛遗传学会议的关注，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坦白地讲，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苏联

“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毛泽东主席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胸襟宽广、学问渊博、平易近人。从 1956 年 3 月后，我前后四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其中，会晤时间最长、谈话内容最丰富的是 1958 年 1 月在杭州西湖刘庄的那次会见。在那次会见中，毛泽东主席充分展露了他那过人的才学、博古通今的知识面和精辟犀利的见解。

毛泽东主席待人是十分随和的。就以杭州西湖刘庄的那次会见而言，他无论对周谷城，还是对我和赵超构，都显得十分随和。毛泽东主席谈话不是教条式的，很幽默。那次杭州西湖谈话的前后，他正在思考着一些大问题，在跟我们的谈话中也表露出来，譬如，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强调的走群众路线、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再譬如，他在谈话中反复提到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以及宋玉指登徒子好色的例子，在几天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他都提到了。

毛泽东主席教育人，很讲究方式方法，通常不是直截了当的。譬如，在那次西湖会晤时，他希望我们注意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经过他的譬解，我们心服口服。后来，赵超构就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嘱托，去了自己的家乡，写出了很好的文章。

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和文章，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其中最令人感到信服的，就是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他的“两论”，也是我们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南。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精辟地阐述了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他指出，

实践（包括生产和科学实践）相对于理论而言，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产生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当前，我们提出科教兴国，注重加强基础研究，就涉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的温度下，鸡蛋能孵化出小鸡；在这里，“温度”这个外因是必须的，但是，温度不可能让鸭蛋孵化出小鸡来。这是毛主席对内外因关系的生动的譬解。可以说，当年，正是毛主席的“两论”，使我掌握了理论的武器，具备了与李森科之流斗争的力量和勇气。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是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令我印象最深、感触最多的，是 1978 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那次大会，被郭沫若誉为“科学的春天”。小平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石破天惊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嗣后，又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小平同志的话语，小平同志的思想，对于我们广大科学工作者来说，确确实实，是春天，是及时雨，是旱天雷，是一个延续至今的艳阳天的发端！

坦率地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78 年全国科技大会前的近三十年间，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没有大的发展，而且是明显地落后于世界各科技先进国家。中国科学技术真正上去，应该是从 1978 年才开始。诚然，毋庸讳言，由于欠账过多，差距太大，对于世界各先进国家而言，我们在科学上还是处在跟的阶段，殊少创新的东西。但有一点必须看到，我们毕竟是赶上来了！

创新需要基础研究。“根深始能叶茂”，这个道理是人尽皆知的。

五六十年代盛行浮夸风，诸如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之类的荒唐口号。这股浮夸风对科技界也有影响，例如，忽略和不重

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要花大力气，关键是人才的投入。科学技术是要靠人去搞的，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要跟教育的发展结合起来。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科学救国”，我个人也确实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现在提“科教兴国”，把科技和教育放在一起，就全面多了。

应该说，从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以来的这二十年，为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一个大问题也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我们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已远不适应于当前发展的需要。未来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进入这样一个时代，管理要知识化，生产要知识化，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教育体制丞须改革，科技体制丞需改革。

1995年10月，我曾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上书中央，受到江泽民总书记、李岚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和支持。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涉及面很广，例如高等教育，50年代初，我们不加分析，生搬硬套地“学习苏联”，结果使我们自己的教育体制，无论在教学思想、教学管理，还是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成为苏联模式的翻版。1956年，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和高等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就高校究竟是单一的教书还是应该成为教育和科研中心的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主席为平息这场争论，风趣地比喻，说是就此画上一条“三八线”。这条“三八线”延续了几十年，使高校和科学院这两大系统产生了鸿沟，其结果是各自都不能发挥最大的优势。21世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时代。如何培养和造就适应社会需要的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这是教育部门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我举双手赞成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其指导思想是把科技和教育作为兴国之本，并坚持把教育放

在优先发展和超前发展的战略地位，我认为，可以用“科教兴国、教育为本”八个字来概括。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具体加以实施和贯彻。在原有的体制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

高等教育要将大学和专科学分开，大学要进行通才教育，加强基础训练，培养复合型人才，进入研究生院后才讲“专”。

基础教育要加强素质教育。对于学生来讲，要提倡德、智、体、群、劳、美全面发展。“群”，是集体主义，凡属大的科学创造都靠集体的作用，一个人聪明有什么用？有作为、有能力的人，看不起别人，不能团结合作，结果是妨碍自己有更大的作为；科学创造要动手，要劳动，要手脑结合，所以要提倡“劳”。将来的社会要讲语言美、行为美。群、劳、美是要从小养成。

提“科教兴国”，科学技术的质量是由人的质量来决定的。德、智、体、群、劳、美的重要性可知。

知识经济不同于过去的工业经济，是靠人的脑力。因此，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关键在教育，在引导。

高新技术产品，首先要有高新技术。高新技术的形成，则在于高新技术理论。由此可见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今天的理论，明天的技术，后天的产品。”

再好的产品也总是感觉存在着不足，于是就需要不断加强基础研究。事物发展的根本的原因是内因，外部条件、外部环境是第二位的。你的基础研究上不去，你的高新技术产品就出不来。毛泽东主席的“两论”对于今天搞知识经济同样有着指南作用。

建国以来，我们走了不少弯路，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今天由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一切。我觉得，从现在开始的这二十年，一个重点是抓改革。包括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科技体制的改革。

在这个二十年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谈突破，谈超越。

可以说，我们国家的真正腾飞，前前后后，总需要六十年的时间吧！也许，以我个人而言，已不可能看到那么一天，但我充满热望地期待着那一天，因为，那一天，也正是我穷尽毕生精力以追求的目标哪！

1998 年 5 月 20 日

目录 Contents

第三章　毛泽东与谈家桢的友谊

第五章　一个没有画上句号的故事

第一章

领袖与学者

第一节

西湖边上的一个冬夜

1958 年 1 月 6 日。上海。

时近傍晚，华灯初上。上海市南京西路，中共上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所在地，大门前已是行人渐少车马稀了。

先后不一地，有三位学者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进去。他们是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桢、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和《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林放）。

来自中共上海市委的通知，把他们请到了统战部。

匆匆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在那里会齐了。简短的寒暄，莫名的心态。他们唯有面面相觑。其时，1957 年夏日开始的那场波及全中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完全过去。他们都是万幸被“保

护过关”的人物。

而后，他们被告知将去杭州，并被安排上了车，直驱机场。当他们登上飞机时，紧张的心情渐趋于放松，因为他们得知：所乘坐的专机，竟是毛泽东主席坐的！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也许，是毛泽东主席要召见他们。专机平稳地穿行在云海里，他们已无心观赏座舱外的景致，原本放松的心情复又变得激动起来。

下了飞机，一辆轿车又把他们直接送至刘庄毛泽东的下榻处。

车抵刘庄，已过晚上十点，毛泽东竟亲自站在门口等候着他们！领袖的破格举动，令三位新知旧识大为感动。

“深夜把你们揪出来，没有耽误你们睡觉吧？”一句风趣幽默的话语，毛泽东轻轻地为客人们卸去了拘谨和不安。

西子湖畔，一个幽静的大庭院。进入室内，一张方桌，四把椅子。毛泽东和三位党外朋友各据一席，品茗畅谈。毛泽东的谈话，广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等各个领域，其思路之敏捷，视野之广阔，见解之精到，言辞之犀利，为凡人之所不及，进而引发了三位学者的无所顾虑、畅所欲言。

1958 年 1 月 6 日冬夜发生在杭州西子湖畔、毛泽东约见三位党外朋友的那一幕，后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将之喻为“坐机夜半虚前席，先问苍生后鬼神”，并与昔之汉文帝夜召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相比照，更显现出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伟大风范。

又有人将谈、周、赵三人称为毛泽东的“西湖三友”。

毛泽东的“西湖三友”中：

谈家桢，著名遗传学家。1909 年 9 月 15 日生于浙江宁波。1930 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2 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理

学硕士学位。193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谈家桢30年代起为创设现代综合进化理论作出重大贡献，他关于异色瓢虫色斑的基因镶嵌遗传和果蝇性隔离形成的多基因遗传基础的发现，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对遗传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谈家桢在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学成归国后，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历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理学院院长。50年代起任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周谷城（1898—1996），著名历史学家。湖南益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1921年后，任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英文教员，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1927年后，在上海为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撰稿、译书。1930年后，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在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较领域中均有建树。

赵超构（1910—1992），著名新闻工作者，笔名林放。浙江文成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1934年开始，先后任南京《朝报》编辑、重庆《新民报》主笔，并为报刊写小言论和杂文。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写下长篇报告文学《延安一月》，被誉为中国人写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一书系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斯诺也因写成此书而声名大振）。1946年任上海《新民报》总主笔。1949年后继续主持《新民晚报》工作。曾发表《关于社会新闻的一些意见》，较早地提倡社会新闻。主持《新民晚报》时，在该报撰写《未晚谈》、《时事随笔》、《随笔》等专栏杂文，笔力雄健，雅俗共赏，深受读者欢迎。

第二节

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毛泽东一生，好与党外人士交朋友，除章士钊、郭沫若、黄炎培、张治中、程潜外，周谷城也是一位。周谷城和毛泽东的友谊，从20世纪20年代两人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同事时起，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长达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历史上，跟毛泽东保持这么长时间友谊的，恐怕鲜有其人了。历史学家周谷城，自然也便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 一、从第一师范到农民协会 ◆

综观中国近代史，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从章太炎开始，做学问的人，往往跟革命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因缘。这个话题，涉及面太广，内容太丰富，且留给历史学者们慢慢地去想，静静地去做，本文不待细说。早年的周谷城，就是一位激进的热血青年，他跟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同事时，同是神系华夏，忧心国事，彼此间心有灵犀一点通，相知相交颇深。

其时，周谷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通常是，晚饭之后，毛泽东去到周谷城处，谈古论今，彻夜长谈。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周谷城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有一回，毛泽东在周谷城的书架上见到英文版的《资本论》三卷，就笑着问周谷城："看这个，你不怕惹乱子吗?"周笑而不语。自此，彼此益发引为知己。

以后，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周谷城在长沙担任了省农民协会的顾问和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师，还做过船山学社的教师。

1927年前后，周谷城深入实际，写出了一些反映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好文章，其中，有两篇论租谷的文章，就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写成并在报上发表的。之后，周谷城替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写了一篇讲稿。在武汉时，他把这篇讲稿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对此文颇加赞许，认为这篇文章花了工夫，最好在报上发表。这就是1927年春，用连载形式发表在《中央日报》上的《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文章在《中央日报》上连载了一个星期，读者反应甚好。邓演达读了周谷城的文章后，大为欣赏，当时，他正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成员到河南去做地下工作，极力邀周谷城去任秘书，并一再对周谷城说："农民运动有研究，能去最好。"后因周谷城正罹痔疾，未能成行，痊愈后去了毛泽东主持的全国农民协会。

周谷城说，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除了1927年至1930年在上海是"译书卖文过日子"外，其余时间都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教书，并投身于中共领导的进步师生反帝爱国斗争。

◆ 二、北方来鸿 ◆

有一件事，令周谷城终生难忘——

抗战前夕，周谷城在上海教书，住在老靶子路一个犹太人的公寓里。一天，他教课回家，接到一束卷得很紧的报纸。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呢？他心情不免忐忑紧张，又有点莫名的兴奋。他急急地关上房门，打开报纸一看，"啊——"他惊呆了。

里面竟是用复写纸写的毛泽东寄给他的信！

一别十余年，毛泽东没有忘记他，远在陕北瓦窑堡的毛泽东还一直记着他这个湖南故旧！

这是一封向全国各界人士呼吁一致抗日、建立联合阵线的信函。信中提到了李烈钧——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时高举反袁旗帜的江南都督；还提到了大革命时北伐军第六军军长程潜和方克刚、舒新城、李达、顾颉刚以及周予同等。

看完毛泽东的来信，周谷城找到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和李达一起商量了如何发动知识分子，以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

毛泽东的这次来信，坚定了周谷城跟共产党走爱国进步道路的信念。

◆ 三、“一十八年了！” ◆

1945 年，抗战胜利。

为了和平解决国内问题，毛泽东不计个人安危，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从延安飞抵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时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孙科准备举行一次茶话会，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参加，欢迎毛泽东的到来。正在重庆的周谷城得知这个消息，十分希望通过这次茶话会跟毛泽东见见面、叙叙旧。他找到了中苏文化协会的秘书长张西曼教授。

“可以啊，你早点来，在会场外迎接着就行了。”张西曼十分支持。进步教授张西曼当时与代表中共方面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吴玉章等过从甚密。

茶话会开始前，周谷城早早地到了，他站在会场外等待着，内心的激动不言而喻。

不一会儿，毛泽东身穿蓝布短装，迈着稳健的步伐向着会场大门走来了。周谷城心头一热，急急地迎上前去，紧紧地抓住毛泽东的手，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毛泽东先开口了，他大声地问："你是周谷城先生吗？"

"是的。"周谷城觉得声带很紧，他实在太激动了。

毛泽东缓缓地举起手来，在空中做了一个手势，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一十八年了！"

毛泽东的记性很好。从1927年他俩在武汉挥手作别，到这次重庆会面，正正好好，一十八年。

说这话时，毛泽东动了感情，他的眼眶里分明噙着泪珠，周谷城呢，自然也流了眼泪。

"润之先生，你过去胃出血的毛病可大好了吗？"周谷城还记挂着毛泽东的身体。

毛泽东爽朗一笑，他又恢复了领袖人物特有的幽默风度。

"我这个人啊，生来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

周围的人都笑了。

这次见面后，毛泽东又通过徐冰把周谷城约到张治中家里会面，同去的还有叶以群、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及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等。

◆ 四、迎接解放 ◆

1946年，周谷城由重庆回到上海，并在上海迎来了1949年的解放。

1946年6、7月间，张志让教授在重庆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回上海发起成立了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周谷城就在这一

时期参加了“大教联”，并成为这一组织的中坚分子。当时的上海“大教联”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在各种场合开展反美反蒋、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周谷城也经常被推荐前去为中小学教师及大学生作反帝爱国斗争的报告。之后，他不断受到警告，威胁他不得向学生作报告等。他哈哈一笑，把收到的警告信随手捏作一团，扔了，照常参加座谈会，照常在报上发表反帝爱国的言论。

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在昆山路的一幢房子里，中共地下组织正式指定深得学生爱戴的陈望道、潘震亚和周谷城为接收复旦大学的代表。

同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数日后，陈毅在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召开座谈会，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与会者数百人。在吴有训和陈望道相继发言后，会议主席周谷城发言。上海刚刚解放，人心振奋，周谷城在发言中谈到“我们被解放”的意义，陈毅在一边插话说：“不是被解放，而是会师。”与会者听了，更为鼓舞。

不久，陈毅就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正式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教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任委员，周谷城为常务委员兼教务长。

◆ 五、中南海聆教 ◆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谷城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他被安排在由郭沫若担任召集人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组，组内共十二人，为郭沫若、李达、董鲁安、王稼祥、张奚若、丁燮林、吴有训、符定一、洪深、欧阳予倩、马寅初和周谷城。这次会议在中南海召开，周谷城自然没有想到，从这次会议以后，他会经常去北京，并成为中南海的常客。

毛泽东显然很喜欢这位湖南故旧。有时，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会想起周谷城，并把周请进中南海，古今中外，天南海北，促膝长谈。谈久了，到了吃饭的时间，就把周谷城留下吃饭。毛泽东喜欢游泳，有时，他会邀周谷城一同下池。有一回，毛泽东和周谷城游兴甚浓，踏波击水，直至天黑，上得池来，就在露天游泳池旁的布制凉棚下共进晚餐。以周谷城而言，这实在是终生难忘的优遇了。周谷城在中南海做客时，很少见到江青。只有一次，毛泽东留饭，江青参加了，从头至尾，只在饭桌旁对周谷城说了一声“请坐”，便再没有说过第二句话。周颇感纳闷，也不便多问。又有一次，中共上海市委接到毛泽东的长途电话，要他们用飞机把周谷城送到北京。这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和周谷城畅谈逻辑问题，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毛泽东又把周谷城和陆定一等人留下来吃了晚饭。

其实，毛泽东的性格，也并非全都如此。有一件事，令周谷城感动不已。周谷城回忆说：“大概是1958年的某一天，主席竟以请客的方式约我到中南海——”

那一天，上午9时，周谷城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劈面就问他，在北京的学术界，他跟哪些人谈得来？周谷城老老实实地扳了扳手指，回答说，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王名方、胡绳等。毛泽东听了，马上让工作人员把那些人请来吃饭。席间，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我今天请老朋友周谷城吃饭，请你们作陪。”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3时才散。

◆ 六、“没有人怪你！” ◆

1958年，毛泽东去上海，打电话约周谷城去他的住处。正谈话间，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进来，其时，周谷城并不认识他，见他向

自己打招呼，就站起来跟他握手。毛泽东看见周谷城站起来了，也站起来，笑着对许建国说："这是我的老朋友周谷城先生，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早得多。"许建国连声说："是，是。"

周谷城被触动了心事，忽然变得羞愧，他嗫嚅着说："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怕死。"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众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周谷城说，"那时我怕死，往上海溜，住在一个犹太人的公寓里。""没有跟主席上井冈山，同主席有天渊之别。"谈起这段往事，周谷城本人是一直引以为憾的。

这时，毛泽东开口了，他连连摇手，大声制止说："没有人怪你！"

毛泽东说过，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类居住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他还曾建议党内同志多交点党外朋友。他说："我这个人就有不少右派朋友。"

对党外朋友，毛泽东一直抱着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直至"文化大革命"。

周谷城说，过去他和毛泽东谈天，经常说到两句话："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礼记》曰："张而不弛，文武勿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勿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一个人如果老是紧张下去，那当然吃不消；但也不能过于松弛，如果一天到晚什么事情都不做，做懒汉到底，那便完全没有生气。

毛泽东说，他也是讲一张一弛的。毛泽东跟周谷城的聚会，应该是日理万机之余的一种惬意的松弛。

◆ 七、《五一节晋见毛泽东》的前前后后 ◆

1961年，毛泽东到上海过"五一"节，在锦江饭店约见了陈望

道、金仲华、周谷城、沈体兰、沈克非和周信芳等人。宾主围坐在一张小圆桌前，海阔天空，话题不拘，娓娓道来，极尽兴致。是夜，一阵电话铃声，把已经拥被入睡的周谷城从床上唤起，打来电话的是《解放日报》的一位记者。

"写一首诗，或者，一首词，如何？在明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表示对主席的欢迎。"

"不行，实在写不出。"周谷城推托着。

"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记者会磨。

"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记者无意挂电话，还是坚持。

推来推去，周谷城推却不过。披衣起床，打起精神，写了一首，倒还满意。词曰：

>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深身体会，情从中来。也只有周谷城能写得了。

题目是：《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

毛泽东在报上读到了这首词，显得很高兴，又给周谷城去了电话，约他再去。

5月3日，下午3时，周谷城准时到了毛泽东的下榻处。

周谷城脚刚跨进客厅，正在看报的毛泽东站起身来，迎头就说："词一首，我看到了。怕是不止一首吧?"

周谷城笑了，连忙分辩："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

诗词，这确实是第一首。”

毛泽东还是不信：“总怕不止一首吧？”

周谷城连连摆手：“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他重复着那晚对记者说过的话。

毛泽东莞尔一笑，风趣地说：“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

周谷城也被逗笑了。

周谷城告诉毛泽东：“平时，我偶尔也写上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毛泽东总是突发奇言，令人发噱，却又耐人寻味。

“附庸风雅者，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而不发，过得去吗？”

“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又据，离、牢同声。”周谷城也开始“淘糨糊”。

“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毛泽东很快活，跟老朋友在一起说笑，他显得松弛，更见潇洒。

“离骚或许就是牢骚。而牢骚呢，或许就是啰唆。牢、啰同声，骚、嗦同声。念啰唆，或许就是发牢骚。”周谷城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像是回到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跟坐在对面的这位老朋友，无拘无束，尽情尽兴。毛泽东呢，也同样的开心，同样的放松，露出人们在新闻片和画报上熟见的伟人畅怀的笑。

“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才是。”周谷城对此显得深有体会。

“是呀，老是干巴巴的，有什么味道？”毛泽东连连点头。

“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当智慧超过需要时，便有风趣；当智慧赶不上需要时，就不仅不风趣，而且要丢丑了。”充分放

松的周谷城在领袖面前自然地展示着他那固有的睿智。

灯上夜阑，主客谈兴未尽，周谷城提到了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

“邓演达，你是应该认识的——”毛泽东显得很有兴趣，要把谈话进行下去。

“是的，我认识。”

“邓演达先生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毛泽东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他一定是想到了过去，想到了往事。

邓演达（1895—1931），早期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1925年春赴德国求学；同年冬返国，途经莫斯科，参观苏联建设。回国后，1926年1月，任黄埔军校教育长，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4月调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任教育长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6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0月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1927年2月和吴玉章等五人在武汉组织行动委员会；同月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代校长；同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党部农民部长，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宣传部长等职；8月赴苏联；11月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后转赴德、法等国考察。1930年回国；8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任中央干事会总干事，并发行《革命行动》等刊物。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被捕。同年11月29日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遇难。年仅36岁。著有《北洋军阀与南京统治的前途》。

当晚，毛泽东与周谷城熟不拘礼地共进了晚餐。就像当年在长

沙，在“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那些日子里。

周谷城离去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上了汽车。

第三节

情系文字缘

与周谷城相比，赵超构与毛泽东的相识时间显得晚些，从年龄上看，他也比毛泽东小了将近20岁。

如同赵超构给世人的印象是从文字开始，又因文字而展开，他和毛泽东从相识到相知，也是由文字而结下的缘分——

◆ 一、中国的《西行漫记》◆

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赵超构曾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后来被誉为中国人写的《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的作者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赵超构还有一点跟斯诺是相像的——他也是一位记者，一位大名鼎鼎的记者。他就是50年代起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众所周知的杂文大家林放。“林放”是赵超构的笔名。

不过，写《西行漫记》时的赵超构还是个30出头的年轻记者，其时，他正任重庆《新民报》的主笔。

1944年5月，有一个中外新闻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赵超构就

以《新民报》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个记者团。

记者团到达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但延安军民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他们，这是令赵超构十分感动的。

到达延安后的一天早上，毛泽东给记者团的每一位记者发去了请柬，内容是当天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跟大家见面。这自然是一件令人喜出望外的事情。下午4时，大家如约而去。

到达见面会会场没有多久，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走进来了。自那以后，赵超构的双眼就几乎没有离开毛泽东。那一天，毛泽东从传说里走进了现实中，对于赵超构来说，实在是印象至深。

在他的跟里，毛泽东是一位“身材颀长，并不奇伟”的男子。穿着也简单甚而不加修饰，“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像是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然而，毛泽东的感人魅力，毛泽东的真正精神风采所在，赵超构是抓住了。“谈话时，依然是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辞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于是，赵超构心悦诚服地写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他进而又写道：“听取谈话时，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黑的头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

那一天，毛泽东谈了很多，内容广及国际国内，博大而精彩。赵超构十分兴奋，手不停笔，做了详细的记录。

当晚，毛泽东设便餐招待了记者们。餐毕，还安排了一个节目，请大家观看平剧（即今京剧）。内容有《打渔杀家》等毛泽东喜爱的折子戏。

十分幸运的，赵超构的座位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右侧，这使他有机会进一步仔细地端详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领袖的风采。

许是因为用餐时喝了几杯酒，许是因为当晚的演出内容很对他的胃口，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他不时地向周围的人敬烟让茶，随意地交谈，当节目看到精彩处时，这位领袖还不时地放声大笑。这情绪自然也感染了一同观剧的记者们，谈话便越发变得无拘束起来。

好多年以后，赵超构还清楚地记得，那晚，毛泽东跟他谈起了张恨水。张恨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享誉海内的通俗小说作家，代表作有《啼笑姻缘》、《金粉世家》等，当时有鸳鸯蝴蝶派小说鼻祖之称，其实，他的包括《啼笑姻缘》等在内的许多作品对旧社会的黑暗多有暴露和鞭挞。其时，赵超构和张恨水是《新民报》的同事，两人过从甚密。赵超构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对张恨水的许多作品都很熟悉。他还记得，当谈及张恨水的新作《水浒新传》时，毛泽东赞誉说："这本《水浒新传》写得很好，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

从延安回到重庆后，赵超构按捺不住满腔的激情，提起笔来，写下了著名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先在《新民报》上连载，而后出版单行本。《延安一月》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客观公正地报道了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用事实驳斥了反动派对中共和边区的种种造谣污蔑，为魑魅魍魉横行的黑暗世界打开了一扇透露光明的窗户，使许多大后方的同胞呼吸到迫切需要的新鲜空气，看到了另一个充满阳光、弥漫活力的天地。毛泽东和周恩来读了这本书后，称赞它是"中国的《西行漫记》"。

◆ 二、“你善于用曲笔” ◆

赵超构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45年8月，众所周知的“重庆谈判”之时。其时，毛泽东甫从延安飞抵重庆，紧锣密鼓，针锋相对，与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展开斗争；同时，还要约见各界民主人士，日程安排十分紧凑。令赵超构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在百忙中居然挤出时间，把他请到重庆郊外的八路军办事处叙谈。

那是一个夏末秋初的上午，35岁的赵超构与这位比自己年龄大出许多的中共领袖作了一次倾心交谈。

赵超构先说：“您这次来重庆，许多人都替你的安全担心。”

他表示了真切的关心。

毛泽东习惯地朗声一笑：“蒋介石这个人，大家都是知道他的。不过，我这一次来重庆，也是经过研究分析，是有备而来的。”

一席开场白，令赵超构再一次感受到毛泽东那种“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超人魅力，原先的顾虑顿时消除不少。

毛泽东用抑扬顿挫的湖南口音，为年轻的记者朋友娓娓地讲述着当前的全国形势，讲述着国共谈判的几个关键性问题。毛泽东深入浅出地向赵超构分析说，如果没有美国人为蒋介石运送军队和枪炮，有许多“沦陷区”本该是由人民收复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八路军就在城门口”。赵超构听了连连点头。

毛泽东又谈道，“看到你写的《延安一月》了，你善于用曲笔，我看你是个自由主义者。”

听了毛泽东真诚的话语，赵超构不由脸红了起来。

毛泽东显然十分关心重庆方面的情况，向赵超构提起了这个话题。

赵超构说："我跟重庆上层的人物接触很少，但与中下层的公教人员来往还比较多。"

他据实以告。

毛泽东点了点头，他很仔细地向赵超构询问了这些人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并表示希望了解他们对当前的国事，对蒋介石政权，对国共谈判的看法，赵超构都毫无保留地一一为具言之。

赵超构谈完后，毛泽东沉吟了片刻，尔后，深深地吸了口烟，缓缓地说："死跟着蒋介石的人毕竟还只是少数，有的人对现状不满，但是对美、蒋还是抱有幻想，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转变过来的。"

赵超构赞同地点了点头。

谈至掌灯时分，周恩来急急地走了进来，毛泽东便邀赵超构共进晚餐。餐后，毛泽东起身跟赵超构作别，在周恩来陪同下，坐车进城去了。

几天以后，在孙科为毛泽东举行的茶话会上，赵超构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 三、"要'软中有硬'" ◆

赵超构第三次见到毛泽东，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那是 1957 年 3 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离两人上一次聚会，已经过去整整 12 年了。

其时，赵超构正担任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和金仲华、徐铸城等作为上海新闻界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在北京举行的重要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讲话，即有名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在同年 3 月 18 日给儿子傅聪的家信中曾谈及自己聆听毛泽东这次讲话后的感受：

“从1月18日至27日（毛泽东）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的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地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毛泽东）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情……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3月10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接见新闻界、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并与他们进行座谈，赵超构也参加了。会上，有人谈及赵超构对当时办报方针的设想，原来，建国以后，在如何使《新民晚报》适应读者需要，如何挖掘晚报特性的摸索中，赵超构曾提出：“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和“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口号，以求使晚报寻得适合群众的口味和符合自身发展的规律。听到这里，毛泽东说话了：“软些，软些，软到哪里去呢?”

又说，“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软中有硬’。”

毛泽东对赵超构的办报方针，既有肯定，也有不赞同的地方。

此前两天，3月8日，在同文艺界代表座谈时，毛泽东刚刚谈到了鲁迅，毛泽东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毛泽东是推崇鲁迅的杂文的，主要就在于鲁迅杂文的“硬”，以及深刻有力的战斗方法。就在50年代后期那段时间里，毛泽东曾经谈到，如果允许他将来退下来，他是愿意写杂文的。应照毛泽东青年时期写的时事政论，大多是出色的杂文，而其风格也确实具有与鲁迅杂文相似的战斗精神和方法。

“这也算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还是回到1958年1月6日的那个冬夜。

是夜，皓月当空，夜景如画。主人毛泽东意趣盎然，谈兴甚浓。据赵超构后来回忆：“在我看来。主席对生物、遗传问题以及逻辑问题等，都相当在行。”但见他谈笑自若，旁征博引，气度恢弘，妙趣横生，令客人们不时发出轻松的笑声。

那一晚，毛泽东谈到了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他说：“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你们一定都读过吧？”

随后，他风趣地说：“登徒子娶了一个丑媳妇，但登徒子始终对她忠贞不贰。”说到这里，毛泽东自己先笑了起来，他说：

“登徒子是模范地遵守《婚姻法》的。”

大家也都笑了。

毛泽东又说，宋玉却说登徒子“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毛泽东反复地说，无论办什么事，都要从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他希望这三位党外朋友“不要老待在教室里、报馆里，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去走走听听，去呼吸新鲜空气”。

他说：“知识分子一定要走出书斋，如果你不肯自己出来，将来会有人把你们揪出来的。”

又说：“譬如我。我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力。”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望了望坐在身边的三位朋友，接着又说：“你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参观参观，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家乡最熟悉，最能够对比出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

毛泽东问赵超构：“你是哪里人？”

“温州。”

“好，就到那里去。”

后来，也就是那一年的5、6月间，赵超构去了温州，在温州附近各县参观了两个月，回到上海后，在《新民晚报》以连载形式发表了《吾自故乡来》，对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进行了由衷的歌颂。

毛泽东见大家还未脱拘谨，就笑着问周谷城：“你知道关公姓什么?”

毛泽东之于周谷城，已是熟不拘礼。

周谷城没有思想准备，显得有点局促紧张：“是姓关吗?”

毛泽东笑了，指着周谷城说：“你错了。”

于是，他一五一十、有鼻子有眼地把关公为逃脱官府缉拿，逃经一城，守将问其姓名，关公情急生智，指“关”为姓的传说如数家珍般地细细道来。

大家听得都笑了起来，毛泽东也开心地笑了。

毛泽东又问谈家桢：“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毛泽东讲话时，总习惯把身子凑近对方，给人一种亲近感。

在这位比自己年长10多岁的领袖的关切的询问下，谈家桢感动了，郁积心头已久的心里话，汩汩地涌了出来。是的，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后，复旦大学又可以开设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这门课了，但在许多人眼里，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仍然是一种不能给予信任的学说，唯有米丘林学说才是“正宗”。而让谈家桢开课，只是统战的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礼遇”性的照顾，他很想说——

“多亏您的关心，才……”

可他毕竟没有说出口。

“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毛泽东仔细地倾听完他的话后，再一次表了态，他的语气显得很坚决。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谈话已经进行到深夜12点了。主人的谈兴更浓，客人们也谈得尽兴。为了迎候客人，好客的主人当晚刚刚结束一个重要会议，连饭都没有顾得上吃。于是，这一夜，特地多准备了几个菜，斟上了几杯酒，主人陪着客人，大家边吃边谈，分明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了。用完饭后，又继续谈下去，一直到凌晨3点，谁也没有一点困意。最后，还是毛泽东看了看表，煞住了话头，开口说道：

“已经3点了，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

从庭院出来，有一段将近四百米的曲径小道，毛泽东执意地，一定要亲自把客人们送到门口。此时，正是满湖月色，毛泽东笑眯眯用手指指月亮，不乏诗意地说：

“今晚的聚会，也可算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大家听了，都会心地笑了。

毛泽东正说着，已走到了门口，就拱手请客人们上车。

大家说：“主席请回！”

毛泽东说：“你们先上车。”

三位客人都说：“主席不回去，我们怎好上车？”

“你们不上去，我就不回去。”毛泽东显得固执。

客人们无奈，只得先坐上车，与毛泽东告别。

第二天一早，8点左右，大家还未起床，忽听得毛泽东的声音在窗外响了起来：“上海的客人不要走，江华同志要请你们吃饭。”

中午，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杭州饭店设宴，招待毛泽东和他的三位学者朋友。出席作陪的还有浙江省的几位领导。

席间，毛泽东依旧兴致勃勃，侃侃而谈，还不时地向坐在他身边的谈家桢询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并将之引申为整个饭桌的话题。

江华举杯祝酒之后不久，赵超构显得心事重重地站起身来，举着酒杯说："我今天借花献佛，用主人的酒祝大家健康！"

原来，赵超构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在《新民晚报》上曾对浙江省领导作过不利的报道，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向主人表示一点歉意。

"不许可！不许可！"毛泽东看出了赵超构的用意。他对自己的客人可谓知之甚深。

"我不赞成这样。"毛泽东继续制止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啦！"酣谈中，一位工作人员走近毛泽东的身边说："主席，去南宁的时间已到。"

毛泽东站起身来，对三位客人说："你们是否跟我一起去南宁啊？"

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在那次由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科技革命上去。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那次会议上又讲述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的内容，那次讲话也从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说起。毛泽东说，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做十个指头来反。不能使用宋玉攻击登徒子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宋玉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击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典型，至今不得翻身。

至于那次被毛泽东称为"西湖佳话"的聚会，则在谈家桢、周谷城和赵超构的心中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作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自己呢，从后来的历史事实看，他显然

也十分珍惜与这三位党外朋友之间的友谊。这段历史，无疑将成为后人研究毛泽东的不可多得的佐证。

谈家桢和赵超构都是民盟成员，周谷城是民盟成员，也是农工民主党成员。1957 年的反右斗争中，由于毛泽东的保护，他们都得以平稳过关。

第二章
谈家桢与遗传学

本书的主人公谈家桢，是位著名的遗传学家，以其长期以来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以其敢于坚持原则、捍卫真理而闻名于世，而他与毛泽东之间那段充满戏剧情节的、脍炙人口的交往，更为中共领袖与民主人士的交往历史、为中国当代科学史，增添了一段不可多得的动人章节。

走过尘封的过往岁月，我们看到了一位在华夏大地上勇敢跋涉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家，看到了一步一步向我们走近又和我们一起迎接21世纪的谈家桢。

第一节
“中国的摩尔根”

◆ 一、少年谈家桢 ◆

1909年9月15日（旧历八月初二），谈家桢出生在浙江宁波

慈溪。

谈家桢也许生来就注定忙碌，注定多动，注定行事不愿墨守成规。当他呱呱坠地时，当邮局职员的父亲，正因频繁的工作调动而奔波于省内台州、海门、舟山、慈溪、杭州、南得、百官、绍兴和福建龙泉一带，谈家桢就是在慈溪（今慈城）邮局的小楼上降生的。至谈家桢四五岁时，父亲升任二级邮局局长，每月工资一百多块大洋，家境渐裕。

谈家桢5岁时，父亲调往舟山邮局工作，全家就住在邮局后面的弄堂里。谈家桢的启蒙教育就从那时开始。其时，父亲买了三把旧高脚凳子，谈家桢和哥哥、姐姐三人各据一凳，睁大了眼睛，聚精会神地听识字不多的父亲为他们教课认字。

以后，父亲调往海门邮局工作。邮局楼上的两间房子便成了他们的家，居住条件又上了一个台阶。这时，有自知之明的父亲为孩子们请来了一位私塾先生，讲授《千字文》、《百家姓》等。生性聪颖的谈家桢经常受到先生的夸奖。

江南的青山绿水、蝉唱虫鸣，在少年谈家桢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他日后攻读生物学，不能不说是一个无形的契机。谈家桢喜欢爬树，多少回，他爬到树的高处，用一双充满童趣和爱心的眼睛，尽情地观察着、吮吸着大自然中万物生长的奥秘。

求知欲旺盛的谈家桢，对周围的许多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谈家桢的外公是个木匠，自己开了一家木匠铺，几个舅舅也学得一手木匠活。有一回，他去外公的木匠铺，眼见粗糙的木头，在外公和舅舅的手中，经过一道道工序，变成美观耐用的木制成品，十分羡幕。趁着大人们不注意，他拿了把斧子，找了块木料，学着大人们的手势，依样画葫芦地劈起来。毕竟是孩子，稍一走神，斧子一歪，劈在了左手大拇指的指甲盖上，鲜血立时溢满了手指。生性倔犟的

谈家桢，大哭过后，还是缠着吓坏了的外公和舅舅教会了他敲敲打打，锯锯刨刨，以至到后来，他居然能自己设计，做出一套颇为像样的小木工活儿来。从那时起，谈家桢就开始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了。

谈家桢 10 岁时，父亲的工作又调回到慈溪。谈家桢和哥哥被送进了当地的一所教会小学——道本小学。

慈溪人素有经商传统，当时的著名实业家、被称为“海上闻人”的虞洽卿和吴锦堂等人都是慈溪人，谈家有不少亲戚朋友也活跃在上海、宁波的商界，上海有名的协大祥布店的总管，就是谈家的亲戚。谈家桢 12 岁从道本小学毕业那年，按照父亲的计划，是要送他去上海或是宁波学生意。聪明的谈家桢请来了那位当年介绍父亲去邮局工作的夏姓亲戚，合力做父亲的工作，终于说通父亲，勉强同意谈家桢继续升学读书。早年谈家桢根据自己的意愿，迈出了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步。

◆ 二、人是谁创造的？◆

12 岁时，谈家桢和哥哥一起进入宁波斐迪中学。斐迪中学在当时的宁波是一所由英国教会办的颇有名气的中学，学校学制为八年，最后两年为大学预科，毕业后如果进入圣约翰等教会大学，可免上大学预科班。

在教会学校中，英语和圣经课历来是重点课。斐迪中学也不例外，学校里要求学生熟练地背诵新约和旧约，有些课程都用英语讲授，谈家桢的英语读、说、听、写能力就是在那时打下基础的。

进入中学阶段的谈家桢，开始形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那时，他读《圣经》中的第一章“创世纪”，总感到有点纳闷。“创世纪”中说，仁慈的上帝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到第六天，上帝

用泥土造出了一个男人，给他取名叫亚当，让他生活在伊甸园里，而后，上帝顾及亚当过于寂寞，又造了一个女人，就是夏娃。我们今天的人类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

谈家桢问自己："上帝真有那么万能吗？究竟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上帝？"

冲撞终于不可避免。有一天，外籍教员向学生们提问："人是谁创造的？"

这是一个"常规性"问题。在教会学校，这样的问题，普通到就像每天吃早餐一样，纯粹是一种例行公事式的提问。

可巧，教员叫到了谈家桢。

谈家桢站起身来，他咬着嘴唇，他不想照着《圣经》上写的那样去回答，可他一时又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愣住了，急得满脸通红。自然，他受到教员一通严厉的呵斥。

下课了。同学们围着谈家桢，指指点点，数落着他，这样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照《圣经》上说的那样去回答？谈家桢想了想，很坚定地回答他的同学们："虽然我现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相信将来一定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那时，谈家桢没有想到，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后来，竟至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年以后，1925年2月，谈家桢只身离开宁波，进了教会办的湖州东吴第三中学高中部。

时值"五卅"运动前后，血气方刚的谈家桢怀抱满腔爱国热情，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受到同学们的拥护，很快被推选为东吴第三中学高中部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自此，他的身影便经常出现在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的行列中。

◆ 三、情钟达尔文 ◆

1926 年，谈家桢作为东吴第三中学的优等生，被学校免试保送进入苏州东吴大学。

作为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开设的一所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历来和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和广州的岭南大学等齐名，其前身为 1881 年设于上海的中西书院和 1897 年设在苏州的中西书院，至 1901 年合并为东吴大学。东吴大学的文理学院设在苏州，法学院设在上海。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东吴大学先后更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和苏州大学，而一部分迁至台湾的东吴大学校友，也于 50 年代初在台湾创办东吴大学，现已成为台湾一所拥有文、理、法、商、外语 5 个部分、22 个系、1. 3 万余千余名学生、在台湾岛颇具影响的综合性大学。1992 年，谈家桢作为大陆科学家代表团成员首次访台，以东吴大学校友的身份访问了东吴大学。

谈家桢进入东吴大学时，进化论思想和孟德尔学说已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毛泽东与谈家桢先后都受到了达尔文学说的影响，这是一个历史的契机。

早在 1912 年下半年，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退学后，自订自修计划，每天去王台省立图书馆看书时，就已经研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1936 年，毛泽东在保安同斯诺谈话时，还曾经谈道："（我）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读到闭

馆的时候。在这段自修时间里，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穆勒的一部关于伦（论）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

应该指出，这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大量地接触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对他来说乃是一次重要启蒙。而其中尤以严复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当时的影响极为深刻。毛泽东把自己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半年称为“极有价值的半年”，其中所指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接受了《天演论》中阐述的运动、变化、斗争、发展的自然观，即在斗争中求生存，在变化中求发展。同样，鲁迅和中共早期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几乎都是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然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的一生，曾多次提到达尔文、赫胥黎和《天演论》。

1957 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表示了对达尔文的钦佩，他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1970 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部是唯物的，后半部是唯心的。”

1974 年，英国首相希思到中国访问，送给毛泽东一张达尔文的照片（有达尔文的签名和达尔文自己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其他的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和类择》的第一版，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

毛泽东收下后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笑了："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点点头，说："我读过他的书。替他辩护的，叫 Huxley（赫胥黎）。"

希思点头，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说："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

毛泽东所说的，是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同攻击达尔文学说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毛泽东对进化论学说及其发展过程的熟悉由此可知。

1975 年 6 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毛泽东又对《天演论》作了更多的评价。

毛泽东说："不要照抄中国。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马克思自己说的。"

他又说："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什法师的话。他会做翻译，他翻译的《天演论》上说的。他不说是翻译，而说是达旨。这本书（指《天演论》）是赫胥黎写的。Huxley（赫胥黎），他是英国人，拥护达尔文的。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不可知论就是他说的。德国人康德就是不可知论。赫胥黎说康德是不可知论，只能认识表面，不认识本质。他（赫胥黎）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是唯心主义，他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所以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严复（1953—1921），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有"中国西学第一者"之称。中日甲午海战以后，严复更深刻地看到中国社会弊病的痼疾之所在，便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事业。

严复认为，中国近代之战不利，败和约，处处落后挨打，关键还在思想观念的落后。比照欧美国家，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学术政教一时斐变”。其时，西方人已普遍树立了生物进化的思想，认为物种是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形成的。这一观点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便是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也须遵循进化规律，由此，西方人树立了厚今薄古、积极进取、不墨守成规的观念，加以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导致国富民强。以这种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反观中国，严复认为，中国社会历史跳不出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循环发展。反映到中西方对古今的价值判别上，“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观念迥异。要学西方，首先就要用西方人的观念来改造中国人的落后观念，为此，严复极力鼓吹欧洲的思想和观念——进化的观念。

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严复认为，与认识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比，当时的国人更迫切需要的是认识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于是，《天演论》便率先成了严复进行思想启蒙的工具。

自《天演论》出版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先后发行的版本有30余种，仅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一个版本，1905年到1927年间就发行了24次。而在此期间，关于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文章和书籍相继问世，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得到广泛传播。

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又由对达尔文的兴趣进而扩大到对孟德尔新遗传思想的介绍和传播上，有人认为，孟德尔遗传学说的出现，标志着“达尔文以后时代的新世纪开始了”。

对达尔文进化论表现出极大兴趣的谈家桢，在进入东吴大学以后，对专业的选择可想而知。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在平时基础较好的数学专业和生物学专业之间，选择了后者。

◆ 四、他不是死读书的学生 ◆

1927 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国民革命的形势令知识界欢欣鼓舞，东吴大学的学生们为庆祝北伐胜利举行各种集会，谈家桢也积极参加学校的罢课和驱逐反动外籍教员的运动。当时东吴大学有四个外籍教员，平时欺压学生，民愤极大。于是，学生们借北伐胜利的东风，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择师运动。谈家桢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巧妙地将这四个外籍教员的名字，编入当时流行的“打倒列强”的歌曲中，给以嘲讽。一时间，校园内歌声此起彼伏，搞得四个外籍教员寝食不安，校方迫不得已，只好请那几个外籍教员打道回府。

大学时代的谈家桢，精力旺盛，充满朝气。他不但成绩出色，是学校中众所瞩目的佼佼者，而且十分热心于公益活动。1928 年秋至 1929 年夏，他义务出任由东吴大学学生创办的惠寒小学校长。这所学校本着造福社会的宗旨，不收学生费用，实行义务教育，还免费为贫寒子弟提供学习用品。谈家桢当校长期间，把自己的零花钱都捐了出来。这是谈家桢第一次跟教育结缘，近一年的社会实践，令他亲眼目睹了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萌生了献身教育的想法。他自没有想到，30 年后，他竟真的被推上了大学校长的岗位！

1930 年，谈家桢升入大学四年级。这一年，他担任“比较解剖学”实验课的助教。讲授《比较解剖学》的外籍教师台斯柯是他一直十分崇敬的。这位教师也曾讲授过《进化遗传与优生学》。谈家桢认为，这门课是他在东吴大学学习生涯中留下最深印象的一门课程，并对他日后致力于遗传进化论和优生学的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担任实验课助教的同时，谈家桢还兼任了桃坞中学的生物学

教师。每天，在完成学业以外，他还要为实验课备课，做实验室准备工作，遇到中学有课，他又要分身赶到桃坞中学。一身数任，反令谈家桢感到十分充实，他的能力、他的才气也得到了充分的展露。

◆ 五、谈家桢初识费孝通 ◆

一个插曲。

这是在谈家桢大学毕业前夕。经同学们的一致推选，谈家桢接受了编辑 1930 届年刊的任务。编辑年刊，工作量大而烦琐。其时，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在苏州，法学院在上海，为搜集材料，为进行组织协调，谈家桢不时地奔波于苏沪两地，此外，为筹资金，还须跑厂商，拉广告，谈家桢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年刊编成问世了，辛苦不易。

遗憾的是，在当年的这份年刊上，唯独缺少二年级费孝通所在的一班同学的照片和材料。原来，时为东吴大学二年级学生的费孝通，是一位热血青年，也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在同学中颇有威信。或许，在当时费孝通的心目中，搞年刊既浪费时间又转移了学生运动的视线，于是，在他的带头抵制下，他所在的那个年级的学生都没有参与年刊工作。之后，1930 年春，谈家桢兼任东吴大学普通生物学实验课的教学，正好做了费孝通的老师。

60 余年后，两位年近九旬的老人都担任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为国事而操劳奔波。见面时，费孝通对谈家桢是言必称“老师”。东吴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时，两位老人作为老校友应邀参加盛会。正交谈中，费孝通不知何故，又想起当年往事，风趣地说：“虽然那时与谈老师唱反调，但是谈老师没有为此而计较。如果谈老师要报复我，给我生物学课打个不及格，我也就没法毕业了！”

◆ 六、李汝祺与谈家桢 ◆

谈家桢的学习无疑是出色的，他用三年半的时间修满了四年的学分。1930年夏，谈家桢在东吴大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

他的愿望是继续深造。直接一点说，就是直升燕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这里，牵涉到东吴、燕京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简称“洛氏基金会”）的关系。

原来，东吴大学和燕京大学在洛氏基金会的影响和资助下，很早就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东吴大学每年挑选出有培养前途的学生直升燕京深造，从1921年到1933年间，燕京大学生物系培养了22名硕士，其中有9名是来自东吴大学的学生。

不久，东吴大学决定将谈家桢保送至燕京大学继续深造。

在前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胡经甫和东吴大学生物系的创始人、洛氏基金会驻华代表祈天锡等人的帮助下，谈家桢还获得了洛氏基金会的资助。

谈家桢到达燕京后，首先拜访了胡经甫教授，其时胡经甫已是国内知名昆虫学权威。在谈家桢表达了决心从事遗传学研究的愿望后，胡经甫把他引荐给李汝祺教授，在李汝祺的门下攻读硕士学业。

李汝祺，早年毕业于当时被称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1919—1923年，李汝祺在普度大学（purdue Vnivercity）完成大学学业，其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系研究院、摩尔根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在著名的细胞学家和胚胎学家威尔逊（E. B. Wilson）教授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经典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T. H. Morgan）教授的共同指导下，从事果蝇的发生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并成

为哥伦比亚摩尔根实验室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1926 年，李汝祺学成回国，先后在复旦大学和燕京大学担任生物系教授。谈家桢进入燕京大学时，李汝祺是当时该校唯一一名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教授。

谈家桢在研究生期间所做的研究课题是由胡经甫提出的。胡经甫希望谈家桢从事以亚洲瓢虫为实验材料进行色斑变异遗传规律的研究，这可能跟胡经甫毕生所从事的昆虫学研究有关，李汝祺表示同意。谈家桢的研究课题一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1983 年，在李汝祺 90 寿辰时，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曾经深情地说过这样一句话："谈家桢先生是我一生所带过的研究生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这是我一生中感到荣幸的一件事。"

谈家桢给老师的献词是："淳厚朴实，德智体全面发展；六十年如一日，堪为师表。"

在谈家桢身上，李汝祺沿用了摩尔根实验室培养人才的那套教学方法，这套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教而不包"。当然，施行这套教学方法的前提是"因材施教"，也就是说，在有自学能力的学生身上特别行之有效，而且，特别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譬如李汝祺之于谈家桢。

几年以后，当谈家桢到达大洋彼岸、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学习时，他才发现，原来李老师的教学方法与摩尔根是一脉相承的。

"教而不包"充分地调动了谈家桢的创造潜力。

谈家桢一头扎进了课题研究之中，其乐无穷。白天，他跋涉在北京西山区的田野和森林里，为瓢虫捕捉饲料——蚜虫，晚上进入实验室喂养瓢虫，对瓢虫进行杂交实验，观察其后代性状变异性情

况，一天常常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

天地万物，生命奥秘无穷无尽。谈家桢身体力行，格物致志，探求真谛，乐而忘返。其时，有同学见谈家桢对研究瓢虫如此专注，不免打趣说："你是想当个中国的摩尔根吧？"

谈家桢笑而不答。

是否能成为中国的摩尔根？他不敢作太多的奢望。但是，摩尔根的道路，他是要毫不动摇地走下去的。

谈家桢的努力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便完成了硕士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许多年以后，李汝祺回首往事，仍对之赞叹不已："我在谈家桢身上并没有花很多精力，但他的工作竟做得那么出色！"

他又说："我怎么也没想到，他在一年半时间里竟搜集到那么多的材料，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又看了那么多的参考书，这是出乎我意外的。"

李汝祺和谈家桢，其实是一对性格上差异很大的师生，谈家桢性格外向，尤其是在青年时代，热情奔放，充满朝气；而李汝祺的个性则偏于内向，他平素不苟言笑，"既不喜欢表现自己，也不善于表现自己"。而这一对师生却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的友谊甚而保持了半个多世纪之久。

李汝祺的夫人江先群是一位活泼开朗、长于交际的女性。她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青年时期留学美国，获生物学硕士学位。之后，她曾担任过那位赫赫有名、后来当了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lghton Stuart，1876—1962）的秘书。燕南园的两幢式样别致的平房，便是李师母的美国朋友捐款给燕京大学修建，并指定无偿赠送给李汝祺、江先群夫妇的。李汝祺喜得贤内助若此，其安心搞

学问之得天独厚可知一般。

谈家桢在老师家里，除了向老师请教学问外，老师夫妇也喜欢这位年轻人无拘无束地谈谈校园以外的世界。于是，通常是谈家桢有条不紊地向老师和师母讲述着他在京郊的青山绿水间所见所闻的新鲜事物，师母不断地插话，老师静静地坐在一边，喜孜孜地倾听着大家的交谈，书房内的人们，不是一家，胜似一家。每次谈家桢到来，师母总要关照厨师添加一只学生最爱吃的红烧蹄髈，让他美美地饱餐一顿！

60多年后，李汝祺还记忆犹新、深有感触地说："师生关系永远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之间的关系，同呼吸，共命运，志同道合地建立起终生难忘、牢不可破的友谊。"

谈家桢则认为，李汝祺老师一生为学治教堪称严谨。包括谈家桢在内的李汝祺的学生们至今还记得，李老师每次上课，必在课前半小时端坐在讲台前，等候他的学生们一一到来。李汝祺则将之解释为"这是为了表示对自己老师的敬意和对学生的尊重"。李老师讲课，条理性强，注重基础概念。这位学问广博的教师历来尊重年轻人的思维活动，他常常把自己研究学问的心得跟学生们一起讨论。为了把课讲好，在登上讲台之前，他至少要备三次课，不管要讲的内容已经讲过多少遍。通常，他的第一次备课是写讲稿，他永不满足于过去已经用过的材料，总要参阅大量的书刊，加上新的实验和新的见解；第二次备课是记讲稿和检查自己表达讲稿的语言；第三次备课则是在临上课前一个小时再次打腹稿。除此而外，在下课后，他还要做小结，对自己的讲课进行反思，记下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以便不断提高讲课质量。像李汝祺这样严谨自律的治学精神，阅遍中外古今的教育史，恐怕也是属于不多见的。

当然，李汝祺给谈家桢留下的另一个至为深刻的印象是，他在教学过程中沿用的摩尔根实验室培养人才的那套“教而不包”的办法。几年以后，谈家桢远涉重洋，在摩尔根实验室又一次领略到这套让学生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的科学教学方法，并将之融会贯通，用于自己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实践之中。这已是后话。

为中国学界泰斗和教坛楷模的李汝祺，一生可谓虚怀若谷。他曾用简短的两个词儿来概括自己的做人准则，那就是“忠于人”和“勤于事”。对于学生，他则认为：“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比给予他们的要多得多。”这实在是发自肺腑之言，决不带丝毫虚伪。

谈家桢极为敬重自己的老师。他认为，李汝祺的一生是追求科学真理的一生。李汝祺在一生中，曾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未对事业失去过信心，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示反抗。50年代后期，李汝祺有感于党提出的“双百”方针，写下一篇遗传学争鸣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亲自为李汝祺的文章加了编者按语，并改写了题目—“科学的必由之路”。其实，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李汝祺走过的科学道路所做的高度评价。

李汝祺在科学事业上作出的成就受到国内外同行的一致公认，并有“第一个将细胞遗传学引进介绍给中国的人”的美誉。

1927年出版的美国《遗传学》学报（Geueitics）上，打头第一篇论文，就是摩尔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的李汝祺的处女作。这是一篇最早的对黑腹果蝇发生遗传学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发表八年后，美国的普鲁逊（Poulson）刚刚开始对黑腹果蝇发育致死胚胎学进行研究；又至二十年后，瑞士胚胎学家海顿（Hadorn）的《发生遗传学与致死原因》一书问世；复经六年，马克特（Markert）和奥尔斯普隆（Ursprun）合作写成《发生遗传

学》，为这门学科创立了门户。如此算来，李汝祺应该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之一了。

其后，李汝祺在细胞学研究和放射遗传学实验方面多所建树，且著作甚丰，为世所公认。

从20世纪40年代初，李汝祺曾担任北京博物学会一期会长；1950年，他被推举为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1978年，中国遗传学会正式成立，众望所归的李汝祺被推选担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四年以后，在他的力荐下，他的学生谈家桢继任为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

李汝祺的一生都没有脱离过教育岗位，他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一点”。周培源曾这样评价他：“像李汝祺这样高龄一直活跃在讲台上的学者，在全世界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从20世纪50年代起，李汝祺在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一直工作到去世。

◆ 七、“中国的摩尔根” ◆

燕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业结束前夕，谈家桢与当年东吴大学一位姓施的同学邂逅相遇，那位同学显然十分了解并敬重谈家桢的好学精神和远大志向，欢谈之下，在谈家桢的纪念册上欣然写下“中国的摩尔根”六个字。

拿破仑曾经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立志献身中国遗传学事业的谈家桢，在那段刻苦攻读、同时又充满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的青年时代岁月中，曾为自己编织过怎样的五彩缤纷的瑰丽的梦已不得而知。但是，从他此后长期的实践活动可以看出，“中国的摩尔根”这六个字，后来，竟成了他60余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座右铭！

第二节

大洋彼岸的科学群体

◆ 一、赴美深造 ◆

谈家桢的硕士论文无疑颇有独到见地。在李汝祺的建议下，谈家桢将论文分解为各自独立成篇的三篇文章，其中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异色瓢虫的生物学记录》两篇在《北平自然历史公报》上发表，作为论文核心部分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经李汝祺推荐，寄往大洋彼岸的摩尔根实验室。

李汝祺十分了解自己的学生。成为当时遗传学界泰斗的摩尔根的学生，这是青年谈家桢梦寐以求的愿望。一篇载着李汝祺、谈家桢师生两代热望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漂洋过海，寄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的书桌上。

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仔细地审阅了这位中国青年学者的论文，如果说，一开始，他仅仅是出自对自己当年在哥伦比亚动物系研究院的中国研究生李汝祺的信任，相信他如此郑重的推荐的话，那么，当他反复读过眼前这篇用流畅英文书就的专业论文后，他的心确确实实被打动了，这位中国青年学者在论文的字里行间显示出来的才华令他震惊。于是，他同样郑重地将这篇不可多得的研究论文转交给他的助手杜布赞斯基教授。

杜布赞斯基（Dobzhansky，1900—1975），当时国际遗传学界颇负盛名的群体进化遗传学家，由这位科学家所创建的综合进化理论

为整个生物学的发展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原来，当年杜布赞斯基本人曾在苏联的亚洲地区采集过瓢虫，并曾设想通过对瓢虫的色斑多态性进行遗传进化规律的研究，终因诸多因素而憾未如愿。其时，在国际遗传学界，以从事异色瓢虫色斑变异遗传研究而成名的，除杜布赞斯基外，尚有日本的驹井卓等。而今，看着谈家桢的论文，杜布赞斯基激动不已，他立刻意识到，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正在从事着前人没有涉足的事业。换而言之，谈家桢的工作，较之他杜布赞斯基本人和另外两位日本学者，更见创造性，更具特色！

处在兴奋中的杜布赞斯基直接给谈家桢寄去了一封满含着西方人奔放激情的信函，他在信中表示，他对谈家桢所从事的这项研究课题及已取得的成绩十分欣赏，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谈家桢进行了鼓励。而后，谈家桢的这篇论文，经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的共同推荐，在美国公开发表。

谈家桢"旗开得胜"，这是他跟摩尔根，跟杜布赞斯基，跟当代两位遗传学大师首次建立交往关系。

《基度山伯爵》一书中说，"一切都建立在希望和等待之上"。谈家桢充满希望地等待着。然而，等待需要时间。

1932 年，谈家桢在燕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到母校东吴大学任教。他一面继续从事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的研究，一面开课讲学。在东吴大学，他先后开设了普通生物学、遗传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和优生学等课程，在他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中国优秀生物学家的刘健康、郑恩竞、沈毓凤、尤大寿和李琼池等人。

也就在这一年夏天，谈家桢与傅曼芸喜结连理。傅曼芸的家庭与谈家是世交通谊，谈家桢的父亲和傅曼芸的父亲是好朋友。

整整两年半，谈家桢一面讲课，一面继续进行瓢虫研究，这项

研究得到了洛氏基金会的资助。

1931—1932 年间，谈家桢应约为一位朋友去东吴大学附中代课，就在他代课的这个班上，他认识了蒋纬国，蒋纬国当时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60 年后，谈家桢作为中国杰出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首次访问宝岛台湾，与蒋纬国重续了这段师生情谊，成为海峡两岸具有轰动性效应的热门新闻。

好事多磨。谈家桢去美国摩尔根实验室深造一事，一拖再拖，已拖了很长一段时间。原来，洛氏基金会有一段条文，中国内地凡由洛氏基金会资助去美留学的，一所院系、一个科研机构，一次只能派出一人，待其人返回后，方能轮到第二人去美。在谈家桢申请洛氏基金前，已有一人提出申请，与谈家桢同时提出申请的尚有一人。这样一来，谈家桢如靠东吴大学生物系申请去美，至少还要等上四五年。时不我待，谈家桢不能再等。他直接给摩尔根本人写了信，表示希望去摩尔根实验室深造。

谈家桢的努力有了着落，摩尔根很快给他来了回信。这是一封摩尔根风格的回信，内容热情但不乏率直，信中表示欢迎谈家桢去美攻读博士学位，学杂费全免，但第一年的生活费需要谈家桢自行解决，至第二年可以提出申请奖学金。这封回信态度明朗，谈家桢去意更坚。

接下来是筹措路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

在经济上一向精打细算的父亲破天荒地考虑了儿子的请求，他以提前分家产的方法，给了三兄弟每人一千大洋。哥哥慷慨地把自己名下的一千元支援了谈家桢，父亲的好友汤宝楚也解囊相助，支持了五百大洋，东吴大学生物材料处鉴于谈家桢曾为他们制作过各式瓢虫模型标本，也半借半送地支援了一千大洋。一个好汉众人帮，就这样，东拼西凑，谈家桢在夫人傅曼芸的支持下，又毅然卖掉了

结婚时在苏州置下的二上二下的房产，终于凑齐了去美的路费和一年的生活费，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行程。

◆ 二、摩尔根、杜布赞斯基和谈家桢 ◆

1934年8月，谈家桢登上“胡佛总统号”游船，取道日本，前往美国。

经过半个多月的海上航行，谈家桢来到了美国西部濒临太平洋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城，在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开始了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留学生涯。

当谈家桢在美国西海岸海风的吹拂下，缓步走下“胡佛总统号”舷梯时，迎面向他走来的是日后成为他导师之一的杜布赞斯基，这位乌克兰血统的苏联科学家是专程赶来码头迎接他的。杜布赞斯基早已为谈家桢安排好住宿，以解决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长途旅行的劳顿。杜布赞斯基热情地向谈家桢介绍着摩尔根实验室的情况，并代表摩尔根本人对谈家桢的到来表示欢迎。

才人相惜，天涯比邻。涉过重洋、负笈远行的谈家桢立时产生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杜布赞斯基原籍苏联。1927年应邀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摩尔根实验室工作。第二年，随摩尔根同往加州理工学院创建生物系。1934年，谈家桢抵美时，杜布赞斯基已是美国颇负盛名的遗传学教授和摩尔根的主要助手之一了。

谈家桢和杜布赞斯基的相互了解早于他们直接见面之前。据谈家桢回忆，当初他在燕京大学的硕士论文《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杜氏发表在德国杂志上的同类文章的启示。

异色瓢虫，又称亚洲瓢虫，通常分布在苏联阿尔泰山脉以东的广

大地区及库页岛、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杜氏所研究的瓢虫取材于苏联霍文茨克地区，而谈家桢则把北京西山地区的瓢虫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1932年，由李汝祺推荐给摩尔根的那篇谈家桢的论文《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可说第一次沟通两位志同道合的学者的思想，频繁的书信往来，更加深了他们的相互了解，亚洲瓢虫便当之无愧地成了他们友谊的发端和载体。只是当谈家桢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时，摩尔根实验室已成为“果蝇王国”，杜氏本人也已转向研究果蝇遗传问题，于是，初来乍到的谈家桢也便加入了这个“果蝇王国”。这是后话。

谈家桢见到摩尔根时，摩尔根已是名闻遐迩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了。这位大胡子、高身材的美国学者，在自己的学生和同事面前显得十分谦虚和热忱，这种气氛很快感染了谈家桢，令他消除了顾虑，消除了初来乍到的腼腆、局促和不安，融入在以摩尔根为核心的那个严肃、紧张而又团结、友爱的群体之中。

多年以后，谈家桢是这样描述他记忆中的摩尔根的：

这是一位思想敏捷、不保守、判断力犀利和富有幽默感的老人，同时又是一位兴趣广泛、讲求实际的科学家。在他的整个科学生涯中，他的思想曾纵情驰骋在生物学的不同的领域中，并处处留下了巨大的成功足迹。而他所作出的这一系列杰出贡献，应归功于他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以及在探索科学的未知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穷根究底、小心求证的踏实作风。

谈家桢还认为，摩尔根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非凡出众的科研组织者和学术带头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对科学真理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之中，他的这一精神和品格，后来又成了他的学生谈家桢一生事业的座右铭。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科学事业上的任何一个进步，任何一项成就，都是群体行为的结果。

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既是一位超群的科学家，又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他本人是著名的基因学说的创始人，染色体遗传学说经过他的科学论证而得到公认。摩尔根的睿智之处在于他把目光放在将来，当摩尔根实验室以它卓著的研究成果闻名于国际学术界时，摩尔根又将巨大的精力用于培养下一代——遗传事业的继承者。摩尔根实验室有一套独特的培养人才的方法，在那个被世人称为“蝇室”的实验室群体中，摩尔根安排他的大弟子们具体指导学生，如此一代又一代，连绵不绝；在摩尔根实验室里，研究课题由学生自己确定，导师只是在关键点上加以指导，研究的路线和需要参考的文献资料全由学生自己去探索和思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套教学方法被称为“教而不包”，当年，李汝祺老师把这套教学方法带到了燕京大学，后来，谈家桢又把它带进了他先后任教的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教而不包”和中国古人提倡的“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是不谋而合的，其实质就是提倡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赶上和超过自己的老师。于是，在这样一个团结、友爱、互谅互让、互相尊重的研究群体中，许多卓越的科学家脱颖而出，摩尔根的三大弟子中，司多芬特和布里奇与老师共享诺贝尔奖，穆勒则以开创辐射遗传学的出色成就荣登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著名的“伴性遗传现象”、“遗传学第三定律”（即连锁交换法则）就是摩尔根和他的第一代学生共同研究的结晶。

谈家桢学而有幸，得遇名师。当他进入摩尔根实验室之时，正值染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谈家桢决定开辟以果蝇为材料的进化遗传学领域。在68岁的摩尔根的全程关心和杜布赞斯基的直接指导下，谈家桢在远离故国的花卉草虫中，在奥地利甫孟德尔创建的遗

传科学的崎岖小径奋勇攀登、行进，寻求和探索生命的真谛。他利用当时刚刚发现的果蝇巨大唾液腺染色体研究的最新成果，饶有兴致地分析果蝇在种内和种间的染色体结构和变异情况，探讨不同种的亲缘关系，从而深化了对进化机制的理解。

在此期间，谈家桢单独或与他的直接导师杜布赞斯基、司多芬特及在摩尔根实验室进修的法国、德国的遗传学家合作发表了十余篇很有影响的论文。1936年，谈家桢的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细胞遗传图》通过答辩，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谈家桢28岁。

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一致希望谈家桢继续留在美国从事遗传学的研究。望着朝夕相处的师长和同窗，环顾两年来得心应手的研究环境，谈家桢明白，留在美国，意味着个人声望和地位的巨大的改观，意味着未来的一帆风顺，意味着许多、许多。但是，科学救国是他不容动摇的信念，他去意已决。

杜布赞斯基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让谈家桢跟他一起工作。他希望，时间能改变谈家桢的想法，冲淡他的去意。他认为，让谈家桢跟随他继续果蝇的种群遗传学研究，一定能把谈家桢留下来。

一年时间，在博览群书、涉足遗传学各个领域和广泛进行学术交流中很快过去。而后，谈家桢向着曾对自己在果蝇种群遗传学研究领域寄予很大期望的杜布赞斯基，说了一段十分诚恳、十分动情的话："我不能一味地钻在果蝇遗传学研究领域里。中国的遗传学底子薄，人才奇缺。要发展中国遗传学，迫切需要培养各个专业的人才。因此。我在这宝贵的一年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接触各个领域，多获得各方面的知识。我，是属于中国的。"

这就是1937年，这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中国科学家所说的一番至今听来仍铿锵有力的话。也就在这一年，谈家桢作出了自己一生中

最重要的选择。他放弃了留在海外的机会，毅然回国了。

◆ 三、“蝇室”生涯 ◆

三年的“蝇室”生涯，令谈家桢获取了一生科学事业中得益匪浅的重要养料。

给他印象至深的，自然是“蝇室”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摩尔根本人。

在“蝇室”成员的心目中，摩尔根既是他们的教师，又是他们的朋友。摩尔根一贯主张并身体力行地把周围的人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研究工作，在“蝇室”中，人们以摩尔根为核心，不分彼此，互相尊重，互谅互让；在那里，看不到人际隔阂，看不到文人相轻，看不到师生界线。在工作中，在研究中，在对论中，人人可以畅所欲言，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而可以为了辩明一个观点，彼此间争得面红耳赤，却又分明自豪地感受到自己在科学人格上的充分独立，以及教学相长、互为补充的快感。于是，在这样一个群体中，人们对新见解、新观点的发现的荣誉归属问题变得淡漠了。“蝇室”成员司多芬特教授曾这样评价成员间的融洽关系，他说：“每当我们中间出现一个新的成果或一种新的思想时，就会展开小范围的自由讨论，人们发表意见时并不着重去指明这种新观点或新成果的归属。这自然不只是因为不可能提出谁先拥有这种观点，而是在我们这里，人们感到这种指明无关紧要……我这样认为，我们几乎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互谅互让的关系，这理所当然地推进了工作。可以这样说，摩尔根的成就离不开他的研究集体，而他的助手和学生也分享了他的荣誉。”

摩尔根是站在一个科学发展的高度，以前瞻的目光来构建未来的生物系的。摩尔根认为，这个生物系应该具有现代思想，现代科

学方法，应该把遗传、胚胎发育和进化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基础理论上解决系统发育和个体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从属的各种问题。在摩尔根的心目中，这正是生物学的根本问题。

摩尔根的这一指导思想决定了他的“蝇室”在人才吸纳上的不拘一格。

摩尔根的“蝇室”成员中，有被称为摩尔根三大弟子的诺贝尔奖金共同获得者布里奇（Bridces，1889—1938）、司多芬特（Sturtevant，1891—1970）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穆勒（Muller，1890—1967）。除此之外，摩尔根还把荷兰著名植物学家文特（WENT）的儿子小文特请到加州理工学院研究植物的生长激素等问题。与此同时，摩尔根还请来了荷兰的植物生理学家东柯（Dolk）和动物生理学家费斯曼等。

尽管摩尔根以果蝇作为材料进行遗传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他不局限于此，进而又引进玉米材料，以论证遗传规律的普遍性。于是他又请来了玉米遗传学家爱默生（Emesoon）的儿子小爱默生等。

至30年代，摩尔根实验室已成为世界遗传学活动的中心。这自是令年轻的谈家桢得益多多。

先后来摩尔根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和交流访问的世界各国学者有：在1908年提出哈代-魏因勃定律的英国数学家哈代（Hardy，1877—1947），英国遗传学家、古典统计分析的创始人费希尔（Fisher，1890—1962），美国最早、最杰出的农业病理学家琼斯（JONES，1864—1945）和美国遗传学家、群体遗传科学创始人之一莱特（Wright，1889—1988）。

其中有一件事令谈家桢印象至深：1934年，他在摩尔根实验室

第一次见到了长期从事玉米遗传研究的美国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女士（McClintok，1902—1988）。1944年，她提出“转座因子”理论。至1956年，她又首先提出存在着一种可在染色体上移动的“控制因子”，并发现被称为“跳跃基因”的DNA片断；三十多年以后，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被人们所认识，她为此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麦克林托克女士第一次见到谈家桢时，就对他在1934年发表的论文《异色瓢虫的鞘翅色斑的遗传》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鼓励谈家桢对这一课题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1946年，谈家桢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再度遇见麦克林托克女士，当谈家桢把几年来自己研究的异色瓢虫的鞘翅色斑镶嵌性现象告知麦女士时，她立刻表示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至80年代谈家桢重访美国与麦克林托克女士聚谈时，麦坦诚相告，当年她提出“转座因子”的概念以及其后进一步发现“跳跃基因”，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受到谈家桢的镶嵌性理论的启发。

科学具有共通性。一种科学理论的发现，通常能为众多的科学家所共享。谈家桢至今还难以忘怀的是他和德国遗传学家包厄的相识，谈家桢向包厄请教了染色体的操作技术，并借助这一技术进行唾腺染色体定位的基础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绘制成常染色体基因连锁和细胞图，进而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1937年，也就是在摩尔根实验室担任研究助理的这一年里，谈家桢充分地显示了他的杰出的组织能力。他发起组织了一个“美国—中国友好协会”，并被推选为会长。这个协会的成员包括著名航空学家、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和他的妹妹，还有众多的学者和工程师。这一年，谈家桢回国前夕，协会会员为谈家桢举行了隆重的欢送活动。

第三节

唐家祠堂的追求

◆ 一、竺可桢和浙江大学 ◆

时至1997年，浙江大学成立一百周年。一所百年学府，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抱定树人育才宗旨，随着历史的脚步，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栋梁之材，自是名垂青史、功不可没的。

谈家桢自1937年7月学成归国后，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函聘，任该校生物系教授，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赴复旦大学任教，前后十五年，除开出国讲学和访问，一直在这所具有悠久教学传统、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而这十五年，对于谈家桢来说，正是事业上开拓进取的黄金时期。

谈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浙大，自然不能不提到当时的校长竺可桢先生。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开拓者。1918年，竺可桢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归国。于1936年6月以气象研究所所长身份接任浙江大学校长。晚清以来，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以科学精神办学而影响深远、成绩卓著者，竺可桢校长是其中一人。竺校长的办学之道，首先是以身作则，谈家桢至今常常想到，当年竺校长的人格力量，对浙大的学者群而言，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凝聚力。俗谓："众志成城。"当年的浙大，在短短的几年中，由一所只有3个学院、四五百学生的地方性大学，

发展成为拥有7个学院、10个研究所、30个学系，教授、学生和教职员工7000余人的完善大学；其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驰誉中外，人口皆碑，正是因竺校长的领导有方、全国著名教授成集于此、大家协力同心所致。竺校长的以身作则，表现在他的领导艺术上，便为虚怀若谷，海纳百川，总揽全局，任人唯才。

谈家桢时时忆起，1937年，他经留美朋友朱正元介绍，由他的老师、时在浙大任理学院院长的胡刚复先生推荐，竺校长代表浙大亲寄聘书给他，聘他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月薪三百元，谈家桢时年28岁，与竺校长一非师生，二非故旧，获此高职厚遇，殊为不易。由此可见，竺校长确是任人唯才，不讲派系，把他这个“外来人”也聘进了。与此同时，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的谭基骧教授，也都由他聘来浙大，一并委以重任。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竺可桢当年的不拘一格，广征人才，其实正是以浙大为基地，为中华民族构筑起一个可观的人才资源高地。竺可桢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声望可知。

◆ 二、抗战岁月中的谈家桢和浙大 ◆

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依山傍水，但见“水光潋滟，山色空蒙”，其意也秀，其势也雄，身处此中，自会生无限感慨。而觉地灵人杰，浙大是也。

1937年7月，正初夏时分。甫从美国返归的谈家桢在这里会见了竺可桢校长。

热情诚恳、一身长者风度的竺校长为年轻的学者介绍了当时浙大理学院生物系的阵容。其时，理学院院长由胡复刚教授担任，生物系内的知名教授有贝时璋、蔡堡、罗宗洛、张肇骞、张孟闻、仲

崇信、王曰玮、吴长春等，系主任为贝时璋。竺校长满心希望，浙大的生物系在引进谈家桢博士后，能发展成为中国遗传学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基地。

谈家桢充满信心，他要在浙江大学，在这所中国人自己创建的高等学校，为振兴中国的遗传学事业大干一番。

谈家桢到浙大任教不久，上海“八一三”事变，继之，抗日战争拉开序幕。战火很快延烧到杭州。在日机狂轰滥炸下坚持教学达三个月之久的浙大，于 1937 年 11 月，当日军已在距杭州一百公里的全公亭登陆之时，决定举校迁移。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光辉而悲壮一页的浙大内迁。

浙大内迁，历经浙西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最后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和永兴建校，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日军追截，辗转跋涉五千余里。自 1937 年 11 月至 1940 年初，历时两年余，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次胜利的长征了。

1940 年秋，理学院和农学院迁往距遵义 75 公里的湄潭县城，生物系的实验室则落脚在一座破陋不堪的“唐家祠堂”内。

谈家桢后来回忆说：

“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似有模糊之感，唯独浙大西迁遵义湄潭的七年经历，仍记忆犹新。我深深地怀念遵义、湄潭的一山一水，她曾经哺育过我们这一代学人，也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为新中国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

“可以这样说，我一生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些重要代表性论文，就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为自豪的是，在日后的科学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的。我们是吃了湄潭米、喝了湄潭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人哺育了我们。深情厚意，终生难忘。”

◆ 三、终生难忘唐家祠堂 ◆

出湄潭县城西门，有一湄江，江水清澈，江上有桥，桥头水边，其南有一四合院，人称魏家院子。又西南一里地，也有一四合院，便是唐家祠堂了。从1940年起，这里就是西迁后的浙江大学生物系的所在地。院内朝南一排房子，分别辟作贝时璋、罗宗洛、张肇骞和张孟闻的实验室，偏旁两间，谈家桢取其一养瓢虫、果蝇，其一为学生实验室；以后规模随需要扩大，谈家桢又用申请到的洛氏基金搭建一间，作实验用房。

那时的湄潭，没有电灯，大家都用油盏燃着灯草照明，工资因抗战关系而打折扣，物价又不断上涨，生活之清苦可知。然而师生们以校为家，敬业互爱，尊师重教，心情十分舒畅。正如谈家桢所说，他一生学术上有些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在科研上取得突破的同时，在竺校长的鼓励下，谈家桢师承摩尔根“教而不包”即倡导学生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独立开展研究的精神，培养了后来在科研、教学上均有所建树的第一代研究生：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和刘祖洞，进而又由他们协助指导，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中国生命科学事业的接班人。动荡不定的生活，给师生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困难。但谈家桢和他的学生们目标坚定，白天一起进行果蝇和瓢虫的野外采集和试验研究，晚上在煤油灯下对着显微镜进行观察，一步一个脚印，艰苦跋涉，而乐在其中。

1942年，湄潭生物系成立研究所，为浙江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后改称生物学研究所。该研究所除招收国内研究生外，还有印度研究生，谈家桢的第二代弟子中，就有一位印度学生甘尚澍。

1944年，谈家桢在这座破祠堂里取得研究上的突破，发现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现象，并在对此现象的规律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

于1946年发表了《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嵌镶显性》。这是他在遗传学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并很快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重视。

同年，英国科学史学家、剑桥生物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驻华文化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两次去浙大遵义总部和湄潭参观，重点参观和考察了湄潭理学院，当他看到生物系师生在唐家祠堂这所土房子里获得的研究成就时，当场为之色动，十分感慨地说："浙大可与英国的著名大学相比，是东方剑桥啊！"

李约瑟回国后，把他在中国多年的活动记录编成《科学前哨》一书。他在书中曾这样描述浙大和湄潭："浙大虽有几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维持交通，但已经是破得无法修理，也无新车补充。年高望重的学者和教授们，往来遵义与湄潭之间，须得攀上满载的军用卡车，途经人烟稀少的郊野，有时竟需两天之久。"

他又写道："在湄潭，研究工作是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内分泌系统的研究。这里关于甲虫类瓢虫所作的色斑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已引起很大的兴趣……"

第四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

◆ 一、输送人才　为国服务 ◆

1945—1946年间，谈家桢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赴美任客座教

授。在美讲学同时，谈家桢对异色瓢虫的嵌镶现象的规律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并完成了这一现象的理论研究，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嵌镶显性遗传理论”的新遗传学理论。1946 年，谈家桢发表《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嵌镶显性》一文，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

1945 年，谈家桢在纽约与导师杜布赞斯基相遇。其时，杜布赞斯基鉴于李森科主义在苏联遗传学界的泛滥并必将危及乃至扼杀遗传学在苏联的发展，决定长期留居美国从事科学研究。这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从事遗传学和现代进化论的研究近五十年，发表论著十余部，论文六百篇，成为 20 世纪著述最丰、影响最大的科学家之一。

这次师生重逢，自令双方都欣喜不已。谈家桢向杜布赞斯基郑重推荐了自己的四位得意门生，也就是被称为“四大金刚”的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和刘祖洞。他表示，希望四位学生能像自己当年那样，在杜布赞斯基的帮助下去美国深造，日后成为遗传学各个分支领域中的佼佼者。

多年来，谈家桢在自己的学生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学业上的循循善诱，到经济上的倾囊相助，他真正做到了竭尽己力。他热切期望学生们能成为中国遗传事业的中流砥柱，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在他的第一代学生中，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刘祖洞等四位正是具备了谈家桢所期许的科研能力和敬业精神。

盛祖嘉，著名微生物遗传学家。1940 年起师从谈家桢，毕业后担任研究助理，1941 年升任助教，跟随谈家桢达半个世纪之久。1946 年经谈家桢向杜氏推荐，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微生物遗传所攻读博士学位。1951 年学成归国。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后，随谈家桢一起到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从事教学和科研。1961 年复旦遗传研

究所成立后，盛祖嘉出任副所长，襄助谈家桢主管遗传学研究日常工作，并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生物系部主任。作为博士生导师，他继承乃师谈家桢“教而不包”的教学风格，辛勤育人，为中国遗传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施履吉，著名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常务院士。施履吉原是浙大农学院毕业生，在大学期间就十分钦佩谈家桢的研究工作和教学风格，毕业后主动要求做谈家桢的研究生。施履吉勤奋好学、钻研执著，被谈家桢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1946 年，经谈家桢引荐，师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罗特斯教授从事玉米植物遗传研究，后又随泼利斯特教授学习细胞和细胞化学技术。1955 年学成回国。长期在中科院上海细胞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分子生物学研究上取得众多突破性研究成果。

徐道觉，著名肿瘤细胞遗传学家。施履吉在浙大农学院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先在广西农学院任助教。不久申请到洛氏基金会研究基金，但他本人主动要求到谈家桢实验室工作。1946 年经谈家桢引荐，师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潘德森教授从事果蝇遗传研究，取得博士后，专事肿瘤细胞学的研究，现居美国，有“肿瘤研究之父”之称。

刘祖洞，著名动物育种进化遗传学家。广西农学院 1942 年级桑蚕系毕业，经徐道觉介绍，师从谈家桢，先为研究生，后在谈家桢实验室工作。1946 年经谈家桢引荐，师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德斯教授（Drece）从事数量群体遗传学研究，学成归国后，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从事高等动物进化遗传和人体遗传研究。

当年，谈家桢未能留在美国跟杜布赞斯基一起从事果蝇群体遗传学研究，杜氏一直引以为憾事，此次，他满心希望让谈家桢的学生当自己的助手，重续前事，虽是一厢情愿，也属情理之中。而当

时的现实情况是，微生物遗传学和人体遗传学已是遗传学发展的方向，对国内而言，这两个领域都是空白。

在谈家桢和杜布赞斯基之间，这是一次心理上的冲突。从感情上讲，他完全同意杜氏的设想；从理智上讲、从发展中国遗传科学事业的角度上讲，他觉得应该根据四位学生的自身特长，高屋建瓴，在专业问题上从善而择。最后谈家桢选择了后者，支持盛祖嘉改学微生物遗传学，施履吉专攻细胞技术研究，徐道觉转事肿瘤遗传学，刘祖洞选学数量遗传学。

谈家桢的决定，自然引起杜布赞斯基的不快。直至1948年谈家桢再度访美时。杜氏对此事仍不释于怀。从谈家桢而言，自是唯能感叹“国家事、师生谊，古来难两全”了。

◆ 二、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 ◆

1948年，谈家桢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唯一代表，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谈家桢宣读了论文《异色瓢虫色斑的季节性变异》，并被推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

然而，令他震惊的是，他听到了一个对整个遗传科学事业发展极为不利的信息。那次会议的组织者是诺贝尔奖得主、国际遗传学会会长穆勒教授。穆勒教授在开幕词中告知与会者，在刚刚结束的全苏（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大会的决议中，已经宣布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是“烦琐哲学”、“反动的唯心主义”、“伪科学”和“不可知论”，并声称，遗传学家信奉“米丘林主义”还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从本质上看，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世界观在生物学中的反映，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为此，苏联关闭了细胞遗

传学等有关实验室，开除并逮捕了许多不愿在压力面前放弃自己的信仰和对真理追求的科学家，销毁了有关教科书和文献资料，甚而“消灭”了果蝇。苏联还拒绝派代表出席这次国际遗传学会议，以“抵制这样一次国际性的摩尔根主义者的集会”。

会议期间，谈家桢又获悉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会议组织委员会副主席、全苏农业科学院奠基人、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所长、苏联著名科学家瓦维洛夫教授，因抵制李森科的理论和他的学阀作风，竟遭致逮捕并被迫害致死！

悲痛和惋惜之余，谈家桢忧心忡忡。

◆ 三、李森科其人和苏联的一幕悲剧 ◆

早在1946年，谈家桢在美讲学期间，就“拜读”了李森科写的那本小册子《遗传与变异》。于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米丘林生物学”这个名词，又透过字面，看出李森科把风马牛不相及的“米丘林生物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硬凑在一起，其实无非是在标榜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一副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师爷”的模样。他很自然地联想到了那些旧中国“舞台”上的江湖术士。当然，令他更为迷惑不解的是，政治何以能代替科学、干预科学？他不敢想象下去，这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科学上的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分歧和争论是正常的，甚而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的认识，只有经过反复的论证，以及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不断得以深化，才能不断地接近真知。所谓“真理愈辩愈明”，便是这个道理。

可悲的是，在当时的苏联，事情并非如此。

李森科（1899—1976），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

毕业于基辅农学院。1928 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发现自己父亲把越冬小麦放到春天去种植，意外地获得了好收成。李森科便“深受启发”，提出了“春化作用”的概念，竟由此一举成名！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众所周知，农业问题在苏联，历来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敏感的大问题。1927—1928 年，苏联乌克兰地区因霜冻而导致冬季作物大幅减产，其时正令苏联党政要人们大伤脑筋，李森科的“春化作用”概念，不啻是给解决农业问题困境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福音，李森科在他们的眼里，自是成了“回春有术”的救星。于是，在苏联农业部和乌克兰农业部的支持下，成立了春化作用研究室，李森科则被授命主持其事。

在苏联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搞“伪科学”，势必要走政治投机的道路，势必会打着政治旗号去大肆打击、挞伐、迫害学术上的异己力量。李森科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造就的特殊人物。

自 1928 年至 1956 年的近三十年间，前苏联生物学界围绕李森科对遗传与变异的观点，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甚而展开激烈的争论。科学上的争论是正常的，一个心胸坦然对自己的学术观念充满自信的科学家，必定对这样的争论抱着热诚欢迎的态度。遗憾的是，李森科不是这样的科学家，李森科不是这样的人。这样一来，事情就不可避免地朝着悲剧性的结局发展了。

当时的情况是，李森科在提出“春化作用”概念的基础上，进而在 1931—1934 年提出了“植物阶段发育理论”，这个理论一出台，就博得了来自科学院一些名教授的喝彩声，李森科越发趾高气扬。偏偏集体农庄的农民应用李森科的理论，导致小麦产量的大幅减产。于是，正直的科学家讲话了，长期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马克西莫夫把科学的事实摆在人们的面前，他希望通过争论，把认识进一步引向真知。

马克西莫夫过于天真了。他忘了其时正是30年代的苏联，清算“人民的敌人”的狂想正把社会引向一个大规模镇压的景状，科学争论和政治斗争的界限早已含混不清。偏偏李森科又是一个那么善于把科学问题与阶级斗争挂上钩，从而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高手。

1935年，在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手人民代表大会上，李森科粉墨登场了。他慷慨激昂，手中似乎攥着一根人们肉眼隐约可见的神奇“魔棍”，他踌躇满志，飞扬跋扈，得意洋洋地嘲弄着循序渐进的科学本身，他要把那些在学术上与他为敌的对手碾成粉末！他把“魔棍”在空中画了一个圈，于是，一个大网编织起来了：“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农业科学正在超过、在有些部门已经超过资产阶级科学。我们的科学，其任务和研究不同于资产阶级科学。旧科学的任务是帮助资产阶级、富农和一切剥削者，而我们科学的任务则是为集体农庄的建设服务。资产阶级科学的基本内容是观察和描述现象，而我们的科学则是改造动植物世界。”

这样一段在今天看来荒谬绝顶的胡言乱语，在当时，在那个调头越“左”便越“革命”、越“科学”的年代和环境里，却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没有人敢站起来反驳。当然李森科发言的目的远不仅止于此，他清了清嗓子，调门继续拔高：

“同志们，事实上，尽管苏维埃的现实所创造的春化处理能在四五年这个比较短的时期成为科学的一个完整部分，然而，对打退阶级敌人的一切进攻，我们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同志们，富农破坏分子不仅在你们的集体农庄生活中出现，这是为你们所熟知的，他们在科学界也同样危险，同样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说到这里，李森科终于图穷匕首见，撒开了罗网：“在保卫春化处理的斗争中，我们同某些政治科学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流

了不是一点点血，在实践中必须经受的不是几次打击。同志们，在春化处理战线上难道没有阶级斗争吗？在集体农庄，有富农和他们的教唆者，他们继续悄悄地向农民耳语说，'不要浸种子，这会毁了它们。'情况就是这样，这种耳语，富农和破坏分子的这种欺骗，不是在帮助集体农庄的农民们，而恰恰是起了破坏作用。阶级敌人总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

李森科的一席奇谈怪论，分明是把正常的学术论争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把自己学术上的对立面推到了死路上，科学上的弄虚作假导致了政治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表现形式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就是无限上纲。偏偏就是这样一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讲话，却博得了斯大林的赏识，这位苏联党政军最高首脑称赞说：

"好，李森科同志，好！"

于是，事体越发搞大了。斯大林的"好"，是李森科的一柄"上方宝剑"，李森科祭起"上方宝剑"，口中念念有词，一时间，苏联科学界的上空黑云惨惨，妖风阵阵，好不怕人也。

马克西莫夫成了这场争论的牺牲品，中箭落马了。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所长萨宾宁伯被解除了职务。此前，苏联遗传学创始人、群体遗传学的奠基人切特维里科夫被逐出研究所，遭致流放的下场。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先是在中央报刊上受到警告，继因其仍不屈服于李森科的淫威，而被视为眼中钉，被宣判为"孟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分子"、"科学的反动派"，被剥夺了出席 1939 年在爱丁堡举行的国际遗传学会议和发表讲话的权利，他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则由李森科取代。

1939 年，李森科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瓦维洛夫不服，上书前苏联政府和最高人民委员会，陈述自己

的一贯立场及对这场争论的态度，并揭露李森科利用职权，排斥异己，罗织莫须有罪名，施行打击报复的事实。然而，大势已成定局。苏联农业人民委员会贝耐迪科在科学院的一次讲话中对此事所下的结论是："我们正式谴责孟德尔主义和形式遗传学造成的不良倾向，同时坚持不给予这种谎言以任何支持。"

坚持真理的科学家实际上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

1941 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宣判瓦维洛夫死刑。

1943 年 1 月 26 日，这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死于萨托夫监狱，终年 57 岁。

这位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科学家在离世前写下了不朽的诗句：

> 我们将走向焚尸场，
> 我们将被焚化，
> 但我们
> 决不放弃我们的信念。

瓦维洛夫的遇难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一个耻辱。国际遗传学界人士为之震惊。

利令智昏的李森科决意把事体继续做大。

◆ 四、摩尔根学派在苏联 ◆

1948 年 8 月，大权在握的李森科一不做，二不休，精心策划、组织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即臭名昭著的"八月会议"。

这是一次大肆挞伐摩尔根遗传学派的会议。李森科为了铲除异己，发明创造了"政治科学家"一词，而他自己恰恰便是一个货真

价实的“政治科学家”，一个专搞政治陷害的伪科学家。以政治权柄蛮横干预，进而企图操纵学术，从伽利略、哥白尼案以来，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已是不乏前例。至于李森科，可谓20世纪之登峰造极。

这次会议得到了苏共中央乃至斯大林的直接支持，李森科在会议召开伊始，以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身份所作的报告《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就是经过斯大林亲自修改、复经联共（布）中央批准的。

就在李森科的这个报告中，摩尔根遗传学被宣判为由外国输入的、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反动生物学，是“烦琐哲学”、“反动的唯心主义”、“伪科学”和“不可知论”。

这次会议以后，在苏联，李森科学派“取得了全面胜利”，摩尔根学派由一开始的被排斥，到完全受到废黜，甚而销声匿迹。

继而，在苏联，数百名持不同意见的知名科学家，先后被指控为：

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反动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

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同谋；

对西方世界卑躬屈膝；

种族主义、形式主义和世界主义；

“闭门造车”、非生产性；

反马克思主义和反达尔文主义……

这些有名望的、曾对科学事业作出贡献的正直的科学家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政治迫害。

与此同时，在苏联，许许多多的遗传学、细胞学和生理学实验室被关闭。

科学总是科学，与科学背道而驰的结果是，苏联的遗传科学、

农业科学和医学科学等科学的大倒退，乃至引发苏联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政治企图愚弄科学，最后被愚弄的恰恰是政治自己。可悲的是人类经常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 五、“我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

李森科之流的倒行逆施，臭名远播的“八月会议”，这令人为之作呕的一切，在谈家桢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在瑞典举行的那次遗传学会议期间，谈家桢和穆勒相遇，很自然地谈到了李森科和苏联的话题。

穆勒从青年时代就是一个思想激进的社会主义者。1923 年，应瓦维洛夫之邀，穆勒赴苏联从事研究工作。李森科对摩尔根学派进行疯狂镇压的行径，引起穆勒的强烈不满，并被迫离开苏联。1938—1940 年间，穆勒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40 年返回美国。

性格直率的谈家桢开门见山地问穆勒：“你一直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何以不相信李森科的那一套呢?”

穆勒稍作思考后，神情严肃地回答：“我在政治上相信共产主义，但政治毕竟不能代替学术。在遗传学理论上，我有我的思想，我不同意他们那一套理论，更不欣赏李森科的做法。”

这位正直的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在苏联的“八月会议”后，即宣布辞去苏联科学院国外院士的职务，作为对李森科之流倒行逆施的抗议。

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以后，谈家桢应邀前往美国纽约作学术性访问。

其时，在中国国内，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进而解放全中国近在眼前，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政权已成定局。对于每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都面临着何去何从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严肃问题。

美国科学界的许多老朋友都为谈家桢回国后的处境表示担忧。

苏联正把摩尔根学派往死里整，你是摩尔根的弟子，你回到同样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大陆去，共产党会给你什么好果子吃？

你既然人已在美国，就干脆定居下来吧！在这里，有你熟悉的师友，还有你的学生，更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和一流的实验室设备，你就安安心心地在美国搞你的瓢虫和果蝇实验，搞你的遗传学研究吧！

其时，日本广岛刚遭美国原子弹轰炸不久，有人建议美国科学家尼尔（Near）与谈家桢同赴日本，共同研究广岛原子弹射线的遗传效应。

归去还是留下？谈家桢面临着现实的抉择。

“你是摩尔根的弟子，回去后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这声音，如同鼓点，时时敲打着谈家桢的心。

平心而论，谈家桢如果当时留在美国，如同他的弟子徐道觉，那么他今日的生活，他在事业上的成就，将是另一番局面。

是的，谈家桢在当时，确有一段前前后后、反反复复的思考过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谈家桢的远虑是什么？谈家桢想到的，是先个人还是先国家？是个人身家性命还是他一直为之奋斗的中国的遗传科学事业？

他把自己立志献身科学所走过来的一段路从头至尾地想了一遍，他尤其想到了和浙大师生、和敬爱的竺校长及许许多多可敬的同仁们在抗日战争岁月走过来的那段艰苦创业、同甘共苦的里程，想到

了自己对振兴中华所怀抱的理想……

于是，一个信念在他的心中升起——

“不管如何，中国是我的祖国。我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我一定要回到中国去！”

1948 年底，谈家桢满怀信心，返回祖国。

第三章 毛泽东与谈家桢的友谊

研究历史与叙述历史是有区别的。

研究历史通常需要站在高屋建瓴的地位，全面地、本质地揭示历史的必然性；叙述历史则是客观地反映一个特定的历史进程、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而这一特定的历史进程、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往往既具备历史的本质的、必然性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个别性和偶然性的一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细腻地摹绘、再现这一过程。譬如，本书述及的毛泽东与谈家桢的遇合，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

第一节 毛泽东与自然科学

◆ 一、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 ◆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教授谈及对毛

泽东的印象时说：

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高级学者”。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则认为：

毛泽东“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自然）科学的情况”。

对于自然科学，毛泽东一直是“情有独钟”。1940 年 2 月 5 日，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应邀出席，并深有感情地讲了这样一段话：“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他又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

他归结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是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毛泽东在这段话中表达了一个思想，那就是，“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而且，自然科学与社会的进化和发展，与人民的生活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毛泽东选择了革命者的人生道路，这已成为历史事实。但是，即使是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抑或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这位思连古今、神接千载的领袖人物的视野所及，始终没有离开过自

然科学。

1921年，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在长沙举行新年大会。“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会员们各自畅谈自己的学习计划。毛泽东发言了，他的神情严肃而诚恳：

“觉得普通知识重要，现在号称有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我）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想方设法补足。”

这一年，毛泽东二十八岁。

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青年革命家毛泽东义无反顾地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以解放全人类为其宗旨的伟大革命事业中。自然，在读书方面，他便不得不作出“最痛苦的牺牲”，对于他来说，这应是一件不无遗憾的事情。后来，他曾对友人说：“我很想请二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允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毛泽东的这种愿望，后来在与自己亲人的思想交流中也有所表露。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失散有年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回到延安自己的身边。不久，毛泽东又把儿子们送往莫斯科。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提笔给远在异国的岸英、岸青写信，他一再叮咛两个儿子：

“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从二十年代起，革命活动占据了毛泽东几乎整个生活空间；从五十年代开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他更是心连广宇，日理

万机。即便如此，他仍抽空钻研农业、机械、化学、水文、气象、地质等诸多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更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毛泽东曾经请钱三强讲授核物理学的知识，并观看核探测仪器的实验表演；

毛泽东曾经研读李四光所著的地质学方面的论文和专著，了解天体起源、地球起源以及石油成矿理论知识；

毛泽东曾经虚心聆听杨振宁、李政道讲解“基本粒子结构问题”和“对称性”问题；

毛泽东为了研究战争，曾经提出战争规律中的概率性问题，把概率知识纳入他的知识结构；毛泽东为了研究农业科学，曾经认真学习了土壤学、植物学和微生物学理论；毛泽东为了讲哲学，不仅学习了牛顿力学知识，还学习了狭义相对论知识，并把欧基里德几何和非欧几何知识应用到辩证法的论述当中去。

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就他所见，毛泽东读过的自然科学的经典著作就有：

赫胥黎的《天演论》；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汤姆生的《科学大纲》；

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

摩尔根的《基因论》等等。

◆ 二、畅谈非欧几何学 ◆

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关心，对科学的兴趣，在党内是有口皆碑的。杨尚昆回忆说：

“他把中学物理、化学实验的仪器买来摆在寝室外面。过去曾在中南海瀛台搞过一些展览，例如机械方面的，等等，他都要亲自去看。他不只是参观，还找有关的书来学习。他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有一次他外出的时候，李烛尘陪着他，他就跟李烛尘谈化学，谈起硫酸的分子式，当时我在旁边，毛主席记得很多的化学分子式。”

1952 年，毛泽东会见李四光，开门见山就问：

“你那个山字形构造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给我讲一讲?”

谈话中，他还请李四光为他收集有关地质科学的资料。

1953 年 2 月 23 日，毛泽东视察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毛泽东仔细地观看了浑仪、简仪。对着这些五百多年前的古代测量天体位置和运动的科学仪器，他赞叹不已。他又拿起陨石反复地观看。后来，毛泽东走到一张旋涡星云的照片前，站了下来。

“现在有一种太阳系起源的新学说，认为太阳系的物质，起初是冷的，后来慢慢变热，然后又从热变成冷。”

毛泽东十分推崇康德的“星云学说”，他说：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学说’。”

1955 年 1 月，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最好明日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毛泽东接信后。立即会见了李四光、钱三强，就中国原子能科学发展进行了畅谈。

葛庭燧，著名物理学家。他发明的“葛氏摆”以及他发现的晶体间内耗峰（史称“葛氏峰”）和内耗与金属力学性质理论，都先后闻名于世。1955 年，葛庭燧随郭沫若访日回国，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他们，并设晚宴招待。席间，郭沫若向毛泽东介绍说，42 岁的葛庭燧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员。毛泽东高兴起来：

"好嘛，要赶上去嘛，要培养年轻人嘛!"

席间，毛泽东向大家让烟，让到葛庭燧时，葛摇着手说自己不会抽烟，毛泽东笑了："年轻人不吸烟是好事!"又问葛庭燧："你是哪里人?"

葛庭燧说："我是蓬莱县人。"

毛泽东朗声笑了起来："这是个好地方，出神仙啊!"又说："你们那里还出了个吴大帅呀!"

葛庭燧说："吴佩孚是罪魁祸首。"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好啊，要学点革命历史啊!"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接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谈起了非欧几何学知识，毛泽东还讲述了直和曲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说："在欧基里德几何中，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是直线；但是，在非欧几何学中，两点之间最短的线不是直线，而是曲线，是测地线，是球面上的大圆……"

毛泽东那个时候的知识面，已包含了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非欧几何学。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日常工作中创造的分析方法，譬如，关于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分析，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之分，其实已经接触到现代模糊数学的最基本概念——隶属度概念。可惜的是。1965年美国科学家扎德（L. A. Zadeh）创立的模糊数学没有及时传入中国，否则，毛泽东完全有可能引入隶属度的科学概念，创立中国的领导科学理论。

也有人认为，毛泽东评价人的一生，用的是要看其"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的方法，实际上已经应用了统计物理学中的"系统"概念。

◆ 三、“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 ◆

1956 年 2 月 1 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招待会上，毛泽东特意安排刚刚回国的科学家钱学森和民主人士张敬礼（中国近代实业家和教育家张謇的侄子）坐在第一桌，毛泽东、周恩来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这一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又接见了参加拟制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们。

正是基于对自然科学的特殊感情和深入认识，毛泽东十分清楚科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

1953 年 8 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提纲》时，向他的同事们明确指出，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要开展一场技术革命。

1956 年 1 月 20 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谈道：“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大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

他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958 年 1 月，在著名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向全党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位充满诗情的领袖还富有科学预见地提出：“要向地球开战，要革地球的命。”

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物质世界。科学的进步必然会引发技术上的革命，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繁荣昌盛。毛泽东把巨大

的热情倾注在中国的科技进步上。仅1960年4月30日到5月28日，毛泽东先后参观过天津市技术革新展览，河北省工业、交通技术革命展览，山东省技术革新展览，河南省工业、变通技术革新展览和上海市技术革新展览及尖端技术展览等。

1963年，毛泽东在听取中央科学小组汇报时，强调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接着他又说："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

◆ 四、"毛粒子"的故事 ◆

这一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毛泽东看了，对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十分赞赏。

1964年8月下旬，毛泽东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和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请了去。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谈道，宇宙是无限的，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因此，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毛泽东还谈到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观点，谈到了生命的起源。

这次谈话，主、客都十分尽兴。谈话结束，言犹未尽，意犹未尽，而影响弥远。

1977年，美国夏威夷。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在这里举行。在这次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肖在回顾了物理学家们逐层深入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后，向他的同行们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

子'，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入的统一"。

◆ 五、"主席啊，您是有意考我吧?" ◆

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一直深入到日常生活、与工作人员的交谈中。

一天，毛泽东和保健医生徐涛一起散步聊天。正夕阳西下，毛泽东望着落日的余晖，若有所思地说："我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喜欢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读得不多，还得补课。"

徐涛接口说："我正相反，自然科学的书读得多些，社会科学的书读得太少，现在也得补课。"

"我们以后多聊点自然科学嘛。"毛泽东变得兴奋起来，"你说，石油是怎么开采的？怎么提炼？都有哪些用途?"

徐涛尽己所能，一一予以相告。

毛泽东越发不满足，越问越细。终于把徐涛问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徐涛红着脸，喃喃地说："哎呀，我也说不上来了，得去查查书。"

毛泽东笑了。脸上流露出孩子气的天真和得意。

时日一久，毛泽东的新问题不断地涌来，煤炭、钢铁冶炼、化工、无线电，什么都问。

徐涛一次次地被问住，一次次地去查书。查好了，两人再聊。

后来，毛泽东干脆让徐涛写成文字交给他看。徐涛渐渐发现，自己读的书，毛泽东也在看，提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入。于是，徐涛不得不抓紧时间更多更细地读书。

这实在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终于，徐涛觉得招架不住了。

“主席啊，您是有意考我吧？”

毛泽东咯咯地笑了起来，轻轻地拍着徐涛的后背：“哪是考你哟！你在帮助我读书，帮助我增长知识。我们现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还要搞第二个、第三个，不学点自然科学不行哩。”

◆ 六、二约李四光 ◆

1964 年 2 月 6 日中午，地质学家李四光正在家中用饭。电话铃响了，来电说，请他立刻去中南海。李四光匆匆地扒了几口饭，便急急地赶去了。一位特意在门口等候他的工作人员把他领进了毛泽东的卧室。与他一前一后，竺可桢和钱学森也到了。

毛泽东见到三位客人来，显得很高兴，忙忙地，请他们在自己床边坐下。就这样，主、客四人，围绕着天文、地理和尖端科学等重大科学问题，饶有兴致地交谈了三四个钟头。

这一天，李四光回到家里，仍余兴未尽，一五一十地对家人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说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

1969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又把李四光请去。在休息室里，领袖和科学家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这次谈话，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真是广及多少亿年间的话题！

当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还有点道理。”

他对李四光说，他很想看看李写的书，希望李找几本给他。又

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说到这里，毛泽东很谦虚地，特意关照李四光："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李四光问。

毛泽东十分幽默地用手在前方画了一个大圈，而后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李四光请秘书帮助他找书。

李四光想，主席这么忙，总不能把自己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几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上去。

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李四光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送达毛泽东处。

而后，李四光又立即开始着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为此，他看了许多国外资料和书籍，然后，对着这一大本一大本的书，李四光伤起脑筋来："这些书的内容太烦琐，还有一些是错误的，怎么好一古脑儿都端给毛主席看呢?"

李四光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那就是，把当时地质学说中各个学派的观点都包括进去，再加上李四光自己的评论，并阐述自己的观点。

就这样，李四光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要写的资料基本上整理完后，一连写了七本书。每写完一本，就让秘书马上送印刷厂，用大字排版，取回来后，李四光又亲自校对。这七本书全部印好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呈毛泽东。

◆ 七、毛泽东与杨振宁、李政道 ◆

1973 年夏，步入晚年的毛泽东会见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博士。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十分有兴趣地与杨振宁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这令杨振宁十分惊讶。

毛泽东对物理学的兴趣确实是浓厚的——杨振宁很自然地想到。因此，毛泽东对杨振宁在实验室里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怀有某种好奇，显然是跟他在哲学上的兴趣有关系。

这是一场高水平、高智商和高层次的谈话，双方的谈兴越来越浓，谈话涉及许多方面。

毛泽东告诉杨振宁，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曾推测过物质的结构，他还引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话，这又激发了扬振宁很大的兴趣。因为他原先还不知道有这些东西，他十分乐意了解这些著作。

谈话间，毛泽东问杨振宁："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

杨振宁一时给问住了。他从来未曾想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他略微思考了一下，作了一个他自己并不满意的似乎未能说清问题的答复。问题很自然地转入了这两个词在日常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以便同它们在物理学学术方面的含义作比较，而这两个词的含义的区别是细腻的。这一讨论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却令杨振宁印象至深。

宾主二人还讨论了不同程度的概念问题。杨振宁感到，毛泽东非常仔细地把自己要用的每一个词句都用得十分贴切。

1974年5月30日清晨6点，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下榻的北京饭店房间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李政道被告知，毛泽东准备在一个小时以后，在中南海自己的住处会见他。

这是一次令李政道终生难忘的会面。这次会面一开始，毛泽东希望向李政道了解的，竟是物理学中的"对称"。

在韦伯斯特词典中，对于“对称”的解释是“平衡的比例”，或者“产生于平衡的比例的形式美”。在中文中，对于“对称”也有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解释。

对称，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静止的概念。

毛泽东则一贯认为，社会进化的基础在于变革。动态，而非静态，才是唯一重要的基本要素。他强烈地感到，自己的这种认识放在自然界里，肯定也是对的。他向李政道表示，他十分奇怪，为什么“对称”会在物理学中占有那么崇高的地位?

听完毛泽东的提问，李政道沉思了片刻。他是这次会见中唯一的客人。在他和毛泽东的座椅之间，是一把人们在新闻纪录片里常见到的小茶几，茶几上放着铅笔、纸和两杯绿茶。

李政道顺手取过了铅笔，他把铅笔放在笔记本上，把笔尖指向毛泽东，然后，又把笔尖转向自己。铅笔转过来，又转过去。他告诉毛泽东，铅笔的运动一刻也没有停止，但整个过程却具有对称性。

毛泽东笑了。他十分欣赏李政道的这番演示，他完全明白了“对称”的含义。

谈话又转向“对称”的更深含义。毛泽东问到物理学家能否仅仅根据对称性原理真正描述出普遍规律?

李政道解释了爱因斯坦根据等价原理的对称要求而建立的相对论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李政道和毛泽东又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问题。李政道告诉毛泽东，它在某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寻求自然界对称的迫切愿望以及建立富有意义的平衡社会的强烈要求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天，李政道离开北京。他登上飞机前，收到了毛泽东的赠别礼物—— 一套阿瑟·汤姆森的1922年版的原版著作《科学概要》。

第二节

毛泽东与斯大林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搞嘛，可不要怕。"

50年代初，毛泽东出访苏联。在那段时间里，斯大林本人给他留下的印象，及至后来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直至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这一切，引发了毛泽东对中国问题的比较思考。

毛泽东认为，中国无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但是，苏联的教训又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给他提供了思考中国问题的余地。那就是，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他一直提倡的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 一、毛泽东初晤斯大林 ◆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第二天，10月2日，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两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以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巩固中苏两国的关系。

这一年的12月16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稍后，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也到达莫斯科。

在这次中国对苏联的最高级访问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与

斯大林等举行多次会谈，就中苏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同时，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就两国的一些有关事项互换了照会。1950 年 2 月 14 日，两国政府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北风呼啸，大雪纷扬。

1949 年 12 月 16 日中午，车站的大钟正敲响十二下。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驶入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作为中国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放下手头冗繁的公务，对这个北方邻国进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难得的一次国事访问，其备受世界各国政府、公众和媒体的关注自不待言。作为东道主的苏联对毛泽东的此次国事访问，也是极为重视，而接待礼仪也是高规格的。

按苏联惯例，斯大林没有去车站迎接他的中国客人。在车站迎接毛泽东的，是斯大林的主要助手、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苏军元帅布尔加宁。毛泽东下得车来，主人们迎上前去，握手，拥抱，并连连地解释，原来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因为知道毛泽东在列车上得了感冒，身体欠佳，再加天冷，临时将仪式从简，只安排了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主宾只需绕行一周，不必答礼。毛泽东含笑表示同意。

莫斯科郊外，姐妹河畔。斯大林的第二别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是斯大林的住所和卫国战争的指挥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斯大林就在这个指挥部里，以苏军最高统帅、大元帅的身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领导苏联全体军民，在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兵临城下的困境中，意志坚定，百折不挠，誓死苦战，转危

为安，击退和赶走了装备精良的法西斯德国军队，并和盟军一起，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

车站的欢迎仪式结束以后，毛泽东一行便前往这里下榻。显然，这也是苏联方面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安排。毛泽东、叶子龙和翻译师哲住在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在二层。

当天下午6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在这里会晤。

6时正，厅门大开，斯大林破天荒地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以及维辛斯基外长站成一排，迎接毛泽东。熟悉苏共历史和斯大林本人的人都知道，就斯大林而言，这是极为破例的一次，斯大林一般是不会站到门口去迎接外宾的。不言而喻，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为了表示对毛泽东本人的尊重、信任和特殊的礼遇。会谈开始后，还有一段小插曲：整个会谈过程中，只有师哲一人作翻译，苏方没有翻译在场。

身着大元帅服、蓄着唇须、留着一头格鲁吉亚浓发的斯大林显然十分激动，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犀利目光把毛泽东端详了又端详，尔后，他开口说了："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他没有松开握住毛泽东的手，又转过身去，把自己的同事们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气氛顿时变得热烈起来。人们在大厅里围成圈子，互相致意问候，互相热情祝愿。

斯大林仍是对毛泽东赞语连连。

"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谦虚地笑笑。

斯大林继续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毛泽东开口了："我是长期受排挤打击的人，有话无处说……"

没有等他讲完，斯大林插话了："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这是一个小插曲。就像以往那样，斯大林没有让谈话对方把话讲完，毛泽东没有能把内心要说的话说出来。毛泽东很快把他的不快克制了下去。

人们像老朋友似的交谈着，徐徐进入会客厅。斯大林在主座落坐，苏方的官员们在他的右侧坐下，毛泽东和翻译师哲坐在左侧。

斯大林又一次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多保重。随后，他略加思索，开始发表谈话："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近在眼前，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的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他顿了顿，又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

他把身子转向毛泽东："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得全面胜利是无疑的。"

说到这里，斯大林的声音变得高亢起来："敌人并不会甘心，这也是无疑的。但是，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已是无能为力。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斯大林的讲话如同在吟诵一首高扬的诗歌。那个时代，马雅可夫斯基式的风格已蔚然成风。即便如此，直到现在，人们还是能从斯大林的讲话中了解到他真正想说的东西。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从粮食问题和土地改革谈到群众工作。不难看出，斯大林正在极力地

揣摩着毛泽东此行的目的和真正意图。

两位伟人虽是首次见面，但他们心里都明白，彼此之间，已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

关于1949年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入胜利的最后阶段时，斯大林是否曾劝阻过人民解放军过长江，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到当时中共中央的临时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一种说法认为，关于米高扬此行是转达斯大林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过长江的口信，其实只是中共党内的“一个传说”。当时参加会议的翻译师哲回忆说，米高扬一来就声明是“带着耳朵来的”。而斯大林承认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到1949年，斯大林的态度变得比较谨慎了。此外，斯大林拒绝调解国共内战，表明他是尊重中共的立场和意见的。再则，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未在公开场合谈到斯大林有劝阻人民解放军过长江一说。

另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劝阻人民解放军过长江并非传说。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王方名的回忆文章：《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文章中写道，作者曾亲耳听到毛泽东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这显然是指斯大林。1984年11月3日，杨尚昆在接见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时，就曾明确指出，当年米高扬曾经传达斯大林的警告，劝阻人民解放军过江。另一个证据则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日记记载：1月4日，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去看望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治中。谈话间，张治中说道，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打下去，苏联则奉劝中国共产党停止于

长江一线。张治中的这一说法正是直接来自苏联，是苏联对华外交人员向张治中透露了苏联的这一意图。再有，便是米高扬的儿子塞戈·米高扬在其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写道，米高扬知道斯大林反对过江，希望有“两个中国政府”。

20世纪的历史已翻过去了，斯人已乘黄鹤去，毛泽东、斯大林都已成为故人。而在1949年12月16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那一个晚上，至今仍值得后人回味。历时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说话，其他人一直没有插话。

斯大林一再地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次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你谈谈，你都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一次来，一来是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二来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则坚持说，你是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我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此前，斯大林和刘少奇在7月间谈话时就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双方签订一个条约。有趣的是，这回，斯大林似乎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也许，沧桑变化，斯大林的性格、脾气也在变化，他怕给中国客人留下一个武断的感觉，更怕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许，他可能考虑到过去自己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当的做法，因此这次表现得很谨慎。

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出个什么东西来，这个东西么，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是完完全全属于毛泽东的语言，饱含着哲理和幽默。翻译怕苏联的官员们不解其意，在翻译时又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

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然而，苏联人还是瞠目结舌，茫然不解其意。只有一个人是个例外——贝利亚——他竟然笑出了声音。

斯大林也显然不理解东方人的幽默，但他毕竟表现出领袖人物的沉着和冷静，他仍是婉转地一再询问。毛泽东呢，偏偏是不肯明说，也许，他认为应该由苏方主动提出帮助中国，不卑不亢，这也是大国领导人的风度。

末了，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感到大惑不解，他皱着眉头问：“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呢?”

斯大林在追根刨底，毛泽东呢，一直没有再回答。

这次中苏最高级会谈，自始至终，双方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按照斯大林一贯的思路和做法，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之间，凡要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应该由他——斯大林亲自签署，至于对方呢，自然必须是毛泽东签字，如此，才门当户对，顺理成章。毛泽东呢，却立意要把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这一任务。这是毛泽东的风格，毛泽东的思路。斯大林实在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五亿中国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两位伟人，毛泽东和斯大林，在第一次会晤时就遇上了难题。心理的差异，性格的差异，民族心态的差异，加之历史上的原因，尤其是这两位面对面的伟人，在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时，本身就具有一种常人所无法理解的、独特的禀赋和气质，于是，隔阂和不快也便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了。

◆ 二、斯大林的让步 ◆

历史通常如此：不尽如人意，差强人意。眼前，对于斯大林来说，便是如此，因为他所面对的毛泽东，乃是一个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的人。诚然，解决事情的关键往往还是时间。

首次会谈后的几天里，两位伟人都在思考、等待和试图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路来。

斯大林似乎显得更为焦急，他派了莫洛托夫和罗申去毛泽东的住处，嘘寒问暖，围炉长谈，拐着弯儿想摸清毛泽东的思路、此行的目的和意图。后来，斯大林干脆亲自给毛泽东打电话，询问他有什么想法和愿望，双方应该进一步做些什么，上次会谈后毛泽东是否有新的考虑等。斯大林甚至还给毛泽东的翻译师哲打去电话，想通过师哲了解毛泽东的想法。

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同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自然，他们也会来看望毛泽东。有一回，毛泽东对着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情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到这里来，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和睡觉的吗？"火气虽大，却仍包含着毛泽东式的幽默。

这通脾气发过以后，毛泽东的情绪变得好多了。柯瓦廖夫等人走后，他高兴地对师哲说，这样把柯瓦廖夫教训一通，很好，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把情况反映到斯大林那里。

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寿，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大剧院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官员，斯大林和前来祝贺的各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泽东的座位被安排在斯大林的近旁，中间仅隔着匈牙利的拉科西。毛泽东的祝词由费德林代念，祝

词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

在大会进程中，斯大林不时地侧过脸去与毛泽东说话，毛泽东则神色庄重，很少言语。此时此刻，毛泽东想到了什么呢？

庆祝大会以后，进入宴会并观看文艺演出，斯大林特意把毛泽东安排在一个包厢里，这是当年沙皇的专用包厢，演出结束时，观众席上响起一片“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的欢呼声。毛泽东也显得很激动，他习惯地举起手来，向群众致意，同时高呼“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

一时间，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就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预料之外的事情。原来，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与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首次直接会晤，自然会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然而，毛泽东抵苏后已经十几天了，竟然没有消息报道双方会谈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引起种种猜测自是在所难免了。于是，英国通讯社首先发难，造了一个混淆视听的谣言，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这样一来，大家都着急起来，还是素来被称为“智囊”的王稼祥足智多谋。他提出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到苏联的目的。1950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答记者问》见报。在《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毛泽东说：“我们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他又说：“在这些问题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他还谈道：“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

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发表，在国际社会引起很大震动。于是，种种谣言便不攻自破了。

其实，毛泽东的谈话也正是借用了答记者问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回答了斯大林心中一直悬而不得其解的问题。这样，斯大林便不再坚持原来的想法，决定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专程去别墅拜访毛泽东，询问他对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等事的意见。

毛泽东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资本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第二，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

第三，发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

如果按第二、第三两个方案去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第一个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泽东进一步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肯定地回答：“是的。”

毛泽东立即表示：“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恩来一道回国。”

莫洛托夫等没有表示异议。

客人走后，当晚 11 时，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最近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决定。"

◆ 三、谈判 ◆

1950 年初，中苏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

1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启程前往莫斯科。代表团阵容颇为庞大，连同随毛泽东先行到达莫斯科的王稼祥、陈伯达，成员还有李富春、赛福鼎等。

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到达新西比尔斯克后，周恩来即给毛泽东去了电话，因为传音不良，听不清楚而作罢；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后，两人再度通话，谈了一个多小时，充分交换了意见，为到达莫斯科后将要开始的谈判作好了准备。

1 月 20 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车站也有仪仗队迎接，规格略低于迎接毛泽东的礼仪。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第三天，1 月 22 日，便陪同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会谈，中方出席会谈的还有李富春、王稼祥等。

会谈开始后，毛泽东阐述了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在新的情况下应该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毛泽东认为，条约的内容应该是密切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外交等领域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制止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行为。

斯大林对之表示赞同，并提出了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和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泽东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应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表示："中苏条约应该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去理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同意前一个办法。

谈判进行过程中，斯大林突然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并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事出意外，谈判一时出现了冷场。随后，周恩来反问说：

"东北住有许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此言一出，斯大林显得措手不及，无言以对。

事后知道，斯大林提出这一问题的本意是遏止美、日、英等国派人进入东北活动。但苏方提出这个问题，毕竟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谈判出现不愉快的情况自是在所难免了。

令中方感到不快的另外两件事，一是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再一次暴露出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他向中方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显而易见地带有不平等性质。同时，这种沙文主义态度还表现在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等问题上。

◆ 四、签约 ◆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决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

签字仪式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和赛福鼎，苏联方面出席的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和罗申。

分别代表中苏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这时，出现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情节：

在签字仪式上，斯大林站位居最中，而他的身高比毛泽东矮。新闻记者开始拍照了，斯大林不时地将身子挪前一两步，这样一来，伟大领袖斯大林在照片和新闻电影中的形象，就不至于显得比毛泽东矮，甚而还要高些。

历史从来就有两种，本色的历史和人写的历史。

签字仪式进行中，斯大林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毛泽东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刷。不然的话，今天在这里可以把贸易协定也一起签下来。那多好哇!"

毛泽东听后笑了笑："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

斯大林十分敏感地觉察到了什么，便急着问身后的中方翻译师哲："他说什么?"

师哲不紧不慢地回答："是我们的私人交谈。"

其实，中苏贸易协定，是苏联外贸部在苏联外交部的协助下，与中国贸易代表团共同准备的，至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前，苏方还未准备就绪，苏方有关人员唯恐斯大林责备，就以中方还未准备好该协定的中文本为由进行搪塞，以逃避责任。毛泽东对此自是洞若观火。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双方互相祝贺。毛泽东与斯大林坐在一起。

毛泽东十分礼貌地对斯大林说："再过几个钟头，也就是今晚，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您斯大林能光临。我们的愿望是您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容许，您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有何不适。"

斯大林回答说："我，历来没有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宴会，这已成了惯例。不过，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说，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

毛泽东又重复地说："如果您身体不支，可以随时提前退席。"

斯大林说："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

◆ 五、反客为主 ◆

晚9时，以王稼祥大使夫妇名义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在位于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

这次酒会邀请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五百多位客人，除苏联党、政、军要员外，还有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苏联的大使，苏联著名人士和各国记者。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夫妇和李富春亲自在门口迎候客人。

9时许，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达。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后，就陪同客人向酒会正席走去。

斯大林的到来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其实，不仅是外宾。就是连前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没有从这么近的距离看到过斯大林。在一阵惊愕过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一直延续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后才停息。

然而，高潮还只是刚刚开始。两位伟人及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

面的小厅内，这间主客厅和外部世界被一排玻璃门隔开了。于是，外厅的人们开始不顾礼节地往里间拥挤，甚至后来，连那些彬彬有礼的各国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初春，寒意料峭的莫斯科，此刻，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的第一层，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出现了一股巨大的热浪。玻璃大门也罢，维持秩序的警卫人员也罢，都无法遏止这股热浪。玻璃门眼见就要被挤碎了！

机敏的周恩来急中生智，干脆让服务人员打开玻璃大门，把里厅和外部世界打通，两厅并作一厅，让与会者都能见到这一历史性的场面。

周恩来致祝酒词了。他没有拿讲稿，但两千余字的祝酒词一路讲来，竟与原稿一字不差。他的不凡的风度，以及祝酒词中关于中苏世代友好的内容，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斯大林起立致词了。这位苏联卫国战争最高统帅果然气度潇洒，与周恩来一样，他没有讲稿，讲话轻松自如。他说："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的精神，这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刚才周恩来都说过了，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这也代表了我的意思。"

说到这里，斯大林把头微微扬起，环视了一下大厅，似乎在找寻什么；随后，他颇有点意味深长地，把目光收了回去。而后，他的语调变得有点慷慨激昂起来："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是，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使节未能出席。因为，我们没有邀请他们！"

讲到这里，这位大元帅停顿了片刻，望了一眼大厅内屏息静听的人们。他的语调继续提高："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我们的大家庭！他们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

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此前，谁都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这个场合提到南斯拉夫，尤其是中国代表团。然而，斯大林偏偏就在此时此地发表了这样的讲话。人们自然感到吃惊，但是，谁都没有表示什么。

然而，这毕竟是中方举行的招待会哪！

致辞节目已经过去。

毛泽东站起身来，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频频举杯，祝毛泽东、周恩来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时分，宾主尽欢而散。

2 月 17 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起程回国。

◆ 六、中苏分歧 ◆

三年以后，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

又过了三年，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个人崇拜”的斯大林受到了严厉批判，苏联的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访苏期间，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随后，举行了 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分别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和平宣言》。会议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分歧。

1958 年，苏联向中国提出，在中国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和苏中联

合舰队，毛泽东为捍卫国家主权，拒绝了赫鲁晓夫的建议。自此，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1959 年 9 月，苏联发表塔斯社声明，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开化。

1960 年 6 月，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同年 7 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有关合同和协议。

此后，中苏论战急剧升级。

在 1962—1963 年的一年里，苏联报刊发表了一千余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从 1963 年 9 月至 1964 年 7 月，中国方面针对 1963 年 7 月 14 日苏共中央关于《给苏联个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了九篇评论，即当时十分有名的“九评”。中苏论战达到了高峰。

20 世纪 50—60 年代，苏联连续出现危机。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

1966 年 3 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拒绝派代表出席，两党关系由此断绝。

中苏关系到这样一步，对于毛泽东而言，是一个长时间的思考过程的结果。1957 年，中苏分歧初见端倪。这一年 3 月，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谈家桢时，说了那段有名的话：“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搞嘛，可不要怕。”

第三节

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

谈家桢回国后，仍在浙江大学执教。1950 年，谈家桢接替贝时璋，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

1950 年初，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努日金，在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原所长瓦维洛夫教授指导下，进行果蝇遗传研究，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摩尔根学派成员。1941 年，瓦维洛夫因坚持真理被迫害致死后，努日金投靠李森科，并摇身一变，成为“李森科理论”的积极宣传者和推行者。在李森科的扶持下，努日金得以出任遗传研究所副所长。

努日金来华后，不遗余力地鼓吹所谓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前后共作了 76 次演讲，开了 28 次座谈会，参加者达 10 多万人。

努日金到达上海后，指名要与谈家桢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谈家桢奉命专程从杭州赶往上海，跟这位对之早就知根知底的李森科的得力干将进行所谓的“友好”谈话。

谈话一开始，努日金就避开了遗传学的具体问题，肆无忌惮地嘲弄起染色体、核酸和细胞遗传质来，谈及摩尔根遗传学时，他一口一个“反动遗传学”。一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样子。起初，谈家桢静静地听着。可是，当他望着这个叛离师门、卖身求荣的家伙，挥舞着粉红色的肥胖手掌，唾沫四溅，越说越离谱时，心中本能地涌起了一种厌恶感。于是，谈家桢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不

无揶揄地刺了对方一下：

“你是缪勒的学生，长期以来，又在瓦维洛夫手下从事果蝇遗传研究，现在怎么一下子倒过来把自己从事的那一套都称为反动的遗传学？那么，我要请教一下，从学术上看，究竟有哪些观点称得上是反动的呢？”

有一种说法，强权就是真理。然而，强权毕竟不是真理。

谈家桢是好样的。在强权面前，他再一次表现出为捍卫真理而无私无畏的精神，这正是他性格中最为光辉的一面！

谈家桢的这一问，不偏不歪，正好击中了那个欺师灭祖、出卖恩师、出卖真理的努日金的要害！努日金的脸一下子变成了猪肝色。

邪恶在真理面前黯然失色。

半晌，这位李森科的得力干将才回过神来，语不成声、强词夺理地说：

“现在不谈什么科学本身的问题，而是首先要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阶级立场问题。”

他又、前言不搭后语地说：

“新旧遗传学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看问题。”

谈家桢哑然失笑。既然是点名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又怎能不涉及遗传学的具体问题，甚至不谈科学本身的问题，而“悬空八只脚”地奢谈什么科学家的立场问题？分明是欲盖弥彰了。

已处颓势的努日金仍喋喋不休地教训谈家桢，要“从反动的遗传学圈子里跳出来”，“背叛资产阶级立场，学习新遗传学理论——米丘林生物学”。

谈家桢望着眼前这张奇特的脸谱，只见他的大嘴巴张开、又合

起。张开、又合起；他的表情极不自然，他的语调极不自信。谈家桢感到纳闷，是什么东西，使一个科学家变成了这么一个丧失人格的政治小丑？

那次谈话自然毫无结果。谈家桢越发感到所谓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空虚无力和仗势欺人。

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在努日金前后，相继来华鼓吹“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苏联专家有格鲁森科、维鲁森科、布尔亚科、伊万诺夫、绥基纳、迪托夫、谢嘎和杜勃鲁维娜等。

与之相呼应，从1949年至1955年7月，有关米丘林学说的书籍等共出版了123种，总发行20万册。1952年，《米丘林选集》初版发行5000册，至1952年，再版发行1万册。1955年，为纪念米丘林百年诞辰，又先后出版了《米丘林全集》第一卷和全苏农业科学家1948年8月会议记录《论生物学现状》。

重压之下，难有完卵。被贴上“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伪科学”和“不可知论”政治标签的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一次次地受到批判。摩尔根学派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下被取缔；那些原来持有摩尔根学术观点的学者们，一个个成了被批判、改造的对象。他们中间，中箭落马的，有之；缴械投降的，有之。为摩尔根“入室弟子”的谈家桢自是首当其冲，一次次地接受批判，一次次地被责令检查。

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高压，谈家桢没有丧失科学家的良知和勇气。即便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仍坚持说：

“高压下只能使我们暂时的口服。而不能使我心服。”

“思想改造虽然只是抓破了一些皮，但伤痕难消。”

寻遍长安，真言几何？谈家桢是好样的男子汉。摩尔根九泉之下有知，当为之鸣掌。

在生活中，有些人听得见自己内心讲话的声音，他们就按照这声音去讲话、行事。刘勰称其为：“言为心声。”

谈家桢就属于这样一种人。

身为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的谈家桢被剥夺了讲授遗传学的权利。有人劝他，改教米丘林生物学吧。不，谈家桢宁可不教书，也决不屈服，好在还有达尔文——当时，根据教育部的规定，成立了达尔文教研室。于是，谈家桢开始翻译《生物学引论》，讲授达尔文进化论。他相信，科学总是科学，真理最终会愈辩愈明。他也相信那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总有一天，在中国，在复旦大学，还是要恢复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的。

谈家桢期待着这一天。

第四节

“青岛会议” 前后

◆ 一、“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0年，周恩来指出：我们要在旧中国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就会感到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这段话当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和重视，至1955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被认为是关键性的第四年，各种建设人才匮乏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尖锐了。

与此相对照，据中共权威人士分析，当时在党内，却存在着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倾向。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后来归纳出存在“六不”现象，为“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

还有一个让人警醒的事实是，世界科学技术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正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发展，新技术、新工艺层出不穷，发达国家各主要生产行业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正好跟中国各主要生产行业的现状形成极大反差。

于是，知识分子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一次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大型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简称“中央十人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经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座谈讨论、汇总材料、查阅文献，以及由周恩来亲自花费很大精力对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进行对比研究后，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十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起草了《关于科学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间发展党员问题的报告》等十一个全面解决知识分

子问题的专题报告。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张闻天、邓小平、陈毅、罗荣桓、李富春、徐向前、贺龙、蔡畅、李先念、薄一波、王稼祥等57位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所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国家机关各部门、全国性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共1279人。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在这个主题报告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和利用科学知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科学是关系我们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等论断。报告的内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文化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1月20日，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讲话，对这次会议作了肯定。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

"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大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

其后，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同年5月，成立了国务院专利局。

1956年2月，根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和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人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的组织下，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10月编制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22年以后，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再次重申：

“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 二、毛泽东与“双百”方针及遗传学 ◆

继斯大林逝世，苏共二十大召开后，靠苏联党政部门用行政手段支持扶摇直上的李森科，开始在科学界受到清算。1955年，苏联有三百多位科学家联名上书，要求撤销李森科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1956年，苏共中央接受这一请求，正式罢免了李森科。

长年以来，李森科的“理论”在中国谬种流传，波及面甚广。苏联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自然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高度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他曾向毛泽东坦陈了自己对遗传学问题的看法。

1956年2月，在毛泽东居所祈年堂开会时，陆定一对毛泽东说："有一位老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的遗传学回国，在中国科学院负责遗传选种实验馆的工作。他跟我谈话，说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不但如此，请他编中学的生物教科书，他不写'细胞'一课（后来补写了）。我对遗传学是外行，但已看出他的门户之见了。我问他，物理学、化学找到了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了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粒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的吗？马克思的哲学认为，物质可以无限分割，摩尔根学派分析细胞特别是染色体的内涵物质，找出脱氧核糖核酸（DNA），这是很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不是唯心主义。苏联认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允许摩尔根学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工作，让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这个同志很好，他照办了。因而我国的遗传学研究就有了成绩，超过了苏联。"

毛泽东听了，深以为然。

1956年4月，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内一位官员谈及民主德国遗传学家对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观点的反映的谈话记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民主德国著名遗传育种专家汉斯·斯多倍（Hans Stubbe）的观点。他谈到："我在政治上是马克思主义，而在科学上是摩尔根主义。"

民主德国党中央的态度是，不强求斯多倍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让他放手搞研究。结果是，斯多倍根据摩尔根遗传理论在遗传育种上作出了很大成绩。

4月18日，毛泽东在这份谈话记录上给张际春批了几句话："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

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

张际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十天以后，4 月 28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他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多。”

在此前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百家争鸣的问题。

1953 年 10 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在天津街科学院召开会议，讨论科学院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出版历史刊物等事项，参加会议的有：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尹达、刘大年和黎澍。

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为创办《历史研究》提出的方针。陈伯达当时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以前有军阀、财阀、学阀，你们办刊物，不要当“杂志阀”。什么叫“杂志阀”？就是只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不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

当时，陈伯达没有说清楚，这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两年多以后，1956 年 1 月，在那次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康生在一次发言中举了一个例子，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坐在附近的陈伯达很快递上一个条子，康生照念了。内容是，“百家争鸣不是我提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办历史刊物，我向毛主席请示方针时，毛主席提出的”。

1956 年 5 月 2 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

大关系》报告。在各方面代表人物发言以后，毛泽东再一次讲话，正式宣布："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

这就是后来经常为人们提到的、有名的"双百"方针。

毛泽东又讲道："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他又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反复举了自然科学方面"像李森科这样的问题"作反面例子。

5 月 26 日，陆定一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作《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讲话，特别谈到，在遗传学领域贴标签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

◆ 三、毛泽东和周谷城的形式逻辑 ◆

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关注，也表现在对周谷城和形式逻辑讨论的关注上。

20 世纪 60 年代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美国著名记者、《西行漫记》作者斯诺谈到"四伟大"（即"文化大革命"中由林彪提出、尔后盛行全中国的、将毛泽东称颂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问题时，十分认真地谈道，在这风行一时的

"四伟大"中，他本人只承认是"导师"，在英语中，"导师"和"教师"是一个词儿——"teacher"，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他只是一个教师。其实，"教师"毛泽东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他在湖南长沙时曾一起"到中流击水"的教师同事周谷城在学术上的行踪。

1956 年，《新建设》2 月号上发表了周谷城的《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这篇文章提出了新的见解：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如何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这种"主从"说，是对当时流行的"高低级"说的一种挑战。中国 50 年代的那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就是以对周谷城的这个观点的支持、反对，并以切磋的形式拉开了帷幕。

显然，这场讨论自一开始起，毛泽东就给予了极大关注。

1957 年 2 月 16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人开会时谈到："《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

1957 年 4 月 10 日，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和其他同志谈话时，他又说："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我曾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

1965 年 10 月 21 日，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表现出他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的关注："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

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门科学来管。”

对于周谷城这篇文章的创新见解，毛泽东显然是持欣赏和赞许态度的。甚而，在周谷城本人面前，毛泽东也流露过这种赞许的心态。当时参加讨论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和周谷城“商榷”的。毛泽东则鼓励周谷城不要怕，要积极写文章，继续辩论。

1957 年 3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聚谈逻辑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了两个观点，一是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之间，没有高级低级之分；一是形式逻辑是普遍适用的，没有阶级性。

1957 年 3 月，毛泽东一路南下，宣传“双百”方针，最后一站是上海。在上海，他和周谷城之间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

周谷城说：“我的意见很少有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说：“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周谷城摇摇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好。”

毛泽东笑了，肯定地说：“人民大学的刊物《教学和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

周谷城轻声嘟哝了一句：“我没看见。”

毛泽东又笑了，说：“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4 月上旬，毛泽东一回北京，就让人给周谷城寄去了几本刊物，有关地方还折了角，作了标记。

就在4月10日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后第二天，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逻辑学界、哲学和社会科学界人士研究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周谷城、王方名都出席了，出席的人士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这次聚会，客观上为周谷城和王方名之间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毛泽东对周和王说，你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做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十分熟悉地论及各人的专业经历、研究成果和一些逻辑问题。他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话题，谈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其实，当时在逻辑学界，赞成周谷城的主要观点的大有人在，然而，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没有参加这场讨论。于是，诚如周谷城所言，在这场讨论中，他很孤立，成为众矢之的。坚持“高低级”之说，并在讨论中批评周谷城的“主从”说的人，主要是靠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结论，再具体一点，就是引据恩格斯的一个比喻。原来，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把使用“固定不变的范畴”比喻为“就好像是逻辑中的初等数学”。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又说：“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

比喻毕竟不能算作论证，逻辑也毕竟不是数学。它们的研究对象之间更是不可比的。然而，对于周谷城来说，他所面临的乃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严肃的理论问题，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话持什么态度的问题。在50年代，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凡提到高一级的层次上，就会联结在一起。

事实上，从1956年2月号《新建设》发表周谷城的《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以后，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就从《新建设》扩展到《哲学研究》和《人民日报》等报刊。《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刊登《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一文，虽是对讨论情况的综述，却带有倾向性，而且把争论看做“两种不同的学术路线的斗争”，批评周谷城、王方名的观点“是一条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当然，这是后话。

还是回到1957年毛泽东对那场讨论所持的态度。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住了争论的焦点。他在中南海颐年堂的那次讲话中，强调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正是从科学态度的立场出发去解决问题。这样，他既从根本上指出了学术讨论应该坚持的原则立场，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这场讨论所持的观点倾向，客观上也保护了他认为是正确的少数派。

具有领袖风度的毛泽东，考虑到问题本身还在争论中，还有一个展开的过程，考虑到对学术讨论自由的维护，也考虑到对专家学者的尊重，当时，他没有明确地说出自己的看法。直至八年以后，即1965年12月在杭州的那次谈话中，他才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正是和周谷城文章的观点相一致的。

其实，在私下里，他就对周谷城用英语很风趣地说：formal—logic 本来就是 formal 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正如今日人们所了解的，毛泽东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避讳什么教条。

此后，毛泽东始终注意关于逻辑问题的各种观点的讨论文章，跟踪阅读，广收博览。1958年6月19日，他在给机要秘书高智的信中写道：

高智同志：

请你在上午找一本1956年1月号的《新建设》；再次，《哲学研究》1957年全年六期（第四期已找到）找来为盼！

毛泽东

6月19日上午7时

同一天，他又致信高智：

《新建设》1956年全年各期，1957年全年各期都找来，更好，××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

信中所说××的一篇，即指《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刊登的《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周谷城的一篇，是指6月14日刊登的周谷城《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在那场讨论中，××是坚持斯特罗果维契观点的主要代表，周谷城的《六论》则是与之针锋相对的。

周谷城的文章刚一刊出，毛泽东就请周谷城从上海到北京中南海共同讨论逻辑问题。6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谷城就逻辑问题进行了长谈。

6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再一次把陆定一、胡绳、田家英等和周谷城一起请来，聚谈逻辑问题。这一次谈话，从下午5时45分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半。

7月1日，毛泽东开列了一张索书单，要看这一年"1至6月的《哲学研究》"，还是在继续关心着关于逻辑问题的那场讨论！

出自对逻辑问题讨论的关注，毛泽东进一步要求把有关文章和专著汇集起来，便于人们系统地了解。同时，他已不满足于看逻辑学论文，他还希望系统地看全部“专著”；他不满足于只了解那场讨论的情况和各种见解，还希望了解中国数十年来的研究概况，认识历史的发展；他不仅对西方的逻辑学感兴趣，也想对中国传统的逻辑思想有更多的了解。他在1958年6月跟周谷城的那次谈话中就表述过这种想法。

他对周谷城说：“最好把古今所有的逻辑书都搜集起来，印成一部丛书，还在前面写几句话，作为按语。”

然而，就为毛泽东谈到的“写几句话”的事。又引出了一段插曲。

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给周谷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问题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一手，似乎也不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

信中说到的“大著”，似指周谷城所编在逻辑学方面的论文集，一本是以周谷城的逻辑学论文为主体的论文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以周谷城发表在《新建设》1956年2月号的那篇文章为开篇，一批一驳，次第展开，计二十篇论文，其中周谷城的占十篇。另一本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所收全是周谷城个人的论文了。周谷城显然对“作序”一事多少有点误会。而毛泽东则是明确表明了自己维护学术界自由讨论的气氛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基本态度。

毛泽东一直到晚年，研读逻辑学书籍的兴味依然不改，其时他

的视力已急剧退化，便让人把一些逻辑学著作印成大字本给他看。

1967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一本《近代逻辑史》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此书印成大字本一万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近代逻辑史》系苏联巴·谢·波波夫所著，1964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令毛泽东满足了了解西方逻辑学史的愿望。

◆ 四、毛泽东和青岛会议 ◆

1956年8月，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根据他本人提出的"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的精神，经中宣部建议，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历时十五天的遗传学座谈会，有116位专家教授和有关领导出席了这次座谈会。

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的提出，是酝酿积累于长期，发轫于他所知所闻的遗传学问题种种。于是，"双百"方针的付诸实施，也便从青岛的遗传学座谈会开始。

这次座谈会，实际上就是一次贯彻"双百"方针的会议，也是一次为摩尔根学派恢复名誉的会议。谈家桢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指定为会议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在这次座谈会的开幕式上，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作了令人为之振奋的发言。

于光远谈道，"不赞成把摩尔根学派的观点说成是唯心论"，承认"有遗传物质不是什么唯心论，不是形而上学"。

谈及李森科提出的"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的观点时，于光远明确指出，这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不能"随便给人扣唯心主义的帽子，更不允许你给人扣政治帽子"，"不讲科学态度，有成见，就

会变成宗派”。

于光远的发言，直接传达了来自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对遗传学研究的正确支持，对当时已是如履薄冰、面临夭折的遗传学研究，无疑送来了福音。

激动、兴奋、喜出望外，谈家桢和许多科学家打消了顾虑，把多年来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倒了出来。谈家桢在会上就“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遗传物质的性状表现”和“关于物种形成与遗传机制”等问题作了发言。真是痛快淋漓，兴奋异常。会议结束前的一次聚会上，他开怀痛饮，喝了个酩酊大醉。后来，他将之自喻为“翻身后的喜悦”。

有人气不过了，跑到陆定一那里去告了一状，陆定一看了一眼来人，对他的“义愤”表示惊讶：“你们骂了人家那么多年，还不许人家骂你们几句?”

十年以后，“文革”开始，就因为上面这一句话，有人给陆定一戴上了一顶“庇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谈家桢”的帽子。这是后话。

而在当时，消息传到谈家桢那里，他的气儿更顺了。

◆ 五、为李汝祺文章写编者按语 ◆

谈家桢的老师李汝祺教授也参加了青岛会议。第二年，他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谈了自己参加这次会议的收获和关于百家争鸣对发展科学的重要性的意见。这篇文章发表在 1957 年 4 月 29 日的《光明日报》上。

李汝祺在文章中写道：“既然百家争鸣，就不能一家独鸣。在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犯了一点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那就是只许一家争鸣。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其

后果如何是大家熟悉的。一家争鸣只能导致思想僵化。大家都学会引经据典，人云亦云，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思想懒汉。这种懒汉思想，在强调向科学进军的今天，应该是一种障碍。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独立思考，独出心裁。显而易见，为了使科学家的思想开放，就必须把百家争鸣继续下去。

“百家争鸣也应该认为是使科学家团结起来的基础。从遗传学方面的情况来看，通过去年 8 月的青岛会议，大家畅所欲言，争了一场，鸣了一番，对目前存在的米丘林和摩尔根两个学派间的互不了解以及某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看法，都得到很大的帮助，使他们逐渐接近。”

时隔 40 余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仍是一篇发人思索、颇具见地的好文章，而且，完全与李汝祺的稳健、客观、着眼大局、与人为善的思想、性格相吻合。

毛泽东读了李汝祺的文章，十分肯定。4 月 30 日，他写信给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

毛泽东

4 月 30 日

同时，毛泽东为此文重新拟了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并代写了编者按语。

5 月 1 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刊出李汝祺的文章和编者按语。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转载李汝祺文写的按语为：

>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为李汝祺这篇文章换上的题目：《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个醒目的标题，深刻地揭示了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言简意赅地阐述了百家争鸣的方针。40余年后，当人们津津乐道地把21个世纪称为“生命科学的世纪”，并喜见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水平已在赶超世界一流，成为中国在21世纪“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人们不由得再一次感悟到毛泽东当年支持中国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远见卓识！

第五节

“二龙抢珠” 与 “三八线”

◆ 一、“二龙抢珠” ◆

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陆定一在向毛泽东进行汇

报时，特意向毛泽东介绍了谈家桢。

“谈家桢”——一个在重大压力下敢于对苏联老大哥李森科说“不”的遗传学家，这显然令毛泽东很感兴趣，他记住了这个名字。

1957年3月，谈家桢作为党外人士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

谈家桢没有想到，就在这次会议上，竟因他而引出了一起“二龙抢珠”的插曲。

原来，在这次会议前，童第周就跟谈家桢谈起，中国科学院的选种馆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要扩大改建成一个趋于完善的遗传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已考虑请谈家桢来担任，而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则执意不肯放走谈家桢。

于是，在宣传会议期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出，要调谈家桢到科学院，主持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工作。郭沫若的理由自是动人，他认为，中国科学院是国家最高研究机构，大学理应要输送优秀人才。他回溯半年前在青岛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十分动情地谈道，时不我待，遗传学在中国应当加快发展，而成立遗传研究所更是迫不及待的事情。谈家桢是理想人选，有关部门应该顾全大局。郭老是博古通今的大文豪，思敏言健，自不待言，一路说来，面面俱到，滴水不漏。

不料，素以作风务实、坚持原则著称的杨秀峰，更是针锋相对，据理力争。

据知，杨秀峰到全国各地了解教育情况，向来是轻车简从，便服微访。有一年，他到以教改闻名的上海育才中学去参观，学校领导知道他那天要去，特地派了人接他。不想，人未接到，他老人家一不惊动当地领导，二不要求派车，依然乘坐有轨电车，在北京西

路、石门二路口下了车，一路步行，走到了位于山海关路的育才中学。

这次会上，杨秀峰提出不放人的理由也是振振有词，满座为之色动。杨秀峰认为，国家培养一个优秀大学生已是极不容易，更别说大学里的名教授！没有名教授就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来，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多年来，科学院把高校的人才都挖去了，长此下去，高校发展就成问题！光说不够，杨秀峰干脆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取出来当众宣读，历数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院从高校挖去了多少人才，谓“让事实说话”。

话未听完，郭沫若便站起身来，朗声说道，科学院要办就要人，高校就要支援，理属天经地义。没有人才如何办好科学院？要不，科学院就归高教部领导吧！

一时间，二老各执一词，旗鼓相当。有趣的是，这二老的听力均属不佳，俗谓“耳聋”。耳聋之人，总怕别人听不清自己说话，愈是如此，愈是提高嗓门，再加上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尤其是在激动状态之中，那辩论之声更显抑扬顿挫，动情之至，效果自进入极佳境界。于是，满堂之中，虽屏息静听，却无不睹其状而发噱，无不闻其言而动容，无不为二老表现出的为国家进步、科学教育事业之发展急争人才的精神而感喟不已。时人有感于此，复将之戏称为“二龙（聋）抢珠”。这且表过不提。

◆ 二、“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 ◆

就在当天晚上，毛泽东接见谈家桢等人。是晚，当谈家桢等人走进怀仁堂接见厅时，早就迎候在那里的毛泽东满面春风地与大家一一握手交谈。这时，谈家桢的心情十分激动，当他走近毛泽东时，

毛泽东伸出手来，微笑着，同他紧紧握手。这时，站在一旁的陆定一连忙把谈家桢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显得更加兴奋起来，用力地、不住摇撼着谈家桢的手，带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亲切地对谈家桢说：

“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

毛泽东显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了。

对于谈家桢来说，毛泽东这简短的一句话语，已令他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毛泽东请客人们坐下，谈话开始了。他询问着各方面的情况，倾听着大家的意见。接着，他把身子转向谈家桢，关切地问起谈家桢，对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都有些什么意见？

从青岛会议，到这次宣传工作会议，谈家桢的心里亮堂了不少，思想也解放了不少，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更令生来直筒子脾气的谈家桢顾虑全消，于是，他侃侃而谈，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情况；他兴奋地介绍着，在那次会议以后，复旦大学和许多高校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已经出现的好势头。毛泽东神情专注地倾听着，不时地点点头，显得十分高兴。显然，毛泽东十分重视谈家桢的介绍，十分中意谈家桢的性格和为人，尔后，毛泽东讲话了：“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

沉思了片刻，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搞嘛，可不要怕！”

毛泽东这一席话，使谈家桢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增强了把遗传学搞上去的信心。

当晚，陪同接见的郭沫若提出，为尽快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想把谈家桢调来北京主持科学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在座的杨秀峰立刻站起来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望望老朋友郭沫若，又望望老部下杨秀峰，忍俊不禁，他摆摆手，风趣地说：

“我看还是这样，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

还是毛泽东一言定乾坤，用一条“三八线”，给这场“二龙抢珠”的佳话画上了终止线。毛泽东的平易近人，毛泽东的幽默诙谐，也给科学家谈家桢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第六节

“老朋友啦， 谈先生！”

◆ 一、整风开始 ◆

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了整风运动。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如果上半年发

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办法。”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谈道：

国内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绝不强迫民主党派参加。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后来经加工、整理和补充，于 1957 年 6 月 19 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1957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鼓励人们打消各种顾虑，帮助中共整风。他说：“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条件……”接着，他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作了三次重要讲话。这三次讲话，烘托出毛泽东当时一直思考着的一个问题，希望通过整风这一形式，使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健康，更加坚强，更加富有战斗力。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说：“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

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接着，指示又说：“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报告已经在广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还要继续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传达。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指示还指出：

这次整风“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从《指示》下达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整风运动开始了。

15年前，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过第一次整风运动。当时的整风运动，主要是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那次整风期间，毛泽东作了后来十分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三次报告，被列为中共党内的经典文献。

◆ 二、谈家桢的三条“辫子”◆

整风运动开始，谈家桢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

亲身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加之在大会期间受到毛泽东在接见时的一番勉励，谈家桢是信心十足，也是勇气十足的。于是，这个一向以正直闻名的科学家在思想上顾虑全消，直言不讳地在三个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是关于院系调整问题。谈家桢认为，把包含文、理、法、工、农、医等科的综合性的浙江大学，拆成了各自独立的院校，显见对培养学生不利，对工、农、医学发展不利。他指出，综合性大学的基础课师资有着很强的优势，拆散以后的院校，基础课相对薄弱许多。

二是关于学习苏联问题。谈家桢认为，由于全盘学习苏联，致使中国遗传学事业受到巨大损失。李森科在斯大林的扶持下，倒行逆施，不仅没有改变和挽救苏联农业落后的局面，反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李森科主义”的影响，后果严重。

三是关于科学院机构建设问题。谈家桢认为，从欧美各国国家科学院情况来看，国家科学院通常只起到全国性科研工作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但在中国，科学院机构庞大，成为一个研究实体。规定研究院搞研究，大学管教书，这不是一种先进的做法。他提出，大学要办研究所，让科研和教学互相促进，把科研和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放到今天来看，谈家桢提出上述三个问题，完全是经过深思熟虑，乃出自肺腑之言。这三个问题，这三条意见，其实条条紧扣着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后接见谈家桢等人时的讲话精神。直筒子脾气的谈家桢还是粗中有细的。

40 年以来，这三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谈家桢的心头。38 年后，他

在书呈江泽民总书记和李岚清副总理的一份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言提纲中。用“综而不综、博士不博、奶油蛋糕、卖条头糕”四句话形象概括地指出了综合性大学学科不全、培养对象知识面狭窄、基础知识薄弱的弊病，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重视。

然而，谈家桢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尤其是“学习苏联”问题，在当时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尽管自斯大林逝世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在开始检查这方面存在的利弊，并对“李森科主义”在中国遗传学界造成的影响予以关注和重视。但中国的问题通常总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不算太短的过程。于是，谈家桢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成了他的三根“辫子”。当时有人已经把谈家桢划为“内定右派”。负责上海教育卫生工作的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也接二连三地找谈家桢“打招呼”。要他“看清形势”、“有所收敛”。恰在此时，1957 年夏，毛泽东本人已决定开展反右派运动——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重要社论，拉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

同一天，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往各地。

于是，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展开。

两个月后，1957 年 8 月 15 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市人代会的一次讲话中说：

“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上海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投入斗争人数已达数十万，右派分子已经一批一批地被揭露出来……”

这“一批一批”中，包括了与谈家桢一起去怀仁堂参加会议的

上海文艺界三名代表：石挥、吴永刚和吴茵，另一名赵丹除外。

谈家桢忧心忡忡，度日如年。他已经看到了罩在自己头顶上的那块乌云。

三条意见成了他的三条“辫子”。

◆ 三、毛泽东为谈家桢剪掉了“辫子” ◆

1957年7月，毛泽东来到上海。一百天前，他也来过一次上海。那一次，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是来上海点火的”。而这一次，他是来号召上海人民“反右派”的。

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点了上海一批“右派分子”的名。

就在那段时间，一天，谈家桢接到通知，让他到南京西路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馆）去开会。毛泽东在那里要接见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

谈家桢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那天，毛泽东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谈家桢，亲切地跟他打着招呼：“老朋友啦，谈先生！”

尔后，毛泽东用他那特有的风趣口吻，向着谈家桢，也向着身边的陪同人员，似乎很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

这正是中国领袖的毛泽东，一举手，一投足，轻描谈写间的一句话语，却是一言千钧，救出了一个谈家桢！

时隔40年，谈家桢每每忆起毛泽东和他的那次会见，忆起毛泽东当时说的那一段话，仍是字字在耳，道来如数家珍。他说，当时的他听了毛泽东说的那一段话，立时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事

实也正如此，正是因为毛泽东当时说的那一段话，因为毛泽东当时那样的表情，因三根“辫子”而招来的“内定右派问题”便随之烟消云散，解了谈家桢的“灭顶之厄”。

◆ 四、“最好回去还是当总编辑吧！”◆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西湖三友”之一的赵超构也得以安然“过关”。

1957年夏，反右斗争在全国拉开序幕。这一年6月，赵超构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6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新的文件，题为《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文汇报”的总编辑正是赵超构的好友徐铸城，他们同是民盟成员，徐是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部长，他是副部长；3月份，他们刚刚一起出席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6月30日上午，赵超构突然接到邀请，毛泽东约他到中南海去谈谈。正处在紧张惶惑之中的赵超构，走进中南海游泳池门口时，一颗心还是七上八下的。

毛泽东在游泳池边上接见了赵超构。同时在座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述周。

毛泽东一见赵超构，立刻亲切地跟他打招呼，神情一如既往。这实在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暗示，赵超构顿时领会了：毛泽东愿意对他的言论既往不咎！想到自己过去确有几篇文章写得言论过激，赵超构一时有点难以自容的味道，刚说了一句“向主席请罪——”立时语不成声。

毛泽东宽宥地挥挥手，继续和颜悦色地慰藉着他。

就像当年在延安时那样，毛泽东如同跟老朋友交谈，耐心地讲述着、譬解着，告诉赵超构，要分清无产阶级办报路线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又从《文汇报》的方向一直谈到了“章罗联盟”。

此时的赵超构，觉得毛泽东字字句句都是语重心长。他只是不住地点头。

“我最好还是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辑的职务。”想了半天，他迸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不，”毛泽东对着他，也是对着刘述周，十分肯定地说道，“最好回去还是当总编辑吧!”

听了这话，赵超构越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含笑望着他，用惯常的风趣口吻问：“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

“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此刻的赵超构，觉得自己有一千个不是。

毛泽东轻轻摇摇头：“只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

看到赵超构的窘状，毛泽东宽厚地笑着，谈论起赵超构的文章来。毛泽东分析说，赵超构写过不少好文章，但有些文章也有错误之处；希望他改掉错误，继续工作，努力改造。

停了半晌，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呀!”

他的这句话，像是对赵超构说的，也像是在对自己说的。

这一天，毛泽东又把赵超构留下共进午餐，菜肴十分简单，其中有一道湖南特色辣子菜。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不辣不革命。”

从中南海游泳池出来，赵超构似乎弄明白了，又似乎未弄明白，他只是隐约地感到，眼下，自己是被解脱了。

在毛泽东的亲自保护下，赵超构安然度过了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夏天。

毛泽东6月3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对赵超构的谈话，就是第二天《人民日报》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基本内容，这篇社论也同样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从这篇社论始，反右斗争全面展开。

◆ 五、“宋高宗的‘哥哥’” ◆

这一年里，赵超构三次见到了毛泽东。

赵超构第三次见到毛泽东，已是1957年的金秋。

9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又一次邀请赵超构去和他会面。

同时被毛泽东邀见的还有舒新城和束世徵。

毛泽东一看见赵超构走过来，就十分风趣地向周围的人介绍说：“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包括赵超构在内，大家都轻松地笑了。

而后，毛泽东对赵超构说：“我已经看到了你的两篇检查。”

又问：“你当时检查的心情怎样？”

赵超构如实回答说：“感到很紧张，有整整两个星期睡不着觉。”

毛泽东专注地盯着赵超构看，而后笑了起来：“紧张一下好，睡不着觉是好事。”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四周的人，不紧不慢地说：“没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的人觉得自我批评很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犯了错误，吸取

教训，改过来就好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1957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指示中的一段话，是毛泽东进行了精心修改的：

>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污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赵超构，毛泽东显然是把他当做了一个争取、团结的典型。

◆ 六、《新民晚报》办得好 ◆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到上海过“五一”节，又一次接见赵超构。

毛泽东对赵超构说：“《新民晚报》办得好。发行多少？”

赵超构回答说：“三十万份。”

毛泽东高兴起来，不住地称赞：“你们的报纸办得好，有特色，别具一格，读者喜欢看。”

毛泽东一直注意和关心着赵超构和《新民晚报》。

“文化大革命”中，赵超构曾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了几年。70年代中，参加《辞海》修订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民晚报》复刊，赵超构重新出来主持《新民晚报》工作，并担任新民晚报社社长。

从80年代起，赵超构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全国记协副主席等职。

1978年，赵超构重访延安，写下《重访延安·七律》，从中可以看出，他和谈家桢、周谷城一样，对毛泽东始终怀有感恩之情。诗云：

枣园灯火明天下，延水波流润万邦。
苦斗当年曾共睹，欢歌今日又观光。
惊看广厦春云展，弥觉洞窑日月长。
俯仰塔山增愧汗，鸿恩大德敢相忘。

第七节

“毛主席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1993年，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夕，谈家桢接受了《中华英才》杂志社的采访。回首往事，谈家桢深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主席（第一次接见谈家桢时）的这段话，不仅使我国的遗传学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而且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彻底解除了我思想上的负担。我在复旦也重新开了课，并大胆地开展研究。”

他又说：“毛主席的关心和希望，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 一、敢于坚持真理 ◆

1958 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细胞学教授麦克劳夫到北京大学讲学，有关部门要求从事遗传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前往听课。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本无可非议，遗憾的是，那位麦克劳夫在讲学时还是贩卖李森科的那套货色。他还胡诌说："摩尔根学说的追随者鼓吹基因染色体，而染色体只是一个'人工产物'。"狂妄无知的麦克劳夫根本不承认细胞中存在着染色体，自然，对 1953 年 DNA 分子双螺旋模型的发现及其巨大意义，更是视若无睹。

之后，麦克劳夫又窜到上海开座谈会，谈家桢自然被点名参加。在座谈会上，谈家桢义正词严地驳斥了麦克劳夫的谬论，老实不客气地指出，遗传学的进展已经确定基因的化学结构和功能，作为一个科学家，怎能无视这些科学事实呢？在谈家桢等学者的指责下，麦克劳夫理屈词穷，当场显得狼狈不堪。

麦克劳夫在中国的一番表演，有其国内的背景。原来，自苏联 1956 年撤除李森科的职务后，《植物学报》对李森科进行了一系列批判。但好景不长，1958 年，苏共党报《真理报》又突然转向，大肆批判《植物学报》在批判李森科问题上的立场。根子所在，还是当时苏联党、政最高首脑赫鲁晓夫，正是赫鲁晓夫转而支持李森科，使李森科得以卷土重来，再度得势。

在苏共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点名批评了摩尔根学派在苏联的代表人物，苏联科学院院士杜比宁。

杜比宁曾发现遗传因子的可变裂现象，发展了在群体中进行的自动过程的遗传学；他又根据突变理论奠定了选择高产植物品种方法的基础；他还进行了由辐射引起突变的实验，作出了宇宙飞行对

人体无害的结论，并为一门新学科——宇航遗传学的形成确立了基础。

就是这样一位才能卓绝、贡献不凡的遗传学家，长年以来，为了捍卫真理，跟不学无术的李森科之流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被李森科指为“反对米丘林学说的遗传学派头子，是遗传学中保守思想的代表，甚至是国外具有反动思想的生物学家的代表。”

1956 年，杜比宁被委托筹建西伯利亚的细胞学及遗传学研究所，被任命为所长。1957 年 7 月，苏联媒体刊登了赫鲁晓夫关于杜比宁的讲话：

“杜比宁是米丘林学派的反对者，他的工作对科学及实践没有带来多少好处，如果他还有点名气，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论文及发言中反对李森科院士的理论和实践。”

1961 年，李森科重新担任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一场反攻倒算开始，昔年打击、围剿摩尔根学派的行径又故伎重演。

苏联的遗传学事业再度蒙上层层阴云。

苏联的这一现状，又直接影响了刚刚处于复苏阶段的中国遗传学研究，遗传学界随之出现了局部的反复。麦克劳夫的来华讲学便是其中一例。

1961 年，北京大学以李汝祺的名义邀请谈家桢去讲学。

在讲学中，谈家桢旗帜鲜明地指出，麦克劳夫去北京大学讲学，仍然用“扣帽子”、“打棍子”的手法对待摩尔根学派，其恶劣影响波及全国遗传学界，这后果堪忧。谈家桢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急得李汝祺老师在台下直为他捏汗！

果然，李汝祺所虑不差。讲学结束，谈家桢回到上海，有关领导劈头就问：

“你是复旦大学的副校长，你有什么权力去干涉北京大学的事呢?”

谈家桢坦然答道：

“这不是干涉不干涉的问题，凡是违背青岛会议精神、阻碍遗传学发展的事情，我都要说。”

重提前事，谈家桢感触良多，他还是用了那句老话：

“是毛主席，一次次地，给了我力量和勇气!”

◆ 二、“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时，谈家桢第四次见到了毛泽东。

这次见面，距1957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边约见谈家桢、周谷城和赵超构三位朋友，已过去了一年又九个月。

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的下榻地接见了谈家桢。

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以及陈丕显、曹荻秋、刘述周和杨西光等。

一见面，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谈家桢：

“你对搞遗传学研究还有什么顾虑吗?”

“没有什么顾虑了。”谈家桢爽快地答道。他又补充说：

“我们遵照双百方针，已成立了遗传教研室，两个学派（指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课程同时开。”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对着谈家桢说：

“我支持你!”

这时，负责上海科教工作的杨西光插话说：

“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研究大搞特搞起来。”

接着，杨西光又向毛泽东介绍了上海发展的计划，告诉毛泽东，准备在复旦大学遗传研究室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立遗传学研究所。

毛泽东听了，越发高兴起来，连连点头说：

“这样才好啊，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毛泽东又一次地，当着谈家桢的面，也当着上海党政负责人的面，公开表了态——

他支持谈家桢，支持谈家桢搞遗传学研究。

历史地看，40多年前，因遗传学而引发的那场大是非，几乎令中国刚刚起步的这一学科夭折于襁褓之中。正是有毛泽东的出面表态和公正支持，才使其时如履薄冰的中国遗传学研究得以生存发展，渐而蔚成40年后中国生命科学的辉煌大观局面；正是有了毛泽东当年高瞻远瞩的扶持和引领，才有今日中国生命科学为世人瞩目的成就。毋庸讳言，毛泽东的名字将镌刻在中国科学发展的史册上！

◆ 三、留得青山在 ◆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谈家桢在身受重重压力、被剥夺讲授遗传学的那段日子里，曾说过一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一句人们讲了千遍万遍的老话，谈家桢却是实实在在地照着去做了。

当时的谈家桢，仍担任着复旦大学生物系的系主任，遗传学不能教了，他就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成立了达尔文教研室，他本人也认认真真地钻研达尔文进化论，为学生讲授生物学引论和达尔文主义。1953年，由他主译并出版了《生物学引论》。与此同时，谈家桢倾注全力，用于生物系的队伍建设，使复旦生物系在颇为艰苦的

条件下，努力成为全国同类院校中专业齐全、教学实力坚强的生物系。

其时，复旦生物系相继成立了八个专业，并配备了十位学有所长的教授分别主持教学工作。这十位教授是：卢于道、张孟闻、王鸣岐、曲仲湘、忻介六（原复旦）、郑章成（原沪江大学）、焦启元（原金陵大学）、孙宗彭、吴定良和谈家桢（原浙大）。复旦生物系的专业设置和人员配备为：

动物专业：脊椎动物专门化——张孟闻；昆虫专门化——忻介六；

植物专业：高等植物专业化——曲仲湘；低等植物（菌类）——王鸣岐；

低等植物（藻类）——钱澄宇（曲仲湘夫人）；

微生物专业：王鸣岐、盛祖嘉、李君缨；

动物生理专业：卢于道、孙宗彭；

植物生理专业：焦启元、薛应龙；

人类专业：吴定良、刘咸；

生物化学：沈仁权（盛祖嘉夫人）；

达尔文主义教研室的基本成员为：谈家桢、盛祖嘉、刘祖洞、沈仁权、项维和高沛之。

谈家桢坚信，依靠这支精英队伍，在缝隙中求取生存，求取发展，总有一天，是要为振兴中国的遗传科学出上大力的。

◆ 四、新中国的遗传学正在急起直追 ◆

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以后，尤其是毛泽东对谈家桢的几次接见和亲切勉励，新中国遗传学迎头赶上世界的态势已经形成。

1959 年，根据中苏科学交流协议，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生物物理所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有一项合作研究项目，为共同研究猕猴辐射遗传问题。苏联生物物理所所长杜比宁指名要求谈家桢出任该合作项目中方负责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所长贝时璋热情电邀谈家桢赴京参加此项研究。

其时，苏联方面派出阿西尼亚和勃切洛夫两位专家，中国方面，则由谈家桢率两名助手章道立和张忠恕，双方共同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实验室进行研究。谈家桢和杜比宁分任中苏双方的领导人。与此同时，谈家桢也在复旦大学主持开展此项研究工作。

猕猴辐射遗传的研究，使谈家桢系统地进入辐射遗传研究。其后，在复旦遗传所成立以后，辐射遗传被列为重点研究项目，并成立了一个研究室。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的猕猴辐射遗传研究，无论是选题范围，还是研究方法和手段，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具有国际领先水平，为中国制订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在进行专题研究的过程中，谈家桢还有计划地培养了一大批研究人才。

1961 年，谈家桢由周恩来总理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为陈望道。

这年年底，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这是国内高等院校在这一项目上零的突破。谈家桢亲任所长。

遗传学研究所成立以后，便开始在动物和人类遗传，植物遗传和进化遗传，微生物遗传及生物化学遗传等方面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研究。全所下设三个研究室：一为辐射遗传研究室，从事辐射遗传、人体性别鉴定和遗传病染色体研究，由刘祖洞、张忠恕负责；一为微生物遗传研究室，研究方向为通过诱变和选择使抗菌体增产，由

盛祖嘉负责，并由沈仁权负责突变基因生物化学的研究；一为植物遗传和进化论研究，主攻方向为攻克油菜等植物的人工合成新种的研究，由蔡以欣负责。担任遗传学研究所所长的谈家桢，坚持“教而不包”，着重培养青年一代的独立工作能力。在他的引导下，一批又一批中青年遗传学工作者成长起来了。短短几年里，在上述领域中，基础理论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至1966年“文革”前夕，由谈家桢领导的这个科研集体，共发表了科学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译作和讨论集16部。复旦大学自1957年开始招收遗传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至1964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遗传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人员。而今，这些复旦人已成为我国工、农、医、林、牧、渔等各个领域及高等院校科研和教学的骨干力量。正如外国友人所说的：“新中国的遗传学家们，正在急起直追！”

◆ 五、难忘广州会议 ◆

30多年来，谈家桢念念不忘广州会议。

广州会议，即1962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后来有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会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政治运动频繁。历次运动，知识分子多受牵连。至1956年前后，毛泽东本人和中共中央意识到这一问题，之后便有“双百”方针的提出，导致文艺界、学术界的气氛空前活跃。延至1957年初，“双百”方针继续得到贯彻执行，在这一方针的鼓舞下，广大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呼之欲出。

其后，便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自此，经“大跃进”，到“文革”结束，如陆定一在《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

来同志》一文中指出的，“实际上形成了一条极左的路线”。“双百”方针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被取消，实际上却从此被束之高阁。

历史地看，“双百”方针未能贯彻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工作指导思想的某些失误，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片面理解。社会现象是具体的，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而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往往简单划一地把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及丰富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而提出“百家争鸣”的毛泽东本人，最后又认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应该看到，导致上述立论错误的原因，乃是把辩证法简单归结为“一分为二”的结果。这样，势必造成自称为无产阶级（或马克思主义）的一家，就可以排斥或否定被称为资产阶级（或非马克思主义）的一派，并给对方扣上越来越吓人的政治帽子。“双百”方针受到干扰乃至破坏便在所难免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对于贯彻“双百”方针问题，仍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作出了很多的努力。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这一矛盾的历史现象，相信是能够给予理解的。

再回到“广州会议”的话题上来。早在1956年，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属性的正确解决，有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又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在“反右”斗争中大整党外知识分子；在“反右倾”斗争中大整党内知识分子。实际上是经历了一次反复。

1960 年底，从农村工作开始，中共中央注意纠正上述偏向。

1962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号召全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落实各方面的计划。

1962 年 2 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主持了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再一次强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再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元帅也到会讲话，正直爽朗的陈毅在会上讲到，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对着到会的代表，陈毅深有感情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主人翁。”

陈毅又强调说：经过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相信共产党的，跟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八年，十年，十二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听着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肺腑之言，谈家桢的心被深深打动了，他是噙着激动的泪水听完这些报告的。

广州会议还针对“大跃进”中违背科学的错误，明确指出，破除迷信要同尊重科学结合起来，在生产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这次会议还提出了科学参与国家建设决策的问题。

在广州会议进行过程中，中央领导安排了很多座谈会，用以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谈家桢坦诚指出：“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际上，在遗传学界中没有很好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从而没有在根本上解决摩尔根学派的地位问题。”

他又直率地说：“有些文教单位的领导，他们不懂遗传学，也不

去学习弄通它。在实际工作中并不真心地对待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只是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看待。同时，把在大学里允许开设摩尔根学派的课程和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做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和开放唯心论的一种形式。”

说完上述意见后，谈家桢郑重指出：“在领导层中不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观念不改变，仍以先入为主的工作方法来领导文教工作，势必影响遗传学界百家争鸣的正常气氛，遗传学要在中国得到发展也是相当困难的。”

中央领导十分重视谈家桢的意见。周恩来还同陈毅、聂荣臻和陶铸一起在会上强调，在遗传学问题上必须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摩尔根学派不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会后，中央领导还详细听取了谈家桢的意见，并希望谈家桢敞开思想，为遗传学界健康地开展学术性争鸣发挥积极作用。

时隔三十多年，谈家桢每每谈起广州会议，就激动不已。1998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此前，谈家桢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纪念文章《我心中的周恩来》，深情地写道：“参加广州会议的那段日子令我终生难忘。”

遗憾的是，广州会议以后，上海科技界的气氛依然沉闷如旧，当时的上海市委对广州会议的精神迟迟不予传达。谈家桢担当了开“顶风船”的角色，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向人们传达着广州会议的精神，递送着科技界春天的信息。

第四章
“文革”中的毛泽东和谈家桢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段日子里，在中国，安定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是潮涨潮落间的过渡，而不是常规。历史证明，所谓“斗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片面和错误的理解，是治国之大忌。就是在那段岁月，亿万中国人满怀激情地投入一场被后人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第一节
劫　难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拉开序幕。

就在那段日子里，有一天，杨西光约请谈家桢在上海中苏友好

大厦（今上海展览馆）宴会厅用餐。杨西光笑着问谈家桢：“你感到紧张吗?”又说：“不要怕，我们市委会保你的!”

其时，上海正在上演由青年话剧团编演的《大学风云》，这出话剧讲述的是1957年“反右”的故事，目的在于提醒年轻的大学生不要忘记当年“反右”斗争的教训。据知，这出剧中的党委书记的原型就是1957年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杨西光。在包括杨西光这样的中高层官员的眼里，“文化大革命”充其量也就是第二次“反右”：先让“放”，而后总会“收”的。但这一回，他们的估计被证明过于天真了。

不久，谈家桢因病住入华东医院。

在那段时间里，上海先后抛出了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和李平心等人；继之，又将拟定的108名“牛鬼蛇神”的名单抛出，在这份名单里，上海科技、教育界的一些著名专家、学者、教授榜上有名。

谈家桢病愈后，准备出院。出于好意，同病房的原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王致中提出了忠告：“再住一阵吧！等运动风头过去以后再出院。”

谈家桢没有听从王致中的劝告，他说，他相信毛主席，相信党。就这样，谈家桢出院了。

第二节

毛泽东与周谷城的最后一晤

“文革”浩劫临头，许多人始料不及，其中也包括周谷城。

周谷城自然没有想到，在那场席卷中国大地的政治大风暴到来的前一年，他和毛泽东作了最后一次会晤，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

1965年，上海西郊。一幢典雅的西式别墅，这是后来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毛泽东到上海后的又一个下榻地。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

那次，毛泽东一见到周谷城，就笑逐颜开地欢迎说："又碰到了。"

正在酝酿着那场巨大政治风暴的毛泽东还一直记挂着老朋友。

酒逢知己，千杯恨少。周谷城记忆犹新，那次天马行空、无所拘羁的谈话广及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充分显示了两位功力深厚的学者宽阔的知识面和过人的精湛见解。

毛泽东想到了远在台湾的那位"五四"学者。

"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他显得不无遗憾。

"他写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便没有下文了。"周谷城补充说。

毛泽东接着说："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青年时代读《新青年》杂志时，有这样一句话："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毛泽东首先是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的一些文章并对他有所了解的。

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时，在杨怀中先生的介绍下，专程访问过胡适、蔡元培、陶孟和等人。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期间，参加过哲学、新闻研究会，旁听过胡适的课堂讲授。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胡适在社会上颇负盛誉。他学贯中西，以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方式进行教育改革的尝试，

深得广大学生的欢迎和拥护。蔡元培称他是“旧学邃密”、“新学深沉”的一个人。当时毛泽东确实很仰慕胡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适提出的，作文“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等，1925年后毛泽东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再次予以引用。毛泽东还曾就哲学上的一些问题、中西学术的关系问题、实验主义哲学问题请教过胡适，得到胡适的当面指点。

毛泽东办《湘江评论》，无论刊名和倾向、形式和内容，都可以明显看出《每周评论》的影响。《每周评论》系陈独秀和胡适在当时所办的一份很有名的杂志。胡适本人也把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称为《每周评论》的“小兄弟”。胡适在这篇题为《介绍新出版物》的文章中，还特别推荐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他写道：“《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在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中，还包含着易卜生的妇女解放论的观点，这和胡适所宣传的主张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在“五四”时期，毛泽东与胡适在向旧势力进攻时是志同道合的。

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毛泽东率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赴京，在北京停留了三个多月，此间，他与胡适也有所接触。他与斯诺也谈及此事：“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中，谈了一些他同胡适交谈的内容。那时许多人都热心出国留学，毛泽东对此颇不以为然，跟胡适讨论了出国留学的得失。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说：“我曾以此访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

过一篇《非留学篇》。”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手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曾经把办学的目的和初步的计划向胡适作了透露，并征求胡适的意见。在那封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又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个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同年4月，胡适在《工读主义的试行和观察》一文中写道：“我（在国外）是见惯半工半读的学生生活的。觉得‘工读主义’乃是极平平无奇的东西，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我当初对于这种计划很表示赞成，因为中国学生向来瞧不起工作，社会上也瞧不起做工的人，故有了一种挂起招牌的组织也许容易得到工作，也许还可以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可见，胡适对毛泽东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同和支持的。

在暴风骤雨到来的前夕，毛泽东仍忆起了海峡另一边的故人，其情其心也确实耐人寻味。

心事浩茫连广宇。那一天，毛泽东和周谷城谈到了很多，也想到了很多。伟人遇上一吐为快的对象，越发谈锋纵横，才思横溢。

话题转到了旧体诗，转到了李商隐，两位朋友对那位才情骄世的唐代诗人都怀有同样的好感，同样的尊重。“老夫聊发少年狂”，周谷城用湖南腔兴奋地吟道：

海外徒闻更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柝，
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

当时七夕笑牵牛。

吟至此处，周谷城顿住了，他翻来覆去地将第五、第六句吟了几遍，最后两句，他无论如何都记不起来了，他显得有些尴尬。毛泽东大度地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替老友续上了后两句：

如何四纪为天子，

不及卢家有莫愁。

毛泽东朗声吟着，周谷城跟着哼，一时心情舒畅，超乎寻常。安史之乱，唐明皇亡命西南，痛失爱妃，这是上面这首脍炙人口的唐诗的意境所在。为平民学者的周谷城不知高低地信口吟来；为领袖学者的毛泽东随口接诵，心无芥蒂，两人之间的相交相知，可见一斑。

孰能知之，这竟是相交半个多世纪的两位老朋友最后一次欢聚。

又过了几年，周谷城在牛棚里听到了毛泽东熟悉的声音，那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录音。毛泽东在那次讲话中点名要解放八个教授，他们是北京的吴晗、华罗庚、翦伯赞和冯友兰，上海的周谷城、谈家桢、苏步青和刘大杰。

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

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老朋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周谷城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欣逢盛世，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当然，这些都已是后话了。

第三节

家破人亡

1966年夏开始的那场劫难，对于谈家桢全家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谈家桢从医院出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这场运动的对象，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在复旦校园内，贴满了揭露谈家桢“罪行”的大字报。他的“罪行”是：

他的学术观点是在生物学外衣下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

宣扬“龙生龙、凤生凤”的“资产阶级血统论”；

搞人体遗传学研究就是“提倡乱搞男女关系”；

“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翻案”等，不一而足。

这些内容，现在看来，实属荒唐，在当时却完全足以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甚而置人于死地。

大字报还声称：

要把谈家桢主持的遗传学研究所作为“谈氏小朝廷”、“资产阶级土围子”来加以摧毁；

要揪出谈家桢这个“漏网大右派”。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谈家桢是百口难辩了。

1966年7月初的一天，谈家桢被勒令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这是一次由全校红卫兵参加的对谈家桢的斗争会。

斗争会是在生物系大楼前举行的。

谈家桢至今难忘，那一天，有人在他的脖子上挂上一块木牌，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谈家桢"，把他推推搡搡地带到一个台前。这是由三张课桌临时搭就的"斗争台"。两张课桌在下，上面再垒起一张。谈家桢被驱赶着，爬上最高的那张课桌，跪在一块事先准备好的铁板上，名为"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第二层两侧，站着谈家桢的学生盛祖嘉、刘祖洞、项维和高沛之。

年轻人被一煽而起的激情，很快变成一种丧失理性的行为。一位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过骄人贡献、理当受到充分尊敬和爱戴的教授、学者，在愚昧无知的非理性行为面前，竟成了一个人人皆可起而攻之、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笼中"怪物"！戴着红臂章的年轻人愤怒地叫喊着、咆哮着、歇斯底里地发泄着，重演着人类在失控情况下自相残杀的丑剧。

当时，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在北京面对同样的丑剧时，曾用反嘲的态度冷静地回敬着失去理智的"红卫兵小将"，这也不失为一种自卫，对人格和尊严的自卫。

谈家桢不是相声演员，不是侯宝林。当时的他，只觉得手足冰冷，头脑一片空白，唯一令他自持的，是沉默。沉默是金，也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面对非理性行为、面对愚昧的"千夫怒指"时的唯一反抗。

狂热的群众继续一本正经地将滑稽丑剧演下去，一个又一个地走上去，慷慨激昂地谴责着谈家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谈家桢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动大学阀"；

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奴才和卖国贼"；

解放十八年来，他“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光耀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

1957 年，他“猖狂向党进攻，阴谋推翻党的领导，复辟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一套”；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疯狂反对三面红旗”；

1964 年，他被送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不思“学习改造”，却“住入花园洋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开着神仙会，向党进攻”；

他“打着拥护党的‘双百’方针的旗帜，排斥打击、甚至企图消灭别的学科和派别，独霸天下”……

谈家桢默默地听着自己的一条条“罪状”。此时，脖子上的木牌由铁丝牵拉着，时间一久，铁丝直勒入肉，痛彻心肺，但令他更感痛楚的，是这一连串完全颠倒是非黑白的言论！

当谈家桢勉强从台上爬下时，已是浑身脱力，但他强令自己不能倒下，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步履艰难地离开生物系大楼。万万没有想到，当谈家桢走到大楼前的一条路上时，一个年轻人，一个“革命小将”，竟突然发狂似的将一桶写大字报的墨汁，劈头盖脸地照着谈家桢的脸上和身上泼将下来，而后，厉声地叫着，要谈家桢从这里爬出校门！又一伙“红卫兵”拥上来，把谈家桢推倒在地，拳打脚踢，驱赶着这位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他们要强上一百倍的学者向前爬行！

一个疯狂的年代，人性遭到了无情的践踏；人们在践踏着他人的人格和尊严的同时，也在践踏着自己的人性！

谈家桢回到家中，见到的是衣衫被撕破，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夫人傅曼云。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地点，同样丧失理性的家属批斗会，对这位素来生性好强的女性，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傅曼

云回到家中，放声大哭。睹此惨状，谈家桢只觉眼前一片漆黑，他的心如同被撕裂开来，一滴一滴在淌着鲜血。

之后，谈家桢被勒令开始劳动改造。夫妇俩神情麻木，度日如年。傅曼云更是精神高度压抑，郁郁寡欢，谈家桢百般开导、劝慰，仍无济于事。

“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则继续以恶性虐待、“打落水狗”取乐。谈家桢夫妇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批斗。更有一些原是谈家的亲友故旧，也乘机倒水，造谣惑众，上台控诉，令夫妇俩倍受刺激，五内俱裂。

一个晚上，复旦附中的“红卫兵小将”又将傅曼云拉去批斗。批斗完了，傅曼云大哭。“小将”们认为她不服批斗，“负隅顽抗”，将她揿倒在一块洗衣搓板上，继续批斗。一些百无聊赖、只恨天下无事的“小将”们也闻讯赶来，将傅曼云团团围起，发泄取乐，于是，整个事态，越发火上浇油，无法收场。谈家桢见此景状，东奔西走，到处求助，却一一碰壁，无人施以援手。

当天深夜，受尽凌辱、萌生死意的傅曼云哭着对谈家桢说：“这种日子我已过不下去了，我们一起‘走’吧！”

其时，因不堪凌辱而走上绝路的，在全国知名人士中，已是多多，作家老舍先生、翻译家傅雷先生夫妇均在其列。就谈家桢本人而言，遭此平生奇耻大辱，又何尝不曾感到生不如死。但人总是人，但凡有生之可能，总不忍轻易放弃一线希望。底下，是他当晚对妻子说的一番发自肺腑的话：“我很对不起你，因为我，使你受到了株连。”

他顿了顿，又说：“我们如果‘走’了，孩子因为我们而成了反革命家属，他们会抬不起头来。”

“运动总是有时间性的，等过了这个风头，或许日子会好过点的。”

这是一位在逆境中仍不失睿智的科学家当年说下的一段十分理性的话语，现在念来仍颇耐咀嚼。遗憾的是，当时当地，他的夫人没有把他的这番话听入耳中去。

第二天，上午九十点钟光景，正在参加劳动的谈家桢接到一个消息，他的夫人寻短见了。他不能相信这是事实，但这毕竟是事实！当他经批准赶回家中时，屋内已是人去楼空，只见得门框上还留着一条绳子，夫人已被送往医院抢救。

待谈家桢赶去医院，傅曼云，这位风里雨里跟随谈家桢走过了大半辈子人生里程的女性，终因不堪凌辱，含恨离开了人世。

谈家桢双眼望天，欲哭无泪，历历往事，在他眼前一幕幕地浮现：

谈家桢整装赴美前夕，正值他与傅曼云结婚不久，新婚燕尔，两情相笃。深明大义的傅曼云理解丈夫立志科学救国的心愿，为支持丈夫实现远大抱负，他们变卖了家产，贴作谈家桢赴美的旅费和生活费。作为一个坚强的女性，傅曼云还独自承受了因谈家桢出国接踵而来的生活压力。其时，他们已有了大女儿谈曼琪，傅曼云又怀着第二个孩子。在谈家桢抵美后，傅曼云拖着一儿一女，奔波于上海、宁波两地，在这期间，她还当过小学教师，靠着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

谈家桢回国后任教浙大，又值抗战烽火，傅曼云携家带口，赴贵州湄潭与夫君团聚。谈家桢白天黑夜，带领学生投入科学研究，傅曼云养儿育女，相夫教子，一家恩爱，相得益彰。在那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谈家桢在科研教育事业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其

中有他自己的不懈努力，也有夫人傅曼云的一份辛劳。

20世纪50年代以来，遗传学事业风云变幻，数度起落。傅曼云咬紧牙关，与谈家桢同舟共济，风雨相随。好不容易，经毛泽东几番支持，中国遗传学事业拨开云雾，青山在望，大好风光正在眼前，美不胜收。不料，“文革”祸起，千万生灵涂炭，百千知识分子遭劫。谈家桢与傅曼云，一夜之间，美满家庭，面目全非。好端端的，对党对社会主义，对祖国对人民，一腔忠诚，丹心可鉴日月，却劫难陡起，精神肉体，双双受辱，人格扫地，怎堪忍受？

偏偏奇灾，应在今日。分明是，清晨起床，夫人双目无神，一言不发。谈家桢似有预感，又冀幸无事，请假相伴不能，临出门时，再三叮嘱老保姆：“好好陪伴师母，不要离去太久……”偏偏是，老保姆去传达室取牛奶，人老话多，唠叨几句，那边家中，已是祸起。待到赶回，房门紧锁，央人翻墙，破窗入室，为时已晚！

不该发生，偏已发生。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天大奇祸，竟在自己家中发生，竟在自己身上发生！

最小儿子龙儿放学回家，才知“坏妈妈”已经永远离开人世。小小学童，过早承受重大社会压力，幼小心灵，未得阳光雨露，反蒙阴云重重，父母双亲，本是学问品格俱佳，足可骄人，反令开蒙幼儿，不能栖身群体，非得要“与家庭划清界限”……而今，桌面上留着母亲给爱儿的绝笑：“龙儿，妈‘走’了，妈口袋里只有二十元钱，留给你用吧！”龙儿至此，豁然醒悟，生离死别，便在今朝，小手攥紧母亲留下的字条，失声痛哭！

面对膝前无母幼儿，面对远在外地服役工作的三个子女的劝慰与开导，谈家桢痛定思痛，写了一封信给女儿：

“你们放心好了，我如果要‘走’，当时会与你妈一起‘走’

的。我这样做，为的是你们的前途。任何斗争会我都会咬咬牙挺过去的。我还想看最后的结局。”

这位坚强的科学家果如其言，在家破人亡的打击下，硬是顽强不屈地活了下去。

那一天，风狂雨骤，天色如墨。谈家桢从火葬场取回了夫人的骨灰盒。回家的路上，他双手紧捧骨灰盒，一步一步，任如雹的雨点敲打着脸面，敲打着全身，心情沉重地回到家中。

半世恩爱，毁于奇灾。谈家桢的心都要碎了。

第四节

心有千千结　聚散两依依

在中国人民蒙受巨大灾难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蒙受巨大灾难的时候，在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同样蒙受着巨大灾难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仍有着一种深深的情结关系，一种心有千千结、聚散两依依的关系。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长年以来不辞辛劳为人民谋幸福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嵌在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这是因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尽管历经劫难，仍保留着长期积淀下来的对中国共产党的那份信任。这种情结，这份信任，在谈家桢的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

1967 年，“运动不断深入”。

1976 年初，上海掀起“一月革命”夺权高潮。

3 月 10 日，《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5 月 18 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两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在考虑为他亲手发动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打上句号了。遗憾的是，“瓶塞”已经打开，覆水难收；上了“魔咒”的风车似乎已无法停转。

此时，谈家桢之类的“反动学术权威”早已被赶进了“牛棚”。虽然，“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作为“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谈家桢辈自“运动”以来，已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饱尝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苦头。

生物系的造反派把谈家桢和忻介六、刘祖洞关在一个牛棚里，定点去植物园劳动。忻介六老迈多病，加之一个孩子因患精神病卧轨自杀，心情压抑，几次露出轻生的念头，刘祖洞也是情绪低沉，顾虑重重。三人中最为达观的，还是谈家桢。

多年后，几位“棚友”重聚叙旧，仍能忆起谈家桢当年为大家

打气时说的话，这些在困境中说出的肺腑之言，恰恰反映出谈家桢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信任：

“我跟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自信是了解共产党的，共产党也了解我。将来中国还是要发展科学，相信共产党还是用得着我们这些人的。

“我已是家破人亡，你们还不至于沦落到我这地步，但我不能死。毛主席支持我，他老人家多次要我把遗传学搞上去，我要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

谈家桢一直没有忘记毛泽东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谈家桢也一直没有忘记周恩来总理在关键时刻对自己的保护。1966 年下半年，当时复旦生物系的“革命师生”进京上访周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总理指示办公室就他的问题明确表态：

“谈家桢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漏网右派。”

周恩来在关键时刻的这一表态，令谈家桢在那段艰难岁月中能一直保持着对党、对人民的坚定信念，能鼓足勇气，顽强地和逆境抗争，翘首以盼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那一天。

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晚年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产生、发展及其后果，本文不拟展开。但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从 1967 年起，在具体涉及人、涉及那些被当做“运动对象”的人的问题上，曾有过几次讲话。

1967 年 2 月 23 日，《红旗》杂志 1967 年第四期发表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3 月 7 日，毛泽东在他的“三七”指示中又讲道：“还要说服学

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

3 月 10 日，在谈到“三结合”问题时，毛泽东说：“对于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4 月 15 日，《人民日报》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自己。”

属于同一内容的这段话，包括 1966 年 8 月 1 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所提及的在内，毛泽东至此已是讲了第三次。

7 月 30 日，《解放军报》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出来，参加革命行列。”

1968 年 4 月 27 日，《红旗》杂志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段话：“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话：“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可以这样认为，在“文革”这个非常历史时期的全过程中，毛泽东本人无意将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一大片逼到绝路上去，在这个问题上，他其实始终在费力地做着一件自圆其说的事情。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他的话已不再像林彪所肉麻吹捧的那样，是“一句顶一万句”，以至到后来，在解放和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已不得不由他本人亲自和具体到人地加以点名才行。

第五节

“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就在1968年的一天，谈家桢去农田里锄草。那时的谈家桢，是作为“给出路”的对象，被下放到上海郊区罗店监督劳动。十分意外地，有一个人走到他的身旁，俯身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从明天起，你就可以不用到田里劳动了。”

一时间，谈家桢激动万状。这是他等了多少天的一句话。他完全明白，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着多大的分量，意味着他从此将获得自由！

此时的谈家桢，百感交集，不能自已。他下意识地跪坐在田边，面向东方，任由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往下流，往下流……

后来，谈家桢才知道，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用他那惯常的口吻，似是不经意地，却又是字字落地有声地说了那样一句话：

“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点名要解放八位教授，这八位教授是：北京的吴晗、华罗庚、翦伯赞和冯友兰，上海的谈家桢、周谷城、苏步青和刘大杰。不幸的是，对毛泽东本人的这个决定，造反派采取了一贯的阳奉阴违的做法，将此作为“内部控制”，不予传达，以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被告知可以回家的第二日晚上，即与夫人双双自尽，饮恨黄泉！中央为此事追查下来，造反派才将决定对外宣布。

得知自己确实获得解放的消息，谈家桢自是又一番激动，以致失声痛哭。

这一次，又是毛泽东的一句话，把谈家桢从“给出路”的对象划入了可以“接受再教育”行列。尽管此时的谈家桢，已是“遍体鳞伤”，且垂垂老矣。

后来的事实还证明，毛泽东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谈家桢和他所从事的遗传学研究，确实仍牵挂在心。1970 年，王震将军由疆进京，向毛泽东述职时，毛泽东要求这位当年开发南泥湾的“胡子”爱将多读几本书，多搞点调查研究，多交几位知识界的朋友，并把谈家桢作为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了王震。

军旅出身的王震将军，历来办事雷厉风行，尤其对于他最为崇敬的毛泽东的指示。当下，王震便在北京找到华罗庚，托华写信给谈家桢，约谈家桢和自己一起去全国各地考察近几年来的农业育种情况。

谈家桢接到华罗庚的信后，顿时喜出望外，他本人与王震将军，素少个人交往，王震此番相约，十之八九，代表了中央、甚而是毛主席本人的意图，也许，这正是他又可以开展遗传学研究的一个信号！

心有灵犀一点通。毛泽东之于谈家桢，谈家桢之于毛泽东，可谓心交、神交、至交，可谓心有千千结、聚散两依依了。

不久，谈家桢又收到了华罗庚的第二封信。华罗庚在信中明确地告诉谈家桢，王震已经打报告给周恩来总理，一旦批下来，就可以动身，要谈作好准备。

谈家桢及时把这两封信交给了当时的学校领导，静候批示。

信交上去了。其后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过了好久，才知

道信落到了当时上海的那个朱永嘉手上，像所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政治“暴发户”一样，朱永嘉压根儿没有把三五九旅老旅长这么一位开国元勋放在眼里，他在信上批示道：

“这些老家伙，就是喜欢这样的人，不要理他。”

其时，中国的情况就是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尽管许多人都在竭力地把自己打扮成最最听毛泽东的话、最最拥护毛泽东的样子，事实上，正是这些人在反对着毛泽东本人。结果是，毛泽东的意思已很难贯彻，毛泽东的话也变得不太管用。

谈家桢只能继续耐心地等待。

第六节

坚持真理

历史证明，那些高喊打倒权威、竭力贬低权威的人，骨子里是害怕权威，却又不得不承认权威，需要时甚而不得不倚重权威的。

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青年电工宣布，用微量电刺激棉花植株，可以使棉花纤维的长度增长，从而使普通棉花变成长绒棉。自有好事的记者将之写入报道，不意姚文元在一份材料上看到了这则报道。这个当年不知现代音乐为何物却气势汹汹地讨伐德彪西、以致贺绿汀拍案而起以维护真理的文痞，这次，尽管同样地对遗传学一窍不通，居然堂而皇之地在材料上批示道：

“要通过电刺激棉花走中国遗传学发展的道路。”

于是，总有一些溜须拍马之徒，急急忙忙地秉承旨意，整理材料，召开现场会，组织展览会，弄虚造假，大加鼓吹。一场闹剧匆匆开场。

偏偏，吹鼓手们自知心中无底，若要假戏真做，总须压轴人物。他们想到了这方面的权威人物，又忙忙地唤来了谈家桢，期望这位受到过毛泽东器重的中国遗传学泰斗也能参加他们的“啦啦队”。

无奈，谈家桢早已看穿这伙人的把戏，对之嗤之以鼻。

软的不行来硬的。吹鼓手们动用了行政命令，要谈家桢每天去农科院总结“电刺激棉花”的经验。

对付强权高压的最好办法，就是“消极怠工”。谈家桢人到现场，却给它来个哼哼哈哈装糊涂，一天一天打发时间。过不多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一场闹剧终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在强权面前，谈家桢棉里藏针，维护了科学的尊严，保持了一个科学家的良知。

1972 年，全国第二次遗传学讨论会在海南岛举行，谈家桢没有去参加会议。按照朱永嘉之流的逻辑，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会上，有一种形成主流的说法，即所谓既不信米丘林，也不信摩尔根，而是要相信中国的农民科学家，创立中国的遗传学派。这倒颇有点当年前苏联李森科起家时搞“政治科学”的架势了。为此，会上还专门树了一个典型——“农民科学家”张泗洲。

据说，张泗洲用蓖麻和棉花杂交，培育出了蓖麻棉。

还有人活龙活现地说，棉花种子经活性染料染色，染上什么颜色，就能产出什么颜色的有色棉花。

这些在今天看来完全缺少科学根据、近乎荒诞的说法，在当时

居然吹得神乎其神，以至于复旦大学去参加会议的代表回去后，学校居然还让他们专门传达介绍那次会议的情况。

有人问谈家桢，对此有何看法？问话的是当时学校的工宣队。

有何看法？事情是明摆着的：蓖麻和棉花，一属锦葵科，一属大戟科，两者的亲缘关系如此之远，难道，仅仅用一般的杂交试验，就能成功地进行远缘杂交，产出杂交种，甚而能遗传下去，这岂不是连极其普通的常识都不知道吗？谈家桢摇摇头。他无意附和。至于由活性染料染过色的种子，居然能产出有色棉花，这更是天方夜谭，在开科学的大玩笑，比昔年的李森科还要李森科！

想了一想，谈家桢回答说："搞科学研究，至少要具备两点，一是观察，二是实验。这两点，我都不具备。我既没有亲眼所见的东西，又没有进行实验，我不敢妄加评论。"

这是在当时政治高压下一种婉转的说法，潜台词十分清楚：对于这类与科学背道而驰的说法，他谈家桢不敢苟同！

一个工宣队头头忿忿不平起来：

"既然你不肯承认农民科学家作出的贡献，那就老老实实到实地去学习学习吧！"

就这样，谈家桢被安排去了四川"农民科学家"张泗洲所在的那个公社。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位在"文革"中被吹得红得发紫的张泗洲，就其本人而言，虽说大字不识，如同江苏的顾阿桃，但也确是个肯动脑筋的细心人。"文革"开始后，他对风行一时的"斗争哲学"心领神会，于是亦步亦趋，居然升为公社党委书记，不久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对于谈家桢的到来，张泗洲显见是欢迎的，对着谈家桢这个"臭老九"的鼻祖，张泗洲没有拿腔作势，盛气凌人，

这也说明，对这样一个人，倒不能以一般等闲之辈观之。无奈谈家桢在张泗洲那里考察了一个月，照张泗洲的那套方法，无论是在当地大田里，还是后来回到上海，反反复复，试验了多次，蓖麻还是蓖麻，棉花还是棉花，绝对得不出张泗洲那样的结论。对于谈家桢来说，这也本属意料之中。

事情自没有到此为止。张泗洲的眼光瞄准了谈家桢这个中外闻名的科学家。

1975 年，《植物学报》编辑部给谈家桢寄去一封信，说是正准备发表张泗洲的论文《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远缘杂交》，张泗洲本人提出，论文发表时，要和谈家桢共同署名。问谈家桢有何意见？抹了灰的金字招牌仍是金字招牌，假货总爱傍着正宗货。张泗洲的意图是不言自明的。

谈家桢仔细“拜读”了张泗洲的“大作”，摇头不已。那“论文”通篇没有任何科学价值且不说，有一大半篇幅是穿靴戴帽的“批判”、“斗争”内容，不管是否出自张泗洲本人之手，却分明是一篇迎合“批邓”需要的邀功之作了！

谈家桢谢绝了这份争功邀宠的荣幸，他郑重地复信给那家编辑部：

> “我跟张泗洲学习了一个多月，可能时间短，没有得出如张泗洲同志那样的结果，回来后反复试验，仍无结果，很可能是我没有学习好技术。至于署名问题，我无功不受禄，不能把我的名字放上去。”

14 年后，谈家桢应邀为台湾牛顿杂志社题词，他深有感触地写

下了八个大字：

“真理使人获得自由。”

从李森科到“四人帮”，到张泗洲……谈家桢在为科学真理而奋斗的大半生中，所遇所历，形形色色，但他从未在强权或利诱面前放弃过坚持真理的立场，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会拿真理去作交易！也许，这正是中外科学界人士看好谈家桢的原因所在，也正是毛泽东看好谈家桢的原因所在。

第七节

“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文章？”

毛泽东一直记挂着谈家桢。

1974 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病重。在周恩来总理的力荐下，毛泽东决定，请邓小平出来全面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自始，中国的国民经济枯木逢春，走向复苏。1975 年，周恩来支撑病体，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向全国人民响亮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

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国防的实现，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当务之急乃是人才问题。

刚刚和周恩来一起，以其雄才大略，成功地迈出了中美建交这

一划时代的历史性大步的毛泽东，在他中南海的住地，频频地接见从海外归来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等人，又殷殷垂询在京的李四光等著名科学家。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讯号：中国将再度向科学发起进军！

从50年代开始便对中国遗传学发展寄予厚望的毛泽东，此时此刻，即便是在病榻之上，仍时时牵挂着与中国的农业、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遗传学事业，牵挂着他远在上海的老朋友谈家桢！

这位中国大地上的世纪政治伟人，曾以其过人的智慧和远见，及时地支持了一位通过瓢虫和果蝇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正直科学家。借托了一个历史契机："双百"方针，这两位历史人物站到了一起，演绎出了一幕幕传为人间佳话的历史故事。其时，设若条件可能的话，相信毛泽东一定会再度来到上海，再度会会他的老朋友，再度伸出他那宽厚的大手，向谈家桢传递他的关爱、他的信任、他的力量和他的支持；再度倾听快人快语的谈家桢谈谈达尔文，谈谈孟德尔，谈谈摩尔根，谈谈中国遗传学发展的前景——令人至为遗憾的是，由于健康的原因，老人已无法离开首都，无法去到上海，去到杭州，去到刘庄，无法重续"西湖佳话"；他的朋友，他的人民，只能在新闻报道中，在中南海那累案盈架的书籍海洋中，见到那熟悉的身影，见到那富有魅力的手势和微笑，从心底里祝愿他健康长寿，祈告中国国泰民安。

毛泽东理解老朋友的心愿，再一次从北京城派出了自己的信使。这一次，他仍然选定了自己的爱将，长期从事中国农垦事业的王震。

1974年冬，王震将军抵沪，在他下榻的新乐路东潮宾馆，邀约谈家桢前往晤谈。

这是一次简短、无法深入展开的晤谈。

谈家桢是在获得当时“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准许，在由他们派出一个“陪同”的情况下前去宾馆的。

见面之后，王震抓住谈家桢的手紧紧握了又握，代表了毛泽东，也代表了他本人对这位科学家的敬意。

坐定后，王震躬身凑近谈家桢，一字一顿、语重心长地说：

“毛主席很关心你，他在病中还没有忘记你。这次，让我带口信给你，问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的文章？有什么话还可以说嘛！”

这段话，每一字，每一句，都说到了谈家桢的心坎里；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谈家桢期盼和等待已久的！

王震准确地传达了毛泽东的信息——

毛泽东没有忘记谈家桢，毛泽东理解谈家桢，毛泽东信任谈家桢！

这段话，表达了毛泽东对谈家桢的关爱和期望，也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遗传学事业的关爱和期望！

谈家桢凝视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和霭可亲的王震将军，万感丛生，一时如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回过头去，他看到了身边那个虎视眈眈的“陪同”，他苦笑着，只向老将军说了这么一句话：“谢谢他老人家，我是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啊！”

虽说是这么一句话，谈家桢还是及时准确地向毛泽东表示了他的谢意和他的决心。

这是一次简短而无法深入展开的晤谈。这也是共和国领袖毛泽东最后一次向遗传学家谈家桢传递他本人表示关爱的信息。

第八节

相濡以沫的慰藉

多年以后，有人谈及邱蕴芳医生当年和谈家桢的结合时，都不无褒奖地说，在那样的年月里，是需要拿出点勇气来的！

谈家桢每每谈起邱蕴芳对他的照顾和护持时，则总是笑口难合："是啊，多亏了她——"

1972年，谈家桢和邱蕴芳医生相识。

人到中年的邱蕴芳是一位热爱事业的妇产科医生，她胸襟开阔，性格直爽乐观。她年轻时曾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之后，她一直是上海一家医院的业务骨干。

这一年，通过傅曼云的一位生前好友和邱蕴芳所在医院的一位会计的牵线搭桥，谈家桢和邱蕴芳走到了一起。当时的谈家桢，家无余财，且是全国闻名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虽名为"解放"，却仍属"运交华盖"，时时受掣。独具慧眼的邱蕴芳偏偏欣赏谈家桢一眼见底的耿直性格和直面人生的达观态度，钦佩他对科学事业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学问。虽无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她却心意已决。

一年以后，两人结为伉俪。

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起，交白卷的"英雄"被捧上了"教育革命闯将"的交椅。于是，又开始轮到谈家桢写"检查"了。饱尝"运动"苦楚的谈家桢情绪极度低落，性情乐观开朗的邱蕴芳非但毫无责怪之意，反而主动劝慰，不时在饭后陪伴着谈家桢，沿着复旦大学宿舍前的小路散步、聊天。很自然的，这便成了谈家桢

在身处困境中的极大慰藉。有一件事，谈家桢至今忆起仍不免发噱：原来，当时要他写检查，他思来想去，不胜其苦。邱蕴芳就给他出主意，何不把调头提高，甚而愈高愈好，譬如，“我是软刀子杀人”之类，“你又没有杀人，怎么能定你杀人罪呢?”

夫人聪慧的话语，引来谈家桢一时开怀的笑声。

第九节

大难不死

1975年春，四届人大召开。据知，由于毛泽东的过问，将谈家桢和赵超构的名字补进了上海代表名单。但谈家桢等仍被告知，他们是作为上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去参加会议的。临去北京时上海造反派头头的一番训话，令谈家桢反感不已，加之，在大会上见周恩来身体更见羸弱，令人担忧。整个会期，并没有给谈家桢带来多少愉悦。

回上海后，谈家桢一年前出现的腹泻不止的现象愈见严重，且大便中夹带少量出血。在邱蕴芳的坚持下，谈家桢被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之后，又经放射科专家荣独山教授的介绍，经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仁济医院和中山医院三家医院的肠道专家会诊，一致亮出红牌，谈家桢被送进了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

检查整整进行了一个月，拍了70多张片子……

结果出来了：肠癌！

具体确诊为，大便中夹带的不是血，是瘤子开花，所幸浆膜未破，否则就会导致急性腹膜炎，腹水渗出，至多只能延长一周的生命。而今，亏了邱蕴芳的及时决断，多方会诊，及时发现，尚可手术切除。

其时，谈家桢所患结肠癌已到了晚期。邱蕴芳心急如焚，但在谈家桢面前，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名医生，她仍需强作镇静，对谈家桢慢慢疏导，使谈家桢增强战胜病魔的信心，积极配合医院进行治疗。于是，当谈家桢当晚独自从医院回家里，向邱蕴芳问及诊断结果时，邱蕴芳平静地回答丈夫："在医院里，只有主任医生才有权告诉你最后诊断结果，不要听信其他人的话。"

不久，随着闻讯前来的看望谈家桢的人越来越多，邱蕴芳觉得对谈家桢已无法继续相瞒，她决定把诊断结果对丈夫直言相告。这一天，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十分耐心地为谈家桢讲述了病因和诊断结果，又综合了专家们的意见，告知大夫，手术治疗是目前的最佳方案。

妻子的疏导，令谈家桢打消了顾虑和不安，他决心面对现实，接受这次手术治疗。

手术前三天，专家们讨论手术方案，邱蕴芳以病人家属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被邀参加。在谈及要为谈家桢做人工肛门的方案时，邱蕴芳提出了一个十分内行的问题，她表示希望知道病案记录中所记致癌直肠距肛门的距离是多少。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原来，在医学上规定，如果致癌直肠距肛门距离太近，便只能做人工肛门；但如果超过一定的相隔距离，便无须做人工肛门。结果一查，发现谈家桢的病史记录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于是当晚马上补做直肠镜检查，一量距离，根据规定，可以不做人工肛门。主任医生拍拍邱蕴芳的肩说："你真是为谈家桢做了一件好事！在这件事情上，是我们失职了。非常对不起！"

手术艰难地进行了11个小时。

手术以后，亲自主刀的王主任对邱蕴芳说：

“幸亏手术及时，要是再迟10天，就会穿孔，即使手术，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从一定意义上讲，夫人邱蕴芳医生救回了谈家桢的一条命。

在夫人的精心护理下，谈家桢康复得很快。

然而，1976年9月，巨星陨落，毛泽东与世长辞。

对于谈家桢来说，毛泽东的逝世是他平生以来至为哀痛的一件事。

1976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灾难不断的一年，先是这年一月，德高望重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同悲。继之，朱德元帅撒手人寰。入夏，紧邻京畿的唐山发生特大地震。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随后，便是毛泽东主席的去世。

对逝者的悼念，对未来时世的担忧，如磐石，如阴影，如乌云，压在广大中国人民的心头，压在谈家桢的心头。谈家桢再度病倒了。

9月，全国哀悼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上海在文化广场设下灵堂。作为各界知名人士之一，作为毛泽东的生前友好，谈家桢被安排在灵堂守灵。

哀乐阵阵，哭声阵阵，凉风阵阵。心头巨大的悲痛，引发了阵阵加剧的胃痛，大病初愈的谈家桢突然觉得头眩目晕，手足冰冷。勉强支撑到换班，在家人的扶持下回到家中，他便血了，色如柏油。急送医院检查，发现为广泛性糜烂性胃窦炎。于是，再度手术，为彻底清除癌病灶，切除胃的三分之二。

又是一次重大手术，又是长达数月的护理恢复。亏了负责的医护人员，亏了夫人邱蕴芳，谈家桢又一次战胜了病魔，康复如初。这时，已是大地回春、桃花盛开的时候了。

第五章
一个没有画上句号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这个新的时代，被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又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时代。作为一个划时代的伟人，邓小平的名字与这个时代紧紧相连，他被公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倡导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前后，邓小平就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所作的一系列高瞻远瞩的讲话。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科学家们经过严冬之后，欣喜地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

第一节
科学的春天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的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

邓小平又说：

“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人才，怎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

这一年7月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谈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谈到了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邓小平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8月8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指出：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再一次提到了：“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

邓小平还谈到：“有的人在科学研究上很有成就，为我们国家作出了贡献，这样的人要不要鼓励？我看要。有的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埋头苦干，应当鼓励。”

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举

世瞩目的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近6000人，这次大会着重讨论了中国的科学技术问题，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在这个《纲要（草案）》中，遗传工程已和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一起，被列为我国八个重点优先发展的领域。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表达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心声。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邓小平谈道："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这位历史伟人还石破天惊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他又深刻地指出："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邓小平在讲话中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要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的任务。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谈到了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问题。

邓小平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

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邓小平又说：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讲话，表述了广大科学工作者长期蓄积的心声，令人耳目一新，廓开了大家的思路和视野。

之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更为长年以来“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为与世隔绝多年的中国遗传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

作为中国遗传科学奠基人的谈家桢已年逾70，垂垂老矣。昔日的师长与同窗多已相继谢世。谈家桢庆幸自己重睹“科学的春天”的到来。虽古稀之年，仍不觉老之已至，他要为自己深爱的祖国，为科学，为遗传学事业，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

第二节

夕阳无限好

◆ 一、一个严峻的事实 ◆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遗传学研究对于中国而言，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但在全世界范围，完全可以用“突飞猛进、

一日千里”加以形容。

1953年，沃生和克里克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解决了生物自我复制之谜，被誉为生物学上的第二个里程碑，是继达尔文物种起源学说之后生物学上最重大的突破。由于这个突破，生物学的面貌完全改观，人类对生命现象的研究，自此便完全处在一个定量的基础上了。人们分析，如果说20世纪的前五十年是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黄金时期，那么，这个世纪的后五十年，也就是从1953年起到20世纪末，将是生物学的全盛时期。后来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自1953年建立了DNA分子双螺旋模型以后的10年中，分子生物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项成就是，遗传信息的转移规律的阐明和遗传密码的编码成功。

1958年，克里克提出了遗传信息传递学说，又称“中心法则”。

至1970年，梯明和巴尔蒂姆分别在肿瘤病毒中发现了RNA指导DNA的聚合酶（即反转录酶），通过这一聚合酶的催化，RNA可以指导合成DNA，“中心法则”由此得到重大发展。

“中心法则”是当今遗传科学的一大突破。它合理地说明了在细胞生命活动中核酸和蛋白质两类大分子的联系和分工。在生命活动中，核酸和蛋白质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因果关系，彼此之间，一方失去另一方便无从体现生命活动；同时，它们各自又有严格的分工，核酸的功能在于储藏和转移遗传信息，指导和控制蛋白质的合成，蛋白质的功能则是进行以酶为催化的新陈代谢，并作为细胞结构的组成部分。生命活动正是在上述两种生物大分子的作用下得以体现的。

1963年后确立的遗传密码概念，是分子生物学最富革命性的突

破。其后，科学家证明，在蛋白质合成中，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顺序和每个氨基酸在蛋白质分子中的排列，是由3个相邻连接的核苷酸所组成，而每三个连续的核苷酸组成一个三联体遗传密码，他们相对于DNA分子上的每3个碱基，由此决定蛋白质链上的一个对应的氨基酸。科学家进而验证了三联体遗传密码，并全面阐明了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密码字典，证明遗传密码无论对生物学中最简单的生物、还是最高级的生物，都是普遍适用的。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化学家皮·伯格首次构成第一批重组DNA分子，从而创造了生物学史上第一次将两种不同的基因在体外人工拼接在一起的奇迹。

1973年，斯坦福大学科恩博士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博耶博士进一步发展了DNA重组技术，自此，这一重组技术的发展一发而不可收，并迅速与其他生物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蔚为壮观的现代生物工程技术体系，从而拓开了人类遗传工程的新纪元。

这一切，对当时中国的遗传学工作者来说，充其量只是见诸文献资料而已。即便如此，也仅是见其局部，而未能得睹全貌。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国门大开。世界科技的最新信息一经传入，沉寂已久的中国科学界为之震动，中国遗传学界为之震动。

谈家桢身当其任，他没有忘记毛泽东的嘱托："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但他清醒地看到，差距客观存在，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的事实。同时，他又急切地感到，为了中国的遗传科学事业，为了向从事遗传学研究的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人交好班，他必须寻求一切机会，为尽快尽早弥合中国和先进国家在遗传科学研究进程上的差距，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 二、抓住机遇　与国际接轨 ◆

1978 年，年近七旬的谈家桢重返国际遗传学舞台。其间穿针引线的，是谈家桢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老同学邦纳。

1934 年，谈家桢远涉重洋，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时，邦纳已经获得博士学位，这位比谈家桢小两岁的科学家当时正在“蝇室”从事植物生理化学研究。谈家桢在美三年，与邦纳住同一幢楼内，年相近而道相若，加以志趣相投，两人堪称莫逆之交，他们曾同煮一锅饭，杯觞交错，共话未来；他们也曾在阳光下驱车郊游，面对着海水、绿茵、美景如画，畅述心曲；“蝇室”这个团结、友爱、互相扶持的科学群体，更养育了他们彼此深厚的情谊。谈家桢归国后，他们鱼雁传书，互相勉励，时时获知对方在科研学术道路上取得的进展。1948 年以后，双方虽隔绝音讯，但思念之情始终未断。

30 年后，时为加州理工学院退休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和著名分子遗传学家的邦纳首先向老友谈家桢发出了邀请信。这位同时还担任着美国植物基因公司董事长的美国科学家在信中邀请谈家桢前去美国参加母校——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邦纳教授在信中还表示，谈家桢此次访美的全部费用都由他来承担。

谈家桢意识到，这是他作为中国遗传科学工作者的代表重返国际学术舞台的一次机会，于是欣然赴约。就这样，在邦纳的力促下，谈家桢迈出坚实的步子，再次踏上加利福尼亚洒满阳光的土地，再次登上加州理工学院的讲台，以海外校友的身份，作了题为《遗传学在新中国》的报告。这个报告概要地叙述了“李森科主义”在中国遗传学发展道路上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叙述了“四人帮”对中

国科学事业的摧残和破坏，叙述了毛泽东本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的关爱和支持，以及中国遗传学事业富有戏剧性的几度起落，引起了与会科学家的极大重视。这也是中国遗传学家在与国际学术界阔别30年后的首次成功亮相。

会议结束以后，在邦纳和美国学术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谈家桢先后赴美国的东西部进行考察和访问。在加州戴维斯分校、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马里兰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得克萨斯州医学中心和哈佛大学等处，谈家桢马不停蹄地参观了那里与遗传科学研究相关的实验机构和设备，与科学界的新知旧识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在谈家桢先后访问的科学家中，有正着力于研究真菌行为、被誉为“分子生物学之父”的德尔布吕克，有在60年代发现三联体密码的尼伦伯格，有提出顺反子学说的本泽尔。他还在冷泉港见到了DNA双螺旋模型创造人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沃生，见到了遗传转座因子发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麦克林托克。在纽约，他会见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细菌性别发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列德伯格，会见了芝加哥大学校长、“一个基因一个酶”的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德尔教授。

在与这些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的接触中，谈家桢不仅了解到他们在自己原来的研究领域中已取得的重大突破，还通过他们正在进行中的新的领域的研究，了解到国际生命科学领域，其势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许多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决不满足于既有成绩，而是高屋建瓴，站在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向新的课题发起挑战，向新的目标发起冲击；谈家桢还了解到，当时的生命科学研究，已转向神经生物学方面，人类正在开展包括大脑在内的研究，这令人鼓舞的一切，

对谈家桢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鞭策。

行程万里，令谈家桢大开眼界，感触良多，当今国际遗传学发展的方向，中国遗传学研究的重新起步……一个又一个令人振奋的课题，在他的心中渐成轮廓。他庆幸此次西行，收获多多。他深有体会地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补课。"

◆ 三、三个到位 ◆

中国遗传科学的研究，毕竟和国际世界隔绝了整整三十年之久！

为科学界泰斗的谈家桢，老当益壮、灵珠在握的谈家桢，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他想到了：

要急起直追，不能不及时了解当今世界的信息；

要急起直追，不能没有先进的科研条件和实验仪器设备；

要急起直追，不能没有第一流的人才；

要急起直追，大振中国遗传学事业之雄风，上述这三件事情必须到位！

作为一个合格的科学家，必须具备一种素质，那就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谈家桢正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在中国科学界，他历来被认为是：敢想，敢说，敢做。

这一次，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不久，谈家桢又一次走在了前头。

谈家桢的访美行程表，被安排得十分紧凑。虽日夜兼程，谈家桢没有忘记见缝插针，做他已经想到了且一定要去做到的事情。

于是，就出现了原来日程表内没有被排进的、谈家桢与贝克曼的会见。

贝克曼，与邦纳一样，也是谈家桢昔日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老同

学，时为美国贝克曼精密仪器公司董事长。这家公司在当时以生产高质量的精密仪器而闻名遐迩。

遇到老同学，谈家桢开门见山了。中国遗传学研究要走向世界，需要第一流的仪器设备，需要你——我的老同学的支持！

谈家桢不减当年的那种为科学一往无前的精神，谈家桢恳切的话语，深深打动了贝克曼的心。

OK！最优惠价格，而且，先交货后付款——

贝克曼破例地和谈家桢签订了这样一份协议书。谈家桢以欠款方式为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引进了价值二十万美元的高速和超高速离心机、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液体闪烁仪和分光光度等五大件大型精密仪器。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现代化的仪器设备装备了实验室，为复旦遗传学研究所在全国率先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和教学，为培养新一代中国遗传学人才，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这中间有一个今天看来已成为历史的插曲：

原来，当谈家桢获得贝克曼方面以欠款方式引进仪器的承诺之时，已来不及向国内打报告得到批准了；也就是说，好事来得太突然，唯一的办法，便是只能自作主张，来个“先斩后奏”。当时的谈家桢，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咬咬牙，决定豁出去了。

事后，谈家桢果然受到了当时教育部的通报批评，并被告之“下不为例”。但事实上，仍肯定了引进这批仪器的必要性。

与贝克曼会见后，谈家桢又马不停蹄地访问了另一位老同学特里尔，特里尔时为加州生化公司的董事长。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同样地，为谈家桢一颗金子般的心所打动，两位老同学久别重逢后的一番促膝长谈，令他下了决心，先后两次，他无条件地慷慨赠送了价值 30 万美元的试剂和药品！

仪器设备的到位，为队伍的组建和人才的培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人才培养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前提是，知识和信息的输入。

谈家桢访美期间，应美籍华裔科学家孔宪铎之邀，访问了马里兰大学分子遗传学实验室。70 年代，孔宪铎曾回国访问，并与谈家桢会晤，两人之间建立了友谊。此次重逢，谈家桢向孔宪铎提出，希望由他牵线搭桥，邀请美国第一流的分子生物学家到中国去讲学，孔宪铎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回国后，谈家桢便积极筹办一个全国范围的分子生物学讲习班，这个讲习班旨在通过引进国际一流的专家学者进行讲学，促进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全面启动。

恰在这时，上海著名民族工商业者、原正泰橡胶厂厂主刘汉林先生通过有关人士表示，愿意将“文革”抄家后按政策退赔的一笔款子，无偿地用于资助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直接地说来，就是将这笔款子捐助给谈家桢主持的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

对于谈家桢而言，对于百废待兴的遗传学研究事业而言，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之举。谈家桢和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苏步青与刘汉林先生晤谈之后，真是喜出望外。在这次晤谈中，刘汉林先生当场拍板，将 20 万元人民币捐赠给谈家桢所从事的中国遗传学研究事业。

1979 年金秋，由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举办的“全国遗传工程分子生物学讲授班”开班，来自国内 37 所高等院校和 40 个科学研究机构及医学系统的 250 余位学员出席讲习班，谈家桢以个人名义邀请了美国科学院院士邦纳教授和他的助手、加州理工学院高级研究员、美籍华人吴仲蓉博士和夫人汪黔生博士，为这次讲习班担任主讲，并进行包括遗传工程的基本操作和实验技术在内的示范。这

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高质量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的讲授班，这次讲授班，向国内学术界及时传递了国际遗传学界在这一领域发展的最新信息，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遗传学界的队伍组建和人才培养，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之后，谈家桢又邀请海外许多著名科学家到复旦大学讲学，其中包括美国的朱孝颖教授（讲授人类遗传学）、孔宪铎教授（讲授植物遗传学）、葛兰德教授（讲授发育生物学）、瑞士的凯罗斯教授（讲授计算机在遗传工程上的运用）、日本的草雉教授（讲授植物的细胞遗传学）；此外，还邀请了日本的掘田凯树教授和北川教授，美国的达姆斯教授、华莱士教授和阿耶勒教授等，为研究生开设行为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等系统课程。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符扬鞭自奋蹄。欣逢盛世，虽迟也贵。谈家桢牢记毛泽东的“要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的遗训，真正放开手脚大干起来。

◆ 四、万紫千红　春色满园 ◆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谈家桢曾多次提到跟国际接轨，走“联合舰队”、“大兵团作战”的道路。这位善于思考的老人总结了中国遗传学研究半个多世纪来曲曲折折的历程，纵观国际遗传学研究发展的前景，反思中国学术界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越发坚定地认为，中国的遗传学、中国的生命科学事业要取得大的发展、大的突破，一定要加强交流、精诚合作。这种交流，这种合作，不仅是指中国遗传学界内部、中国生物学界内部要打破“门户之见”、派别界限，同时还要打破生物学和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而且，要加强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此外，他

瞻观当代国际遗传学发展的态势，卓有见地地指出：

在传统的生物学领域，专业之间相互割裂，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狭窄，动手能力差，不能适应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需要。

他指出，在专业设置上，必须打破原有的苏联模式，建立一个适合现代科学发展和社会需要的专业系列。

1978 年的访美之行，无疑给这位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

谈家桢抵美之时，正值被世人看好的分子生物学开始转向，进入神经生物学这个全新的领域。仅加州理工学院一地，该院生物学部三十几个科研摊子，其中有一半的工作属于神经生物学和神经遗传学的范围。

之后，在与德尔布吕克、沃生、克里克和伦伯格等分子生物学奠基人接触并展开深谈过程中，谈家桢又得知，德尔布吕克已转向一种粘菌的行为研究，另外三位则已先后转向神经生物学研究。更有一些科学家则开始致力于研究更高级的物质运动，包括人的感觉、思维和行为的物质基础。

谈家桢认为，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当代的一些科学家对科学发展趋势所具备的远见卓识，从而能令自己的研究工作始终居于科学发展的前沿和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一个具有规律性的问题，那就是，人类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必然是由低级物质运动形态向着高级物质的运动形态发展。

谈家桢指出，在物质的运动规律中，最简单的是力学运动规律，而后是光学、电学、声学等物理学运动，再后是化学运动。上述这些运动都属于无生命的物质运动范畴。而有生命的物质运动，才是高级的物质运动。21 世纪的前五十年，是物理学和化学突飞猛进的

时代，之后五十年，则必然进入生命科学一日千里的时代。道理说来简单，高级运动规律不仅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还须遵守低级的运动形态规律。在低级运动形态没有基本弄清楚前，自不可能深入研究高级运动规律。自 21 世纪 50 年代起，生物学的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化，但要精确地用定量方法说明生命现象及其本质，仍须求助于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就是谈家桢后来一直谈到的生命科学和数学、物理学、化学的相互介入、相互渗透和相互支持关系。

谈家桢还多次举例说，在当今生物学领域，有许多原来从事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家都曾异军突起，作出过杰出的甚而是划时代的贡献。其中，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锷，曾用热力学和量子力学原理解释了生命活动规律和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等问题；搞诱发变异的德尔布吕克原来也是一位物理学家，这位海兴堡的学生，而今在国际遗传学界的声名已蒸蒸日上；此外，如本泽尔、斯坦德、克里克等，究其出身，也都是物理学家。

可以说，昔日在孟德尔、摩尔根高高举起的生物学研究大旗下，而今已是群英荟萃，千树竞秀，由于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的加盟，生物学研究这面大旗正变得越发璀璨夺目，人类对生命现象的研究，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认识是实践的先导，谈家桢廓开思路，在复旦大学率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战略性改革。复旦大学生物系在全国综合性大学中，是一个历史较长、富有特色的一个专业，它专业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各专业带头人均为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教授。自 80 年代起，根据谈家桢的意见，生物系原有的九个专业被改为五个系，为遗传学系，生物化学系，生理和生物物理系、微生物系及资源和环境生物系。1986 年，在经过两年时间的准备基础上，正式成立复旦大学生命科

学院，谈家桢出任首任院长。1987年，又建成复旦大学遗传工程重点实验室，并通过国家验收，成为全国第一批十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至此，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已包容五系、一所（遗传学研究所）、一室（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和一个博士后流动站。阵容强大，蔚为壮观。

在“粮草兵马齐备”的条件下，谈家桢又果断决策，充分利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人才优势和知识资源，多渠道地联系国际性合作项目，吸收国外的科研经费，能动地推进教育和科研。他先后确定与美籍华人学者廖英华教授合作进行人类医学研究，与日本北川、冈田教授合作进行果蝇进化遗传研究，与美国干扰素科学公司进行基因工程的合作研究，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吴瑞教授进行水稻遗传工程的合作研究。其中，1984年，谈家桢在美与干扰素科学公司达成进行基因工程的合作研究的协定，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在成功获得水稻核DNA的基因文库和水稻的自主复制序列基础上，经三年时间，研制出一种人工染色体，这种染色体可以作为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实施基因工程的人工载体，为此，美国干扰素科学公司每年将向复旦遗传所提供六万美金的研究经费。

与此同时，谈家帧又不失时机地利用出国访问、会晤旧识、广交新知的机会，积极推荐国内人才到欧美国家和日本进行学习进修，获取最新的知识、技术和信息。其中，仅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一处，经他联系和推荐的出国学习进修人员就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上述学者陆续归国以后，在科研和教学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时至80年代，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队伍，组合三军，择其将帅，统一认识，大步进军，斯其时也。

1978年10月6日，中国遗传学会在南京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在

此之前，先后成立的中国生物学的各专业学会为：中国生理学会（1926 年），中国古生物学会（1929 年），中国植物学会（1933 年），中国动物学会（1934 年）和中国昆虫学会（1944 年）。

德高望重的李汝祺教授被推选为中国遗传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长，谈家桢、祖德明、金光祖、钟志雄、胡含、卢惠霖、沈善炯、奚元龄、方宗熙为副理事长。

1981 年，中国遗传学会各专业委员会相继成立，为植物遗传委员会、人类和医学遗传委员会、科普委员会、动物遗传委员会、微生物和分子遗传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中国遗传学会下设 24 个地方遗传学会，拥有会员 4000 多名。

经过 30 多年徘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改革开放的盛世，正呈现出万紫千红、春色满园的大好景象。

沐浴东风，遥望南天，谈家桢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 五、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 ◆

进入 80 年代，谈家桢以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身份，活跃于国际国内学术和政治舞台。

1980 年，谈家桢先后会见了英国里兹大学、美国麻省州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澳大利亚植物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和美国密苏里大学的代表团。

1980 年 7 月，中国遗传学会正式加入国际遗传学联合会，成为该会第 32 个会员国。

同年 8 至 11 月，谈家桢偕赵寿元赴英国出席牛津染色体会议。之后，又率团出席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细胞生物学会议，并宣读

了题为《关于人体基因文库建立》的论文，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会后，谈家桢一行还顺道访问了哥丁根、海德堡、土宾根、法兰克福等地的大学的研究所，并绕道赴美国进行学术访问。

1983 年，在第二届全国遗传学会代表大会上，谈家桢继李汝祺之后，被推选为理事长。

同年 3 月，在谈家桢的建议下，中国遗传学会和上海科技协会在上海联合举办了致癌、致畸、致变讲习班，来自 11 个国家的 33 位学者和 200 多位国内学者参加了这次讲习班。

这一年，谈家桢先后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第七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民盟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这一年里，谈家桢先后被美国罗斯福夫人肿瘤研究所聘为高级研究员，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授予“杰出校友”荣誉称号，并被聘为联合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非政府组织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未开发植物利用委员会委员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遗传工程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

11 月，由谈家桢任团长的中国遗传学家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遗传学大会，谈家桢被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副会长，并在大会上宣读了题为《遗传学的科学和社会职能》的报告，他的关于遗传学是使科学与社会相结合的一种推动力观点，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在这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共提交论文四十二篇。

1984 年，谈家桢被聘为联合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非政府指导委员会委员。

同年4—8月，谈家桢应美国科学院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先赴罗斯福夫人肿瘤研究所讲学，后赴夏威夷、旧金山、洛杉矶、明尼苏达、洛阿马斯、堪萨斯、圣路易斯、迈阿密、奥兰陀、根斯维尔、诺斯维尔、勃兰斯堡、华盛顿和普林斯进行访问。

其后谈家桢赴加拿大，接受约克大学授予的荣誉科学博士称号。

在加拿大，谈家桢先后访问了汉密尔顿、渥太华；之后，又顺访了纽约和费城；再折道西赴德国，访问了康斯登茨、明兴、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和海德堡；尔后，取道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回到国内。

1985年4月，谈家桢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中国教育界第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同年，谈家桢又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被美国马里兰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被英国遗传学报聘为顾问编辑委员会委员。

在这一年里，谈家桢先后出访瑞士苏黎世、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美国马里兰，丹麦哥本哈根，瑞典斯德哥尔摩，芬兰赫尔辛基，德国汉堡和明兴；再赴意大利特里斯特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大会。之后，又取道香港、罗马，再赴特里斯特出席ICGEB的科学顾问会议，访问威尼斯和帕陀佛大学。又应邀访问法国里昂的环境研究中心，拉都大学和巴黎第六、第七大学，还访问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和新加坡大学。

1986年，谈家桢被聘为美国《科学家》报编辑顾问、大英遗传学会荣誉会员。

同年，谈家桢出任宁波大学名誉校长。

这一年，谈家桢再度赴美出席华盛顿举行的中国生物工程中心

的顾问会议和美国科学院授予院士仪式。之后，又顺访了北卡洛林纳国家环境卫生院、路易斯安那大学、亚特兰大大学、乔治亚大学和肯塔基大学，参观了摩尔根故居。而后，他又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 ICGEB 顾问会议，顺道访问了波士顿、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托莱多、芝加哥和威斯康辛。

1987 年，谈家桢被意大利国家科学院授予科学院院士称号，并被聘任为非洲环球科学杂志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这年 5 月，谈家桢在安徽合肥市主持召开中国遗传学第三届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被推选为中国遗传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

同年底，谈家桢赴香港出席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理事会和顾问联席会议，并访问香港中文大学。

1988 年，谈家桢又率团出席了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并被推选为名誉副主席。

同年，谈家桢再度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八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教科文委员会主任，并再度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民盟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9 年 9 月，复旦大学杭州校友会发起成立“谈家桢生命科学基金会”，颁发“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学金”，以奖励浙江籍考人大学本科生物系、农学系和医学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成绩优异者。

11 月，谈家桢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荣誉章。

这一年，谈家桢应澳大利亚堪培拉国家大学邀请，赴悉尼、堪培拉和墨尔本等地作学术报告。

1990 年，谈家桢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代表民盟中央作《科技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亟待解决》的大会发言。在这次发言中，

谈家桢指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掌握先进技术的专门人才。”

他又指出：“归根结底，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纵观世界各国在发展经济中，无不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对于目前在我国科技队伍中出现的青黄不接现象，决不可掉以轻心。”

他还指出：“大批科研人员为了争夺财源，人自为战，组自为战，四处奔波，签订合同，追求短平快，自然会影响科研成果，影响对学生的培养。”

谈家桢在发言中再一次呼吁，继续在全社会提倡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国家颁布的科技政策要尽快制定配套措施，使之真正贯彻落实。

谈家桢的这次发言，受到与会人士的高度重视。

这一年，谈家桢出访香港地区、美国、委内瑞拉、西班牙、德国、瑞典，参加了第三届美洲华裔国际生物学讨论会、第二届人体基因编码国际会议和第三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大会；在此期间，他还出席了国际有关发展中国家建立生物安全条例的会议，并在西班牙生物研究中心与巴塞罗那大学作学术报告；他还接受了德国康斯登茨大学的功勋奖，并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授予荣誉公民的称号。

1991 年 4 月，在郑州举行的中国遗传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谈家桢被推选为名誉会长。在河南省遗传学会举行的报告会上，谈家桢作了有名的《从第一次绿色革命到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报告。

谈家桢认为，三四十年代以来，人类利用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使粮食产量成倍增长，出现了第一次绿色革命；时至 90 年代，用遗传工程来解决生存问题，形成第二次绿色革命。人类要健康长寿，

还要丰衣足食，这一切，都与基因工程有密切的关系，基因工程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

从1978年到1991年的十四年间，谈家桢牢记毛泽东关于“要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的遗训，肩负振兴中国遗传学事业的重大使命，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声望，频繁出访，足迹遍布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近80个城市，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和国际世界的交流和合作，加速了中国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进程。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入室弟子，这位与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有过多次不同寻常的交往的科学家，在步入晚年之际，又一次谱写了他的科学生涯中多姿多彩、极富戏剧性的高潮情节。

第三节 宝岛之行

谈家桢曾经说过：

“我老了，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到台湾访问，我甘愿为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做铺路石，这是我一生的夙愿。”

他还充满深情地说：

“即使到那一时刻，我走不动了，我坐上轮椅也要到宝岛访问。”

◆ 一、初访受阻 ◆

1989年5月12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台湾清华大学教授

沈君山代表台北科学会发函，正式邀请谈家桢到台湾作学术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关瑞和阳明医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所长武光东也同时来函，希望谈家桢前往参观并作专题演讲。台湾的科学界朋友期待着谈家桢的到访。

谈家桢欣然接受了邀请。

访问日期、行程表、谈家桢的个人资料和活动报道的责任单位……该拟的都拟了，该落实的都落实了。

11 月 7 日，上海市有关领导为谈家桢及夫人访问台湾设宴饯行。8 日，谈家桢夫妇乘机抵达香港，台湾方面也派人到香港迎候。每个环节几乎都很顺利。正当谈家桢夫妇在办理入境手续时，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

台湾当局突然以谈家桢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副主任”为理由，对谈家桢拒签入境！

除非，谈家桢在台湾官方印制的“保证书”上签上名字，才会同意放行。

这份所谓的“保证书”，说到底，就是要谈家桢保证在访台期间不进行任何政治活动。

在原则问题上，谈家桢从不含糊，他宁可不进入台湾，也绝不会在所谓“保证书”上签字。

其实，在谈家桢接受台北科学会的邀请之初，双方就将访问的性质定得十分明确。在 11 月 1 日沈君山的署名电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访台奖助金及台北科学会之邀请先生访台，乃因先生在遗传学之杰出成就，尤其尊敬先生于五六十年代对抗李森科学派，力持科学趋势不向权势低头之精神，与先生之官阶无关。在我们看来，先生乃是以一杰出科学家之身份访台，所谓‘部长级’或‘副部长

级’是不值一提的。”

邀请者和被邀请者，对这次访问活动的学术性质都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在节骨眼上，台湾当局却偏偏要在“官阶”问题上大做文章，这实在是令人费解了。

正僵持不下，11月14日，沈君山在给谈家桢的一封电文中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表示谈家桢只要在一份已经起草好的文件上签字，台湾当局同意放行。

沈君山在电文中说：“因为您在大陆的官方身份，为了避免您抵台后可能引起的困扰，包括反对党人士的借机攻击，有关方面与我商议后，建议您在抵台时签署附上的文件。”

那份附上的已起草好的文件是这样写的：

> 本人系上海复旦大学遗传学教授兼生命科学院院长，并因科学上的成就，被任命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副主任委员及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职，现以大陆杰出科学家身份应邀访台，在台期间放弃上述身份，仅与科学界同行作学术上之切磋，并保证入境后遵守中华民国法令，请依有关规定办理。
>
> 此致
>
> 航空警察局

这一年，谈家桢年届八十。在原则问题上，他头脑十分清醒。要他在这类文件上签字，是万万不可能的。

谈家桢表态了：

他感谢台湾科学界同仁为他访台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辛勤劳动。

这次不能顺利访台，台湾当局应负全部责任。

他当机立断，乘机返回上海。

◆ 二、再访成行 ◆

以后的两年里，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形势出现了喜人的变化。台湾科学界人士对谈家桢 1989 年访台受阻一事一直深表歉意。在此期间，经沈君山等人极力促成，并经向王永庆等台湾著名企业家倡议得到响应，成立了“大陆学者访台奖助基金会”。之后，又成立了以国际著名华人科学家李远哲为召集人、陈省身、朱经武、费景汉等科学家为评委会成员的邀请对象评审委员会，确定邀请对象原则为“必须在学术上造诣达到国际水准”、“在大陆为其学术领域之领导人”及“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在此基础上，由台湾著名物理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出面，向十二位大陆杰出科学家发出邀请，又经李远哲飞赴大陆，与有关部门接洽，确定了第一批六位大陆杰出科学家及其夫人的访台名单。他们是：

谈家桢（遗传学家、复旦大学校长顾问）与夫人邱蕴芳；

张存浩（化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与夫人迟云霞；

吴阶平（医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与夫人高睿；

卢良恕（农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与夫人尹雪梨；

邹承鲁（生化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与夫人李林（物理学家）；

华中一（物理学家、复旦大学校长）与夫人缪宝丽。

1992 年 1 月，谈家桢收到了由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签署的一封邀请信：

家桢教授台鉴：

为促进两岸学术交流及未来学术合作，敬邀先生来台湾作为期十天的学术访问及演讲。先生来台之旅费、膳宿费将由“访台奖助金”赞助，并由本院会同沈君山教授安排参观访问。先生访台时间拟定于1992年3月至6月间。敬候赐复。奚此奉邀。

并颂春祺

吴大猷（盖章）敬启

1992年1月21日

其后，又是预料之中的反复。台湾当局对前后两批12位科学家进行所谓“政审”，认为其中7人是中共党员，而谈家桢则具“官方”身份，表示此8人不能入台。最后，经李远哲和沈君山多方奔走、交涉，终于促成了大陆第一批杰出科学家于6月8日赴台访问。

1992年6月8日下午，谈家桢一行乘坐香港起飞的国泰四〇六班航机抵达台北桃园机场，受到沈君山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代表及在台亲友的欢迎。大陆科学家代表团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表达了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进行学术交流”，并强调这次大陆科学家访台，是“抱着加强海峡两岸科学家的联系，增进相互了解的真诚愿望，也抱着促进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强烈希望”。

其间，出现了一个插曲。

原来，接待组了解到谈家桢已83岁高龄，是这次赴台大陆科学家中最年长的一位，便特意准备了一辆轮椅车。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谈家桢声音洪亮，红光满面，除背有点微弓外，行走步履竟丝毫不输年轻人。

谈家桢自然谢绝了接待人员为他特意准备的轮椅车，在主人的陪同下，健步走出桃园机场。

短短的八天里，谈家桢等六位科学家马不停蹄地访问了台北、新竹、台中、高雄、花莲等城市，参观了大学、研究所、高科技园区和农村。谈家桢还与台湾的同行们交流了两岸生命科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取长补短、携手合作，成了两岸科学家的共同心愿。

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谈家桢着重参观了分子生物学综合研究室；作为上海自然博物馆馆长，谈家桢兴致盎然地驻足留连在设在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占地十万平方米，设有天文、人类学、中国科学史、环境科学、生命科学等展厅和天象影院、采用光、声、电等现代化手段的自然科学博物馆，给谈家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谈家桢又来到位于台北市的台湾东吴大学，受到章孝慈校长的接待。谈家桢还参加了东吴大学师生特意为他准备的座谈会。

就学于东吴、又曾任教于东吴的谈家桢十分动情地表示希望两岸的东吴大学早日成为一所大学。台湾的报界评论说，谈家桢在东吴大学的访问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小时，但对东吴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台湾大学医院，谈家桢会见了台湾遗传学会会长潘以宏博士。潘以宏十分敬佩这位遗传学界的前辈，在会见中，谈家桢希望台湾遗传学界顾全大局，支持中国遗传学会争取主办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潘以宏表示完全理解。之后，1992 年 10 月 12 日，潘以宏在给业已回到上海的谈家桢的信中，再一次明确表示：“我们不申请主办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但与中国遗传学会协力争取主办第十八届遗传学大会。”不久，台湾遗传学会第二十次理监事暨编辑委

员会会议正式作出“我们不主办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决议。继之，该会第二十二次理监学联席会议暨编辑会议证条中，再次确认：“我们不分开主办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协助我国大陆在北京召开，以使此会成功宣扬中华文化于世界。”

此后，1993 年 8 月，在英国伯明翰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中国北京以优势得票获得了第十八届大会的主办权。这是后话了。

◆ 三、谈家桢重晤蒋纬国 ◆

1992 年 6 月 11 日，台湾东吴大学校友会集会，欢迎谈家桢访台。

在这次校友会上，谈家祯与昔日的学生蒋纬国在阔别六十多年后欣喜重逢，成了台湾各大新闻传媒竞相报道的新闻。

蒋纬国于 1928 年秋进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当时他使用的学名叫“蒋建镐”。两年后，谈家桢作为三年级的代课教师，教过蒋纬国生物课。60 多年后，蒋纬国一眼见到谈家桢，就激动地迎上前去呼道：“谈老师!”

又对邱蕴芳医生恭敬地叫了一声：“师母。”

摄影记者们纷纷抢上前去，摄下了这动人的一幕。

谈家桢和蒋纬国是浙江宁波同乡人，久别重逢，这对师生立即用宁波家乡话兴奋地攀谈起来。

“我印象中的谈老师是个亲切的人，老是笑嘻嘻的。”蒋纬国深情地回忆说。

谈家桢在一边听着，又习惯地露出了他那一脸和善的笑。

“谈先生，请你谈谈对蒋先生的印象。好吗?”一位记者提出。

“他吗？历来是班上拔尖的学生。性格开朗，并不‘特殊’。”

“就是有点顽皮——”蒋纬国在一边插话。

大家哄地一声笑开了。

邱蕴芳说：“蒋先生离开大陆那么多年，但家乡话比老师讲得好。不像谈先生，已经有点南腔北调了。”

“我还能讲苏州话，说弹词开篇呢。”蒋纬国在话语中充满了对大陆的眷恋之情。

在校友会上，蒋纬国还郑重地向老师和师母赠送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礼物中，有他自己设计的印有蒋纬国英文名字的丝巾和领带，还有一只桌面型电子台钟，钟面上刻着一段文字：

> 我们的基本立场——出发点：一、海峡两岸都自认为是中国人。二、所以我们只需要一个中国。
>
> 我们的愿望——国家战略目标：一、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过好日子的机会。二、我国要受到全世界的尊敬。

6月16日中午，在大陆科学家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谈家桢和蒋纬国再度晤面。蒋纬国首先上台致辞，他表示，在与老师谈家桢夫妇话别前，感慨系之，索性以歌声代心声，愿意引吭一曲。他声情并茂地唱道：“……掌声响起来，我心中明白，歌声交汇着你我的爱……”

他激动不已，连唱两遍。全场来宾为之动容，纷纷击拍相和，一时蔚为壮观。

当邱蕴芳离座准备站在谈家桢和蒋纬国师生中间合影留念时，蒋纬国马上站起来，示意邱蕴芳坐下，连声说：“谈师母，您是长

辈，哪有小辈坐、长辈站的事情?”又说：“没有老师，哪有我的今天?”

眉宇之间，洋溢着浓浓的师生之情。

◆ 四、台岛人民的心声 ◆

谈家桢访台期间，收到一位素未晤面的原籍湖北省仙桃市的胡岂凡先生的信，信中称：“公等冲破一切难关，来台访问，为大陆科技学人访台先声，凡我国人，谁不庆幸万分，也钦佩万分……”

又用“水调歌头”词牌，用梅花愈冷愈开花的精神……表达台湾教育界人士对公来台，具有无尽欢迎诚意。词曰：

塞花吟白雪，馨香倚霜浓。玉姿天从，百千年红紫尽平庸。三春桃要争宠，九秋桂菊剖动，谁与傲冰封。老干曲中挺，新枝遍藏锋。

诸稚气，刚激质，娇丽容。当绝冷艳，大地萧疏卧云松。翠黛如烟缥缈，雪壤光凝冻，阳和隐子甲龙。麦梅何庸问，海天复复芳踪。

其词激越清亮，内孕不尽情意。读来自令人怦然心动。

又有一位名叫佘佛龙的台胞给谈家桢寄去一信。信中说：“阁下等应邀来台参观访问，促进海峡两岸学术双向交流，其功至伟。此一互动……对未来两岸和平统一大业意义深远。”

随信还附有一小册子，内中写道：“台湾同胞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来自中国大陆，时间虽有先后，民族的认同则一，骨肉相随，密不可分，合则同得其利，分则同受其害。”

又写道："在国家陷于分裂的时刻，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为了使台湾更好，为了国家和平统一的历史任务，我们不能置身事外。"

情真意切，毕见于字里行间。

这些表达了台岛人民心声的话语，使谈家桢等大陆科学家深为感动。

6月16日，正在北京访问的吴大猷教授提前赶回台北，设宴为访台的大陆科学家及其眷属饯行。

席间，沈君山教授充满深情地套用了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原词，将之赠送给大陆同行："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毛轻，若非当年推移力，哪得今朝自在行。"

谈家桢也即席发表感想，他认为，来台湾访问的这几天，是自己一生中最感兴奋与激动的日子。经过四十年相隔，来时是相见欢，去时是依依不舍。虽然只是走马看花，但终于实现了自己平生之最大夙愿。他还表示，愿做两岸科学界交流的铺路石。他希望与台湾科学家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未来作出贡献。

第四节

NEXT STOP——WHERE？——北京

1993年8月，英国，伯明翰。

国际遗传学大会此时在这里举行。这是第十七届，五年一届。

第十六届在加拿大多伦多，第十五届在印度新德里。下一届，第十八届，谁执东道主牛耳？南美的智利？澳大利亚的悉尼？还是在上一届便属众望所归的中国北京？这是大会会场内外，人们关注和议论的一个焦点。

中国代表团驻地。科学家代表们在思索，在小声磋商，间或，不约而同地把充满敬意的目光停留在一位八十四岁的慈祥老人身上。他，就是德高望重的“中国的摩尔根”、中国遗传科学的奠基人，第十五届、第十六届和第十七届国际遗传学会副会长谈家桢。此刻谈家桢也在思索着，英伦三岛的初秋凉意，常会把他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是啊，往事如烟，然而，十余年间参与国际和海峡两岸科技与学术交流活动的一情一景，回忆起来依旧宛然眼前。

◆ 一、回忆与思考 ◆

1980 年，谈家桢率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细胞生物学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关于人体基因文库建立》的专题论文。但是，在会期之始，却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原来，按照国际会议惯例，会场上面悬挂的是各与会代表所在国家的国旗，令谈家桢和代表团成员们吃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十分触目地被颠倒悬挂了，而且，在同一个会场上，居然还悬挂着中国台湾的青天白日旗！

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谈家桢当即召集团内同仁开会统一认识，指出这是涉及国家主权和尊严的重大原则问题，并迅速向大会东道主及组委会提出：出现上述现象，第一，说明了一些人的无知；第二，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1971 年起即已重返联合国，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

谈家桢明确表示，如果东道主及组委会执意如此，中国代表团将立即退出会场。

谈家桢义正词严，句句铿锵，掷地有声，对方无话可讲，当即撤去台湾的旗帜，并将五星红旗复正。之后，又连续几天，在会场上播放声明，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歉意。

此次事件发生后，谈家桢认识到，科学无国界，但在国际科学学术交流活动中，仍时时有潜涡暗礁，又怎能回避政治性的问题呢？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就应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寸步不让，据理力争，不能遮遮盖盖，含含糊糊，更不能闭目塞听，默认其事。也就是说，该硬就要硬，该顶就要顶。这就是谈家桢的性格，一个正直、爱国的中国科学家的性格。

回忆又把谈家桢的思绪带回到1992年。

那一年初夏，谈家桢作为六位大陆科学家中的一员，应吴大猷、李远哲和沈君山等台湾著名科学家的邀请，到台湾作为期八天的短暂访问。在这次引起海内外舆论广泛瞩目的两岸高层科技交流中，谈家桢会旧友，交新知，与阔别六十年的学生蒋纬国先生畅叙别情，又去台湾的大学、研究院、博物馆及工厂企业访问考察。

在此期间，谈家桢向台湾同行提出了一项由两岸遗传学界共同投入、与美国合作探讨人类基因的研究计划，他还一再表示，如果两岸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将台湾的管理经验与大陆的高科技联手，那么，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在访问期间，当谈及1992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第四届国际细胞生物学大会时，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一位所长问谈家桢，如果台湾方面赴会，将以什么名义前往？这一极富敏感性的话题立刻使谈家桢回想起1980年第二届国际细胞生物学会议的往事。事关大局，他立

即表态，在目前的情况下，似仍宜参照国际奥运会的形式，中国台北作为地区性的代表出面较为妥当。此议一出，顿时引起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反响，该委员会在记者会上表示，部分访台大陆科学家的言行，“已超出学术交流的界线”，并指名道姓地提道，“例如遗传学家谈家桢表示‘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与一个中国原则不符’及‘台湾应以地区名义参加国际会议’，此种言论不但与学术交流无关，且有意借此言论矮化我们的地位，损及国家尊严，实非为客之道”云云。台湾地区的一些媒体也附会此说，刊出“大陆访客宜避免政治性谈话”之类的文章。而另一些新闻媒体则仗义执言，指出谈家桢的一番谈话是由台湾方面一位科学家提出的问题而引出的，有问自应有答，台湾官方大可不必为此小题大做。

一时间，热热闹闹，倒也替那次访台之行增添了不少色彩。

谈家桢自己呢，却越发明白了：在学术交流中很难避免政治性问题，而在原则问题上理当旗帜鲜明，不能含糊其辞。

回到上海后，谈家桢遇见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公琦，叶公琦说：

“我看到了，台湾有些报纸在攻击你，但你是对的。”

两个老朋友的手握在一起，会心地笑了。

◆ 二、智珠在握　赢得成功 ◆

这回，在伯明翰，又遇上了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斗争。

谈家桢向期待他作出决断的代表团成员们表示，申办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我们的优势很大，但不能掉以轻心，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妥协，但我们要抓住问题的要害，拿出有说服力的依据，争取舆论和公众的支持。

紧接着，谈家桢抓住时机，及时约见了《遗传信使报》的主编。在谈及申办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一事时，谈家桢指出，申办国际遗传学大会的问题，我们在上一届（第十六届）大会时就提出过，但是，会长弗兰克尔爵士（英裔澳大利亚人）有偏袒倾向，在发言中甚而说出“中国能举办这样的会议吗？”“英语行吗？”“是否所有的国家都参加由中国举办的会议”之类倾向十分明显的话来，致使中国仅以一票之差落选。当时，中国代表团为顾全大局，照顾弗兰克尔先生的面子，加以第十八届大会在北京举行的提议事实上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因此，中国代表团在各方面都十分的克制。

“但是——”

谈家桢话锋一转，“我们在此也不妨作一个回顾，自 1983 年以来，第十五届在新德里；第十六届在多伦多；第十七届在伯明翰。如果第十八届大会再放到悉尼去开的话，我很担心，会使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我们所举行的不是国际遗传学大会，而是英联邦的会议了。”

谈家桢的话，不偏不倚，正好击中问题的要害，赢得了公众和舆论的支持。

一位公正的英国人士指出，弗兰克尔（Frankel）先生在上一届会议上对中国的做法似乎很不公道。

《遗传信使报》也迅即发表题为《NEXT STOP——WHERE?》（下一站在哪里?）的文章，表示了对谈家桢的观点的支持，也就是对在北京举办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支持。

世界之大，正道直行，强权难久，人心所向。

第十七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对第十八届会议东道主的表决揭晓：

中国北京以优势得票获得了这一资格！

作为人民的科学家，在许多历史场合，常常需要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一种特殊的使命。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时时有着一种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十分深重的责任感。谈家桢就是其中的一位，当他和他的前辈及同行们一起，亲手开启中国遗传科学大门的那一日起，当他向人民领袖毛泽东郑重承诺“要把中国的遗传学研究搞上去”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把自己的一生跟祖国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了一起。

第五节

跨越时空的对话

毛泽东逝世已有20多年，谈家桢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这种思念随着岁月的消长，又从感情上升为理念。

谈家桢近年来十分推崇德国物理学家曼克斯·普朗克说过的一段话：“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打破的链条。”

谈家桢认为：“如果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那么，神经生物学便是使两者互相沟通的关节点。神经生物学的研究，不仅能带动自然科学向前发展，而且可以让社会科学向前推进。神经科学已成为现代科学领域中最有希望、最富有生气的生长点。”

谈家桢同时还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两论”中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不仅在遗传学的发展史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指导遗传学发展的科学真理”。

作为国际知名科学家的谈家桢，在毛泽东离世多年的情况下，发人警省地提出上述这一观点，自不可能有任何附会之意，不仅如此，甚而，我们还可以感觉到，这实在是两位智者，两位心有灵犀的朋友所作的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两论”是毛泽东比较系统和全面地阐述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的两部著作。时值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继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后，把政治路线问题提高到哲学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两论”的发表，也是从哲学上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了总结。

《实践论》着重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指出——

社会实践是人们认识的来源。由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由此得出结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毛泽东透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运动的唯物的辩证的基本观点，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作用。毛泽东指出——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半个世纪以后，谈家桢将《实践论》的观点运用到对遗传学发展史的认识上——

“人类在自发地保存和改进原始动、植物的过程中，逐渐从经验中积累了有关分离和繁殖的知识，不自觉地学会了改良动、植物品种的方法，并逐渐培养成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改良了生物的习性，这是遗传学知识最早在实践中的应用。孟德尔在前人生产和科学实践的基础上，概括了自己在豌豆杂交试验中某些性状的分离现象，发表了遗传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植物杂交试验》一文，从而揭示了遗传学上的两个基本规律，即基因分离律和独立支配律。随着遗传学规律的揭示，育种手段日益多样化，导致本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50年代开始，由于遗传物质的DNA分子基础和三个核苷酸决定一种氨基酸的遗传密码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遗传学史上又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遗传学在分子基础上进入了不同物种间基因可以相互转移的遗传工程时代。从此，遗传学不仅为细胞分化、生长发育、肿瘤发生等有关高等生物基础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实验手段，而且开辟了遗传学应用于生产实践及人类生活的新纪元。”（谈家桢：《毛主席的“两论”使我受用不尽》，载《科技日报》1993年11月3日）

继《实践论》后，毛泽东又发表了《矛盾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根本法则。

在论述两种宇宙观的对立时，毛泽东指出——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在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谈家桢说："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对事物发展的原因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毛主席说：'……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的确如此，温度不仅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也不能使鸭蛋变为鸡子。生物体发生变异的内部原因是基因突变、染色体畸变和基因的重组。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如冬性小麦和春性小麦是遗传上不同的品种，在自然条件和人工条件下诱发而形成的。春性小麦田里可混杂着冬性小麦种子或出现冬性突变。在冬天里栽培春性冬小麦植株，显然是因为冬性温度选择了突变型或混杂其中的冬性型，反之亦然。这里特定温度是起了选择作用而非诱变作用。苏联的李森科等不尊重客观事实，硬把冬、春天的温度说成是冬、春麦互变的依据，甚而发展到随心所欲地在小麦中找黑麦，正是违背了事物的矛盾发展规律。"

他又说："又如高矮水稻，其内部基因不同，但能够成长为高矮水稻还需要一定的外因（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了作用，水稻才表现出遗传的性状。遗传基因是不能撇开外因，单独起作用的。在遗传学上，基因是内因，表现型是内因加外因（环境条件）。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与遗传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史是一致的。"（谈

家桢：《七一抒怀》，载1996年第6期《中央盟讯》)

两年前，谈家桢在他的书房中对笔者谈道："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半个世纪以来，在思想上一直自觉地、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听共产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呢?"

"我是1909年出生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我12岁，正小学毕业，进入中学读书。此后的75年中，我读书求学问，出过国，留过洋，去过大洋彼岸、加州理工学院的摩尔根实验室，后来又回国，长期从事科学和教育工作。风风雨雨，艰难跋涉，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年轻时的科学救国的理想。但是，我很失望，清王朝被推翻了，继而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中国。"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民没有翻身得到解放，'科学救国'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亲身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条件走科教救国的道路。"

跟毛泽东之间的那段充满戏剧情节的交往，更令谈家桢难以忘怀。他说：

"我是从事遗传学研究的。当今科学界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认识，即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世纪。同样，生命科学、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也十分广阔。"

他再一次深情地说：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也就没有中国遗传学的今天。"

时至今日，在谈家桢那堆满书籍的案头上，仍然放着毛泽东的那两篇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他说，他要“经常学习，温故知新”。

在毛泽东和谈家桢之间，一直在进行着一场令人动情的跨越时空的对话！

第六节

心系教育　上书中央

严格地讲，谈家桢既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一位充满爱国热情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谈家桢从教60余年，先后担任过东吴大学教师，浙江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生物系主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和校长顾问，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名誉院长和宁波大学名誉校长；他还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名誉主席。时代赋予了这位名满天下的科学家特殊的重任，他也果然不孚众望。他那间堆满书籍和手稿的书房兼会客厅，是他与中外客人纵论国事、天下事的所在地。在那里，但见谈家桢思路恢弘，视野开阔，谈吐敏捷，见解独到，常能思人之所未思，言人之所未言，这已成了许多来访者的共同印象——

1994年10月至1995年1月间，谈家桢偕夫人重访美国，历时3

个月，访问了美国东部、西部、中部、南部十多个城市，接触了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士。令他印象至深的是，在美国的科技界，华裔人士正变得越来越多。

“我所到之处，可以看到众多的中国留学进修人员，其中仅圣地亚哥一地，便有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出去的学生四十人之多，而有的实验室里，满目望去，几乎全是中国人!”

1995 年初春的一天，在上海华东医院的一间单人病房里，偶患感冒的谈家桢一口气说出了上述的印象。

“但是，在十几万赴美的中国留学进修人员中，大部分人目前在美国仍属于廉价智力劳动型。这固然由于中国留学进修人员去美时间较短，其中大部分是 1978 年以后赴美，生根立足尚须一段时日。”

他缓了一口气，略作沉思后，又说：“而另一层原因，则正如我的一些美国朋友所说的，中国学生在外勤奋努力，都能超额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但感到不足的是，他们工作上的主动性和创见性比较欠缺。关于这一点，倒是应该对中国的现行教育制度作一些必要的反思——”

是啊，对中国的现行教育制度、对整个中国教育问题的思考，这个问题，对于谈家桢来说，已不是自今日始，而是酝酿了很久，很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和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谈家桢积极参政议政，他曾代表民盟中央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先后作了题为《科技队伍青黄不接现象亟待解决》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等重要发言。

1995 年 10 月 7 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七号楼，谈家桢把一份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言提纲亲手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并

请他转呈江泽民总书记和李岚清副总理。

如同当年的毛泽东主席一样，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十分重视这位科学家的真知灼见——

10月11日，甫从外地出差返京的李岚清副总理受江泽民总书记的委托，立即给谈家桢复了信。信中十分亲切地写道：

谈老：您好！

您给江总书记和我的信已收悉并已拜读，非常感谢您对我国科教事业改革和发展始终不渝的关怀。我本拟前来拜访并聆听您的指教，但因我刚出差回来，您已离京，待下次出差上海时再来看望。您的意见很好，我已转国家教委的领导，请他们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属于教育领域的改革，我们这几年的改革一直是按您信中提出的方向在做的，我们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力度……言犹未尽待当面请教，望多多保重身体。致以

敬礼

李岚清

1995年10月11日

事实如此。这些年来，谈家桢对中国教育问题的关注是始终不渝的。

谈家桢对基础教育问题具有独到的真知灼见。在跟笔者的一次谈话中，他十分动情地谈了以下的意见："学生从小学到初中，连续九年，为法定的接受义务基础教育时期。人人都享有这种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应该有贵族学校与平民学校、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之分。这是因为，中小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合格的公民，提

高整个民族的素质。”

谈家桢谈到这里，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他站起身来，在书房内来回地踱着步子，习惯地打着手势，嗓门变大了，而且，字字句句铿锵有力。

“教育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是对的，但我以为，是否还可以加上三个方面？一是‘群’，即集体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对集体主义讲得很少，‘文人相轻’，‘各自为政’，比比皆是，历来如此。今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国际接轨，走集团型道路，需要的正是集体主义。二是‘劳’，即劳动习惯，动手能力。一个合格的公民，首先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我们的家庭结构，不少是四比二比一的比例，也就是说，父母双亲，加上父母双方的父母，六个长辈围着一个孩子转。这样一来，有许多孩子在自己的家里，就像一个‘小皇帝’，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点劳动习惯都没有，动手能力也很差。再有第三，是‘美’，即美育教育。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候，要通过美育教育，使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自觉识别美与丑，健康与腐朽。做到心灵美，行为美，语言美。”

这位当时已年届 87 高龄的学者，每每谈及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总是那么投入，那么专注，那么忘我，那么富有激情。实实在在地，是身居书斋，心系天下了。

接着，谈家桢的思路和话题又转到了职业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

“九年义务基础教育以后，面临着一个分流问题，一部分学生升入高中，一部分学生进入中专或职业技术学校，也就是进入就业前的职业培训教育。事实上，办好中专和职业技术学校，是教育改革的一个趋势。这个问题，我在 80 年代初就提出过，学生从这类学校

毕业后，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或技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就可以适应工作。对国家建设，对学生们自己，都是好事，又何乐而不为呢？具有高中程度的中专毕业生照样可以考大学嘛！”

“五六十年代有一句口号：‘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提法很片面，我反对。我主张‘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现在有一些对‘人才’的片面认识需要澄清。什么是人才？不是只有科学家、作家、音乐家、画家这些带‘家’的人是人才，各行各业，只要能对社会作出一定贡献的人都是人才。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不能只靠少数人，要靠各行各业，靠全民族的共同努力。”

谈家桢在高等学校从事教育60余年，最令他为之牵肠挂肚的，还是大学的改革和发展。

“回顾过去高等学校办学的弊病，可以用四句话来通俗地加以概括，那就是‘综合不综，博士不博，奶油蛋糕，卖条头糕’。”

“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比喻。愿闻其详。”

“综合不综，指的是综合大学。综合大学，顾名思义，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学科齐全的、综合性的教学基地，培养出来的，则应该是高层次的复合型、创造型人才，但现在的一些大学，实际上是一些学科不全的文理学院，我说它们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又可以说，是缺‘天’（天文）、缺‘地’（地理、地质）、缺‘人’（人类学）、缺‘心’（心理学）。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专业性强而知识面狭窄。博士不博，照应上面提到的问题，是指博士生的知识面太狭窄；中国博士生的培养，往往过于偏重专业科学研究而忽视扎实的基础知识的训练，其实，博士论文只是一名合格的博士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再则现在一些研究院、所根本不具备开设基础课的条件，却也在培养博士生，按国际上的惯例，

学位只能通过大学授予，道理也在于此。在当今科学技术领域里，真正能攀上高峰的，必属知识广博者无疑。以生命科学这场关乎人类世界未来命运的伟大变革而言，吹前奏曲的，除了生物学家外，尚不乏物理学界和化学界的佼佼者，譬如玻尔、薛定锷，譬如鲍林和德尔布吕克……”

汩汩滔滔，直泻而下，快人快语的谈家桢，心系育人育才大业，直抒胸臆而无所顾忌，于语出惊人处，而毕见其赤子丹心了！

“奶油蛋糕，是指学生学到的书本知识过于专业化而基础性不强，如同奶油蛋糕，华而不实。说到卖条头糕，是对现在通行的一套教学方法的不客气的批评了。多少年来，我们的不少教师，习惯捧着一套全国统编教材照本宣科，常常是，走进教室，在黑板上一条、两条、三条……一条一条地写下来，条理清楚，头头是道；底下的学生呢，埋头记笔记，照单全收。到了考试时，也一条、两条、三条……一条一条，原封不动地还给教师。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不会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开拓型人才，必然的，他们在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上存在着先天性的严重缺陷！21 世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纪，摆在学校和教育部门、摆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培养大批适应时代需要的德、智、体、群、劳、美全面发展的各类层次的人才，任重道远，任重道远哪！”

这就是谈家桢，从 50 年代起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关爱，而今仍继续受到党和政府重视和关爱的科学家和教育家谈家桢，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的，不正是广大的中国科技教育界人士那种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可贵的精神风貌吗？这样的科学家，正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呀！

第七节

民族之光

1995 年 9 月 16 日，由香港查济民先生出资两千万美元设立的“求是科技基金”在北京颁奖。该年度二十位获奖者大多为中青年科学家，唯一获得大奖——“杰出科学家奖”的，是 87 岁高龄的谈家桢。

人们一致认为，作为基因论创立者摩尔根的学生和中国生命科学事业开拓者的谈家桢，六十余年来，为振兴和发展中国生命科学事业，坚持真理，呼号奔走，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普遍敬重和爱戴，授予他“杰出科学家”大奖，可谓名至实归。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谈家桢接过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亲自为他题词“民族之光”的匾牌。此时此刻，这位老人心如鹿撞，不能自已；此时此刻，他想到了很多，很多。

他想到了，早年的风风雨雨，艰难跋涉，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年轻时的科教救国的理想；

他想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没有毛泽东的重视和关心，就没有中国遗传科学的今天！

他想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指引下，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而今，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将大步迈入科教兴国的新世纪；

他想到了，世界科学技术事业突飞猛进，知识转换为财富已成

为一种趋势，成为世纪之交的一种象征和标志，中国要迎头赶上，一定要迎头赶上！

从北京回到上海后，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谈家桢结合生命科学的发展，谈了三方面的想法。

谈家桢在谈到世界科学发展趋势时说："20 世纪科学上的两个重大理论发现，其一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二就是摩尔根创立的基因论，现今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进而谈到生命科学与人类关系时，谈家桢说："从一定意义上看，21 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21 世纪人类的两大主题是生存和发展。为了延长人的寿命，国际上的基因研究正风起云涌，目前正在进行基因组研究。人体并不简单，约有十万个基因，分布在 24 条染色体上，要搞清它们的排列程序，其艰难繁杂不亚于攀登月球。这是一个前沿课题，中国不能落后于世界。到了 21 世纪，这些基因查清了，大都能得到控制，人的身体体质在排除病因和意外伤亡等因素的前提下，在现在人均寿命 70 多岁的基础上再提高 20 ~ 40 岁，也就是说，人活到 100 岁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在谈及生命科学和农业、粮食的关系时，谈家桢说："粮食问题即生存问题。30—40 年代以来，人类利用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使粮食产量成倍增长，这是第一次绿色革命；现在用遗传工程来解决生存问题，是第二次绿色革命。人要健康长寿，还要丰衣足食，要生活得有质量，基因工程在这一领域将大有作为。"

以后的几年中，谈家桢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的国际性合作的"摩尔根-谈"国际生命科学中心的筹建工作中，

这个准备建于世纪之交的一流实验室，以复旦大学等单位为基础基地，与浦东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开发园区联手，开发重大项目，参与上海市科教兴市、科教兴国的宏伟工程。

第八节

保护人类基因资源　再度上书中央

四十年前，毛泽东对谈家桢说："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这是人民领袖对中国遗传学事业所寄予的殷切期望。四十年来，谈家桢一直没有忘记毛泽东当年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进入 1997 年，当人们得知这位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中国遗传学事业的科学家，为了保护祖国的人类基因资源一事——再度上书中央的消息时，都不由深深被感动了。

此话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随着生命科学的突飞猛进，人类基因资源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中国人口多，民族多，家系多，疾病种类多，是世界上少有的"基因大国"。这一事实，自一段时间以来，已引起部分发达国家的特别关注。当然，由此而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中国人类基因资源的严重流失。毋庸讳言，这是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一场没有硝烟的"基因争夺战"。

有鉴于此，谈家桢对中国一些生物药物制造研究单位进行了深

入的调查。这位60多年来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的科学家卓有见地地指出——

“我国生物工程产业化的高潮即将到来，但是，在实现产业化的进程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还存在着一些涉及全局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谈家桢认为——

“基因是遗传的基本单位，它决定了生物的性状，决定了生物的生长和发育。基因与疾病、基因与生理特征之间的关系已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

他举到了美国的例子。他说：“美国从1990年开始，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花十年时间，以期完成绘制人类全部基因的图谱。这项工程被认为是人体科学的‘登月计划’。其中，与疾病相关基因的研究，就是这个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

谈家桢进而谈道：“根据预测，目前与疾病有关的基因有三分之一已经被分离和确认，并已申请专利，剩下的三分之二与疾病相关的基因，有望在本世纪最后的三年时间内完成。到了那时……”

谈家桢谈及于此，忧急之情溢于言表：“基因就是财富哪！基因的密码被解读，并进而投入生物制药，其科学价值和经济效益均难以估量。其实，就在不知不觉之间，一场跨世纪的‘基因争夺战’已经在我们身边开始——”

他扳着指头算，心情越发不能平静：“目前，我国已有干扰因素、白细胞介素、粒细胞集落因子等各种基因工程产品批准生产，而国外同类产品已经陆续以产品或合资等形式进入中国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特别是，其间还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能拿到自己的专利基因，那么，在下一个世纪中，我国

的生物工程产业，特别是医药行业，很有可能会像当年的‘北洋水师”一样‘全军覆没’！到了那时，除非我们用巨资向别人购买专利，否则的话，就没有权利生产这些生物药物！”

诚哉斯言，所言所虑，触目惊心，却又不容回避。谈家桢忧心如焚，他再度提起笔来，上书中央。在这封饱含着爱国热情和强国心愿的信中，这位89岁高龄的老科学家提出了两点建议：

“一、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我国人类基因资源；大力开展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保护基因资源；组织攻关，加大投入，加速我国人类基因的研究；大力提倡科教企三结合，制定政策，鼓励企业投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二、制定政策，营造良好的环境，加快我国基因药物产业化进程。其中包括扶植、保护我国已国产化了的基因工程产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生物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加快基因工程相关的基础研究，开发具有我国特色的基因工程产业。”

在这封致江泽民总书记的信中，谈家桢还强调指出：“加快基因工程相关的基础研究，在资金问题上，光靠国家是不够的。从国外生物工程发展的趋势来看，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越来越大，并成立了许多基础研究的基金会，企业与大学的联合也越来越紧密，我国在这方面也应提倡并制定有关政策，鼓励企业的投入。”

谈家桢最后谈道：“我相信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体生物工程和生命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国生物工程的发展一定会在国际竞争中夺得应有的席位，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谈家桢的呼吁，表达了一个老科学家渴望祖国尽快强盛起来的热切意愿。

第九节

总书记的关心

谈家桢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转呈江泽民总书记的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997年7月18日。到达北京的时间最早也应该是7月20日。

7月20日，曾庆红批示：报江总书记阅。

1997年7月22日，这封中办批号为“第一〇二六号——1997年7月22日”的来信已经放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办公桌上。日理万机的江泽民总书记当天就仔细阅读了谈家桢的来信，并当即批示：

岚清、宋健、佩云同志：

我仔细读了这份来信，我认为谈家桢同志的意见是十分恳切的。建议你们召开一次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提出解决的办法。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

江泽民

7月22日

李岚清、宋健、彭佩云也很快作了重要批示。这表明，谈家桢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已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保护祖国人类基因资源的问题也已被政府有关部门列入议事日程，并正在提出解决的办法。

时值世纪之交，走在改革开放时代中的中国人办事更见雷厉风行。

诚如谈家桢所言——

世纪之交，一场没有硝烟的高科技竞争——“人类基因资源争夺战”正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如果真要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就必须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占一席之地。

1998年3月4日，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科学家已经在这场竞争中迈出了坚定而自信的第一步。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陈良宇出席了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并和谈家桢一起为研究中心揭牌并作讲话。此前一天，陈良宇还代表市委和市政府专程看望了为振兴祖国科学振臂一呼的谈家桢。

时隔数日，3月9日，正在北京出席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接受境内外记者采访时，郑重告知到会的记者们，上海在今后几年里，将把科教兴市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要继续加大高新科学技术开发的力度，而其中的两大课题之一，就是生物工程。

上海人类基因研究中心主任陈竺院士在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披露了有关情况。

记者问及：“您曾说过，由于国际上这一领域的发展极为迅速，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面临严峻的挑战。是否可以说，刚刚成立的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表明了我们的一种信心和决心，我们也要在这一国际科学工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陈竺回答说：“应该说在‘八五’期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八六三计划”的支持下，我们做了一部分工作，从队伍的建立，基本技术的引进、发展，包括基因克隆等都有了一些基础。上海地区搞得较好的有复旦大学遗传所余龙教授、罗泽伟教授和金力教授领导的课题组，上海肿瘤研究所顾建人院士、万大方教授、中国科学院的贺林教授和其他许多研究小组。余教授等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因地制宜，拼命苦干和巧干。至今已拿到近40条新的全长cDNA，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谈到这里，陈竺坦言：“在人类基因组研究方面，我们已经比发达国家晚了一些时间，如果我们再沿着国外作图、测序的路，则一方面我们承受不起巨额费用，另一方面这样做也只能一直跟在人家后面。所以‘八五’期间我们就确定，应先着手拿到基因，而且是结合我们国家的疾病群，先攻下若干个疾病基因这一块。我估计我们国家已拿到手的cDNA已超过一百个了。总之，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基础，如果能有更多的资助，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是会有所作为的。”

陈竺十分动情地谈到了谈家桢：“讲到生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成立背景，有一件事必须提到，那就是去年7月，我们大家尊敬的谈家桢先生上书中央，希望能够保护我们国家的民族基因资源。由于我们国家有丰富的人类基因组资源，国外一些公司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合作，如果不进行规范化引导，其后果之一是我们珍贵的基因资源的流失。这件事得到了江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他亲自作了批示，要保护我们民族的人类基因组资源。当然用法律的形式防止基因资源盲目外流，并不妨碍国际合作，而只是把国际合作纳入了有序轨道，进行公平、合理的合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加大了研究力度。国家科委和卫生部都已专设课题来采集我们

的基因资源，特别是疾病基因，如肿瘤、心血管疾病、遗传病多民族群体样品等等。在此基础上就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南北两个基因组研究中心，南方这个建在上海，这一思想也是谈家桢先生首先提出来，并为中央所采纳。考虑到基因组研究现在已进入到工业化操作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必须把我们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不能分散，国外这么大的投入都要讲求集中起来做，我们资源、资金十分有限，更应该集约化使用，这就是中心成立的背景。”

陈竺还充满信心地谈道："我们希望要真正在人类基因组研究方面争得国际上的一席之地。这主要是从参与国际合作、国际竞争的角度而言。从拿基因来讲，十万个基因主要是从 cDNA 去拿。我们希望能拿到一千个，这是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新的基因，这个目标到 2001 年应该要达到。我们希望能得到百分之一，即三十亿个碱基对中，我们能拿下三千万个。这些是我们中国生命科学家雄心勃勃的目标。”

与此同时，3 月 6 日，谈家桢在《文汇报》发表题为《基因组研究需要大协作》的文章。

谈家桢谈道："我觉得，生命科学世纪的到来，对我们国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我们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党中央一直提醒大家，我们中国要以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我希望媒介多宣传这件事，这两个数字很令人警醒。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靠大量进口粮食来解决吃饭问题，要养活十几亿人。必须靠农业革命，靠生物科学技术。”

他又谈道："其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人的健康也是个大问题。现在威胁人类健康的各种慢性疾病有许多都是遗传的，而生命

科学的发展将为治疗这些遗传性疾病提供新的可能性。90年代初，美国提出要搞清楚人的全部基因组，在2005年前花三十亿美元做成这件事，为什么要搞人类基因组？我觉得除了其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外，它在揭示人类疾病病因、发展各种有效药物方面的价值更难估量。如已知十万个基因中与人的遗传疾病相关的至少有五千至六千种。随着人类基因组工程研究的不断深化，人类疾病的观念和疾病治疗的观念将会发生跟本的变化。为此，现在除了美国外，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都不甘落后。他们大量投资，所以进展很快，形势逼人。”

在与国际社会进行对比以后，谈家桢进而谈道：“国内要搞这项工作，除了资金问题以外，还有有限的人才过于分散，没有组织起来的问题。尽管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很重视，如前些年‘八六三’计划搞的基因治疗等，但有关人类基因组的基础工作未及时抓，而国外的研究机构却竭力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在中国搜集中国人群基因组原始资料，特别是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近亲结婚的后代较易找到遗传性疾病基因，这种材料不仅具有理论研究意义，也可用来开发成为相关的药物进入市场。”

这位89岁高龄的科学家高屋建瓴地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亟须考虑自己的对策，为此我在去年七月专门上书中央，希望国内及早开展人类基因组方面的研究，并采取措施，切实防止国内宝贵基因资源的外流。这一意见得到了江总书记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已着手拟定国家民族基因资源保护条例。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绝不排斥国际合作，但这种合作应该是公平合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今天大协作的基因研究组中心。

“基因研究组中心要把全国的基因研究力量和资源组织协调起来，同时还要加强有针对性的国际合作。这样将使我们有可能在人类基因组研究的若干方面作出一些有自己特色的工作。由于国力有限，我们在科研上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这就要求我们更要具有眼光，要看准一些值得抓的事，关系全局的事，一抓到底。否则要吃大亏。人类基因组研究就是这种影响全局的大科学工程项目。我们要大力宣传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宣传科学上相互合作的重要性。基因组研究最能体现这两点。”

令谈家桢备感兴奋的是，在江泽民总书记的亲自关怀倡导下，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工程可谓是喜事纷至沓来。新春伊始，上海新黄浦集团投资一亿元人民币，与复旦大学携手合作，在人类新基因克隆、功能研究和产品开发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从而成为迄今为止我国国有大企业集团与科研院所进行基础研究合作中投入资金最大的项目！

人类新基因的克隆、功能研究和产品开发，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一部分。新组建的“产、学、研”一体化公司以新黄浦集团为投资主体，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两个课题组为技术支撑。双方将精诚合作，全力推进人类基因组这项已被确定为抢占“二十一世纪新制高点”的重要计划。

1998 年 3 月出版的《半月谈》杂志第五期上刊登的《粮食是安定天下的产业——江泽民与“米袋子”》一文，引述了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农业和农业科学问题的讲话。

1995 年 12 月 6 日，江泽民在深圳会见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时强调说：

“中国农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这潜力一是来自农民中蕴藏

的巨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来自不断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农业……”

文章最后写道：“‘振兴我国农业经济，最终取决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广泛运用’。这是江泽民总书记的结论。”

江泽民总书记的上述讲话，也正是对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事业最大的鼓舞、支持和期望。

尾　声

假如把谈家桢看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把谈家桢走过的路看作是较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的话，此话恐怕并不为过。

青年时代，在面临继续升学和就业的选择时，谈家桢选择了前者，他念完了中学，又在东吴大学念完了大学；而后，去了北京，在燕京大学继续深造，完成了硕士学业。

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他负笈西行，去到了大洋彼岸，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在基因论创立者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的指导下，出色地获得了博士学位。

之后，他回到祖国，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科研和教学活动。

50年代，他坚持真理，不畏强权，与苏联李森科之流压制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愚弄科学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毛泽东和谈家桢的友谊，在现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史册上留下了绚丽多姿的一个章节。

早年情钟达尔文、热爱自然科学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关心着自然科学，关心着国内外自然科学界的风云变幻。

苏联及东欧自斯大林逝世以后引起了一系列变化，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问题的深沉思索。之后，在1956年，他向全党和全国提出

了“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双百”方针的提出，及时挽救了濒临灭顶之灾的中国遗传学事业。

其后是中国遗传学史上颇负盛名的“青岛会议”，这是一次得到毛泽东亲自关注的会议，是一次贯彻“双百”方针的会议，也是一次为摩尔根学派平反的会议。

正是在青岛会议以后，经陆定一的引荐，毛泽东知道了有一个正直的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弟子谈家桢。

进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展科技事业，已成为大部分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党的高层领导的共识。

毛泽东历史地关注了遗传学，历史地关注了谈家桢。

毛泽东是有远见卓识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明天的时代将是生命科学的时代，明天的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已成为世人的共识。

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正面临着太多的事情，太多的麻烦，包括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麻烦。其中最大的一次麻烦，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双百”方针的贯彻也好，科技事业的发展也好，都曾半途辍止。

然而，毛泽东与谈家桢之间那段富有戏剧性的友谊，却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毛泽东思维世界的另一个侧面，看到了毛泽东多姿多彩性格的另一个侧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历史而言，对于当代中国人的命运而言，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解放思想的时代的开始，这也是一个科学的、理智的时代的开始。

从那时开始的短短二十年间，中国真正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变化，也同样表现在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上，表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

从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1998年3月19日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闭幕之际，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又一次石破天惊地宣布：“本届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科教兴国。”

这说明，历史是要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历史是要人不断付出代价的，人的认识也必定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进步、不断提高。

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在中国同样如此。所以，后人一定会比前人干得更好。

出生在20世纪初的谈家桢看到了历史的这一进步，这位科学家同时又是历史的见证人。

再版后记

《统战人物传记系列》是本社列入国家“九五”规划的重点图书。初版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同志亲自作序，并指出：“编撰和出版这套丛书，既具有重要文化价值，更可以发挥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作用。”丛书自出版以来，不仅成为统一战线工作者的案头书，更受到众多史学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从统一战线的视角、采用纪实的手法，聚焦钩沉老一辈革命家与爱国民主人士的历史交集、人生交往，以丰沛的细节再现中国近现代史的演进历程，本套书属于首创，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项富有开拓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特别是为满足今日青少年学习历史、汲取智慧、健康成长的需要，本社决定修订再版此书。在此，我们向给予此书诸多支持的作者们、读者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华文出版社

2012 年 5 月